

“比较文学研究”主持人语

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努力以其跨文化的视野,求同彰异,力求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局面中打开一条东西方平等交流、对话与互鉴的通道。这条通道的打通,要求我们既要通晓中国文学,又要去努力了解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际遇。在后一个层面上,曹顺庆教授和刘颖博士的论文《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若干问题》可谓高屋建瓴,为我们了解、研究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影响、变异、互动等提供了总结性的观点和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指导,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在非英语世界的际遇,以及如何有效建立中国文学外传机制等重要问题也极具启发。万颢博士的《中美“苏学”学术话语与理论视角比较研究》则以具体的个案研究展现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在苏轼研究中的异同,指出中国传统批评话语的美感和美国学者分析的缜密。这为当下的学者如何摆脱术语繁多、语言西化的文风,提升学术著作的美感与可读性提供了借鉴。

比较文学另一个亟待发展的领域是如何将跨文化、跨学科的视野真正落实在外国文学课程教学之中,来观照中国当下的诸多现实问题。论文《认知研究与伦理批评合力下的外国文学教学》朝着这个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该文以认知科学和伦理批评为理论支撑,选择《堪萨斯》(Kansas, 1999)这篇讲述危机时刻的伦理选择及后果的美国当代短篇小说为阅读素材,联系我国当下极具争议的“扶不起”等伦理道德事件,努力促进外国文学研究、教学与中国当下现实的深度互动。

——邹涛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若干问题

曹顺庆 刘颖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涉及诸多重要问题,其中“研究对象”、“研究主线”、“关键问题”和“研究意义”必须厘清。关键问题包括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历史发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12JZD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曹顺庆,男,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及中外文论研究。

刘颖,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导,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

展、中国文学对西方的影响,中国学术界与外界的互动及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方法论。在追问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通过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重构,译介机制的完善和发展,进一步建构全球化时代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与传播机制。

关键词: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传播机制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Speaking World

CAO Shunqing LIU Ying

Abstrac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speaking World is a big issue. The object of the issue, main clue of the issue, key problems of the issue and meaning of the issue should be considered carefully. Problems such as the history of th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speaking worl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Western worl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cademia, and the methodology of the related research are most important. Only after thinking about the above-mentioned questions, can we try to construct the communication institution of related researche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by reconstructing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y in the globalized era.

Key words: English-speaking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 institution

作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不断得到关注,仅笔者本人就指导了50多部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学界对单个文学著作的域外传播已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对具体作者、作品的域外影响已有不少细致的梳理,并出版了不少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使我们对英语世界中国文学传播的系统整理和研究成为可能。实际上,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探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变异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英语文化圈在目前世界文明生态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探讨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就成为了解中国文学在世界传播的方法和模式的重要途径,对于推进中外文学交流、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1.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涉及的关键问题

关于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问题,涉及繁多资料、复杂历史和错综线索,故而在展开研究时,以下几点必须厘清:

1.1 研究对象

中国文学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其指称对象本身的界定都很复杂,就以往学界所认可的中国文学概念来讲,其所指称的范围甚广,很难达成共识。中国古代文学的划分则有更多争议,因为中国古代典籍的分类有其特定传统,虽有经、史、子、集之分,



又有文、笔之异,但绝大多数经典都不能单纯地归于某一类。此外,关于作品的研究一般不能脱离对作者的研究,中国文学史中作者的身份、时代、风格、特点,乃至学术沿袭、交游范围等问题,都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文学应该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及重要文化典籍、中国古代作家及文学作品、中国现当代作家及文学作品。

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翻译纷繁芜杂,有时难免挂一漏万。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极多,地理分布又很分散。当今世界文化交流频繁,学者语言使用情况复杂,故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应该涵盖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以英语为母语和交往手段的重要国家、地区及文化圈,且并不完全局限在以上所说地域范围内,而是涉及所有用英语翻译和研究的中国文学作品与论著。

1.2 研究主线

对于任何问题的讨论,都应有一条明确的主线。中国文学研究通常以作品产生的时代为分期。例如1919年前的一些文学史主要按照朝代更替来划分,即殷、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但未免忽略了朝代兴亡的原因及其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也有些著作受日本学者影响,把中国文学的发展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大时期。郑振铎(1984:16-30)在其《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则明确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期、古代期、中世期、近代期和现代期五个时期。此外还有“三期七段”、“三段八期”、“四段九期”等多种分法。除了时间主线,文类也是文学史研究者常常关注的问题,因此作品类型也成为一种划分的方式。

关于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与传播,考虑到中国文学与外界发生接触、交流的时间、方式都十分复杂,因此在时间上主要依循中国文学与外界接触先后这条主线,并依据关键问题来讨论是比较合理的。

1.3 关键问题

前面提到,关于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已经有了不少细部的讨论,缺少的是高屋建瓴的宏观研究。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际遇,涉及许多传奇的人和事,每一段信手拈来都不啻为一段佳话。但是在个案背后所呈现的规律和趋势却需要我们花大力气来体会、把握,只有梳理出一个个关键问题,才能真正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研究和传播的全貌展现出来。

首先,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由来已久,其起源及历史发展值得我们关注。学界已有大量关于世界汉学史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但专以中国文学西传英语世界为主要讨论对象的研究脉络还不够清晰。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商人和传教士西来中国,他们的商业行为和布道活动促成了中西文化最早的碰撞。自17世纪末叶法国传教士来华以后,欧洲的汉学研究更是呈现出新气象。特别是法国的汉学家,将中国的历史哲学、语言文学著作介绍到欧洲,使欧洲人在工艺、园林、建筑等方面崇尚“中国风”之后,逐渐领会到中国文学艺术的魅力。相比之

下,当时的英国汉学尚不兴盛,当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出使中国时,甚至找不到通晓汉语的译员(周发祥、李岫, 1999: 163)。不过,英国的学者通过“翻译之翻译”,接触到二手的汉学知识。例如,早在17世纪,葡萄牙人曾德照(A. de Smedo, 1585-1658)所著《大中国志》就有了英译本^①。英语读者对中国从此有了更深的了解。其后,中国文学作品也逐步通过翻译和介绍为英语读者所知。

其次,一国文学在他国流传,其异质性往往引起当地读者的兴趣,从而产生种种影响。自中国戏剧、小说传至欧洲以来,中国文学对西方的文化、思想、文学及艺术都产生了种种影响。以往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往往注重事实的梳理,关于中国文学译介对西方的影响缺乏理论的分析 and 探讨。我们研究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既要借鉴他者的视角,又要了解自我的特点,深入分析中国文学对西方的影响,能让我们更明白中国文学的世界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中的位置。无论是中国文学译介对西方文学创作方法的影响,还是对西方诗学观的冲击,或是对西方文化生活的浸润都值得我们认真审视。而文学交流所塑造的新世界观、自我与他者意识的形成,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再者,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研究始于早期欧洲传教士及汉学家的二手文献,最初与中国学界几乎没有直接的联系,更谈不上什么互动。但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殖民扩张的需求使英国人最终踏足遥远的中国。起初,他们启用一些华人通事,随后开始学习汉语,甚至开办书院,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在此过程中,英语世界与中国学术界逐渐有了交集。直至后来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终于从单向变为双向,从间接变为直接,与中国学界的互动也越来越有意义。站在中国文学主体的一方,我们有必要理清中国学术界在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的立场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影响,了解中国学术界与外界的互动是如何形成并发生作用的,从而再审视我们在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应持的态度。

前面三点多为历史的回顾与反思,第四个关键问题则是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经历了不同的时期,传统的译介与研究目的各有侧重,媒介也各不相同。早期的媒介主要是他者——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等。20世纪初开始,海外华人学者加入译介与研究的大军,成为媒介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21世纪,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由被动转向主动,国内的研究者积极参与到这一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当我们自觉地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文学时,这一活动不再是零碎、分散、目的不清的,而应当是在适当的理论指导下系统地进行。当此之际,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适时而出,为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提供一套恰当的方法论。以变异学为基础,力图建构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新方法,完全可以成为此类研究的一条新途径。

此外,有了明确的理论基础,我们应当进一步探讨建构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与传播机制的可能。在历史的回顾中,我们看到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历经兴衰,有进

展,也有困惑。中国文学的英译究竟应该依赖于英语译者的介绍,还是应该推进本土译者的译介活动?我们如何培养中国文学的海外受众?我们如何建立中国文学英译与研究的国际平台?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探讨。

1.4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研问题的意义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是一项顺应时代发展而诞生的课题。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由来已久,随着国际交流日渐频繁,国外关于我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并且从最初的零散状态逐步实现了系统化与全面化,这为探究中国文学外传问题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鉴于英语语种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面与影响度,对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考察定然会成为开展中国文学外传研究的一个直接、有效的切入点。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之研究将以实证性研究和变异学考察为主要方法论,对英语世界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进行总体上的考察,并通过探寻接受对象和接受机制深入发掘一国文学跨异质传播的现象与机制背后的内在动因与学术思维,从而对文学传播的接受全程进行宏观上的了解与把握,进而通过理论与实践将文学交流拔擢至跨异质文明的对话与融通的高度,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此外,我们将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之研究视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垦拓,因为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的研究内容与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同时论证并发展了以“跨异质文化研究”为基本理论和学术特征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从理论层面来讲,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之研究对作为学派方法论体系的六大研究上展开拓展与推进。具体体现在:①对“阐发研究”的深化与完善;②对“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化与完善;③对“文化模子寻根研究”的深化与完善;④是“对话研究”的发展与完善;⑤对“整合与建构”研究的深化与完善;⑥对“融汇研究”的深化与完善。

从实践层面来说,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课题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的拓展性意义,在于它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一套可行的跨异质文明文论对话方法论体系。首先,它促成了从“拿来主义”到“送去主义”的文化立场的转变;其次,它启发了基于接受者视阈的实证研究与变异性理论机制探索。

总而言之,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互动基点在于增进异质性文论的互相理解,它立足于国内外双方研究,努力推动“他者”视野到“他国化”的转换,在深刻把握二者异同的基础上探索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规律,从而确立一套促进中西文学、文论对话、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实施的长久性可行机制。同时,对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之研究将以丰富的跨异质文明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开拓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片崭新的研究领域,并在中西交互视野的沟通与融通中吸取中西文化各自的优质学术养分。

我们在完成这一课题的过程中,重新整理了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相关文献,发掘了不少历史资料,也借鉴了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尽量填补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翻译、研究、交流史上的信息空白。本课题试图在实证的基础上提出并解决一些理论问题,以求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苑的传播与研究提供一些方法和途径,并为中外文学搭建沟通的桥梁。

2. 建构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与传播机制

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还缺乏一定的体系和有效的传播机制。而这一传播体系的构建不能只局限于翻译。从对中国文学的深度研究,到输出作品的先后顺序,再到国内学者就各个译本与西方学界展开的对话,以及出版机构的种种努力,多个环节的整合与合作才能建构起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与传播的有效机制。

2.1 中国文学研究理论的建构及传播

在西方,与文学作品的发展相辅相成的是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层出不穷,各种文学理论的交相辉映也促进了西方文坛的繁荣。每年我国都有大量西方文学理论著作的译介和引进,这些理论不仅开阔了国内学者的视野,也为国内的文学批评带来了勃勃生机。然而,在国内文艺理论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的背后,我们感受到的是中西交流的失衡。如果说还有少数汉学家在积极译介推广中国的文学作品,那么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译介则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处女地。面对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现状,已故的季羨林先生曾不无遗憾地慨叹:“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季羨林,1995:2)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海外汉学的发展,国内大量学术团队和科研机构将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了中国,让国内学界了解了海外汉学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也为中国学者就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与西方文化展开积极的对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者众多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却极少被西方学者所了解,尤其是不精通汉语的学者。

我们一直以来关注的中国文学的译介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品而排除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西学界之间的对话也限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流传层面,缺乏理论层面的对话和相互影响。在理论建构方面,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发出的声音少之又少,与中国学界对西方文学和理论的极大热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客观来说,这一方面与政治、经济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有语言障碍的因素。结果是中国文论在面对世界话语时的严重失语,是中西学者国际学术地位的严重失衡。国外的理论大师来访中国引起轰动,甚至一些在国外名不见经传的西方学者来中国也大受追捧。与此相比,国内赫赫有名的学者为了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一点声音而获得同行的认可,却需作出大得多的努力。

此外,大多数学者试图将中国文论话语介绍到海外,却多限于中国传统文论,虽然古代文论经过现代转化,可以成为我们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今学者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还远未建构起来。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学者不断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近年来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言论逐渐产生了影响,与西方学者交流也日趋平等。正如王宁教授所言:“中国的文学理论必须走向世界,中国的文学研究必须跻身国际主流文学研究界,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绝不当仅仅满足于向世界输出廉价商品和劳动力,还应该以一个文化大国的身份向世界输出思想观念和理论方法。”(王宁,2010:29-35)我们的学者出版的理论著作也在海外产生了影响。例如拙作《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于2014年3月由世界知名的斯普林格出版社(全称为:Springer-Verlag Berlin and Heidelberg GmbH & Co. K)在纽约出版。佛克玛(Douwe Fokkema)教授在序中指出:“《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著作的出版,是打破长期以来困扰限制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语言障碍的一次有益尝试。”(Cao,2014:v)美国科学院院士苏源熙(Haun Saussy)、欧洲科学院院士多明哥(César Dominguez)等学者合著的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导论:新趋势及应用》(*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Trends and Applications*,2015)高度评价了该书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美国普渡大学A&HCI期刊《比较文学与文化》(*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专门刊发了专家书评《变异理论与比较文学:评曹顺庆新书》(*Variation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Book Review Article about Cao's Work*,2013)给予好评。变异学为比较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行的新方向,它既保证了学科边界的科学性、合法性,又大大拓展了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既打破了求同性思维模式和研究模式的局限,将差异性作为比较文学可比性的重要研究内容,既能集中体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治学的方法论特点,又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拓展了国际比较文学新的空间,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奠定了学理基础。

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状况让我们体会到:掌握不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的话,中国文学就不够完善,没有理论介入和文学批评推介,中国文学作品也难以在英语世界获得深入的接受。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海外传播之路任重而道远。

2.2 中国文学史在海外中国研究中的重构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人们的自由迁徙和交流,世界公民越来越多,人们对于身份和疆域的界限有了许多新的看法。

首先,语言疆界的拓展使中国文学的范围有重新界定的必要。汉语的再次崛起,使汉语成为一大世界性的语言,汉语文学、华语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亟需厘清。今天有许多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和民族的人群,在中国的土地上定居,并使用汉语作为重要交流手段,也不排除其中有人用汉语来进行写作。其实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唐朝时一些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和朝鲜的“入唐人”就创作了大量汉语文学作品,如日本的晁衡(阿倍仲麻吕)和朝鲜的崔致远就留下许多用汉语创作的文学

作品,前者的诗作《望月望乡》被收入《全唐诗》,也可以说当时就进入了中国文学史。

与此同时,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也应以一种新的姿态重新纳入中国文学史。过去的中国文学史中虽然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但一般都是汉译的少数民族文学,或者说是汉族言说中的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流传。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进入中国文学史,已经有不少人讨论。比如在“2015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就提出了“多民族文学理论建构”的议题,与会学者朝戈金教授指出应把少数民族话语纳入国家知识体系的建构(徐新建,2015:74-82)。现在中国已有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并直接参与到世界文学中。例如阿库乌雾用英语、彝语、汉语出版的诗歌文本,跨越了语言、民族和国界,在世界多元文化空间中占据了特定的位置。

再次,当代文学作品层出,但这些作品,特别是最新的作品如雨后落英散落在池塘边,让人难以拾掇。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年创作出版大量文学作品。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多达9301人,还有大量业余作家,他们的创作使当代中国文学获得了极大的丰收。面对如此众多良莠不齐的文学作品,当代中国读者尚且应接不暇,何以期待海外读者能了解接纳中国当代文学。除了几年一度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有影响力的政府奖项可以引导公众阅读外,批评家每年是否可以编撰诸如年度长篇小说赏析、短篇小说赏析,以负责任的态度为读者甄选优秀作品,让好的作家、好的作品可以真正获得读者的了解,而不是让读者在浩瀚如烟的文学海洋中丧失对文学的热情。而这些赏析选集英文本则可以让国外学者了解优秀的中国作家作品,可以吸引他们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译介到自己的国家。通过对当代文学年度文学作品的梳理让国内读者和海外学者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文学,这样就不会让海外汉学家把自己的视野仅仅局限在一个人数极少的作家群体当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未能很好地反映出中国的现状,对自己的社会和人民的情感缺乏深刻的思考。正如孙康宜和宇文所安组织众多海外汉学家重新编撰中国文学史,在2010年出版了厚达1704页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将对中国文学的介绍更新至2008年,也是为了让国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

总之,中国文学史的重新梳理与建构,将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明确的选择范围和恰当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海外读者了解当代中国文学的真实状况。

2.3 国内译介机制的完善

目前被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大多受少数几个汉学家和译者的影响,在选择的时候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他们往往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还会向出版社和市场妥协,因此一般倾向于符合目标读者偏好的作品。如果中国学者缺席作品外译的选择,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面貌始终难窥真容。

当然,从数量庞大的文学作品库中选出合适的作品来进行译介,必然是件不容易

的事。在尊重读者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认识到自身参与和引导的重要性,要在对西方文学深刻理解、对目标读者市场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满足不同受众对中国文学的阅读需求。只有融通中西,真正了解西方文学的发展状况和引进需求,并对中国作者及作品抱有惺惺相惜的同情,才能在中西文学和理论的交流中架起一座桥梁。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三体》、《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译者葛浩文和刘宇昆的翻译功不可没,显然反映了译介对作品传播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只靠海外译介者的偶发性努力,更应该有计划地从译者、出版机构、出版程序和作品舆论等多个方面入手,逐步完善国内的译介机制。

2.4 全球化、新媒体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建立当代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机制,最后还需要考虑作为时代大背景的全球化进程与新媒体技术作为新的传播媒介的重要影响。全球化进程虽然是以经济为起点和动力,但在其席卷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地区文明的过程中,也广泛地渗透进了政治、文化等更深的层面。如美国研究全球化的代表人物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描述:全球化的时代导致了人类社会的时空压缩,使地球成为一个村庄——这一“时空压缩”加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并引发了更频繁也更剧烈的文化冲突。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当然需要重视这一时代大背景:全球化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文学理论,而且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土壤——社会文化现实也日渐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与限制,从而对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的主体如何处理“全球性”与“本土性”或“民族性”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正在结构性地重塑传播媒介生态,已形成了新的中国当代文学实践形式——网络文学,亟待新的文学理论加以阐释;最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作为一项跨文化的传播,亟需理解和把握海外受众在面对外来文化传入时的社会心理机制,避免在海外受众群体中引发文化冲突的心理反应。

首先,极速扩张的全球化进程深入影响了中国的文学领域,使中国的文学理论极大地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与限制,如曹顺庆、靳义增在《论“失语症”》中所指出,中国的学者和作家在对西方文学作品的模仿和对西方理论的追随中,“中国文化已经到了几乎要被‘西化’掉的衰弱局面”(曹顺庆、靳义增,2007:80)。事实上,在文学创作层面,全球化也通过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土壤——作家所生存的社会文化现实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从而催生了“本土性”、“民族性”的缺失、偏向“全球性”的文学创作。这类“本土性”、“民族性”缺失的文学作品,即使在国内取得一时的成功,在海外传播中也注定会面临失败。从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者罗貽荣在对“马小跳现象”的跨文化传播分析中聚焦了一个很好的实例:在充斥着国外图书的中国儿童图书市场,中国本土的原创作品“马小跳”系列异军突起,在国内热销总量达1 000万册、连续41个月位列中国童书销售榜;而“马小跳”系列的作者杨红樱甚至被奉为中国的“少儿图书皇后”、“中国的J. K. 罗琳”等称号,一时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界的热门话题人物。但令

人意外的是,“马小跳”系列的英文版自从2008年开始,在欧美国家推出后反响平平,竟然在五年之内全部停印。罗貽荣(2015:57-61)在对这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传播失败的现象进行了深度分析之后指出:“马小跳系列作品在西方失败的实质,是其本土性和民族性的缺失。”该系列作品原创的主旨与核心价值观都是追随西方的作品,在英译作品中甚至将所有西方受众无法理解的中国本土元素和现象的痕迹尽数抹去,出版社在海外销售中也极力宣传书中人物“马小跳”“与西方孩子没有区别”。

全球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压制和影响所导致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本土性”、“民族性”的缺失与向“全球性”的趋同,不仅直接导致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中的衰弱态势,也已经引起了学界与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反思与批评。正如葛浩文的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缺乏有影响力的作品,明显的缺陷之一为“语言西化,缺乏创新”——未能从“中国传统诗词歌赋的意象优美和精粹独特的语言表现”中吸取养料(彦火,2013)。全球化极大地挑战了中国当代文学实践如何处理“全球性”与“本土性”或“民族性”之间的关系。当前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和作家,需要共同努力在文学全球化与文学民族性之间进行对话与交流,通过良性互动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的“全球本土化”。

同时,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中还必须重视传播媒介的变迁:中国的新媒体技术正进入井喷式的发展阶段,正在重塑传统的“第一媒介”为主体(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这类“第一媒介”)的传播媒介生态。文学的传播离不开媒介,传统的文学对应传统的媒介。传统的报纸、电视和广播曾被并称为三大媒介,这三者尽管存在具体传播形式的差异,但其共同特征是:三者都是单向传播,即由一个中心发布者向多个受众的辐射式传播。这种“信息制作者极少而信息消费者众多的播放型模式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被马克·波斯特称为“第一媒介时代”;而“多向、互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这类新媒体技术,则使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媒介时代”是以网络为主角的新媒体传播时代,因其异于传统的文化土壤而产生新的文学样式、新的作者和读者群,甚至新的文学创作过程。新的传播媒介生态环境必然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目前已催生了一类新的中国当代文学实践形式——网络文学。从事网络文化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者许苗苗指出:网络文学是“专指一类占文学网站作品主题的超长篇类型化小说”,这一形式从创作形式、创作主体、读者与作者的关系等重要方面,都与传统的文学形式大相径庭,例如“作者”的个体性正在被“群体创作”取代;“读者”从传统的以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欣赏为诉求,转而到以批评“网络文学”作品、敦促其改进为乐;而“创作过程”则以“作者”和“读者”的紧密互动性为其突出特征,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由“作者”独立完成创作、印刷呈现的即已成熟并且固定的作品。正如许苗苗所指出的,这一类新媒体形式下产生的新的文学形式亟需独立于传统文学理论的新的文学理论的阐释,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体系建构中更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许苗苗,2015:130-137)。

最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跨文化传播,为了避免引发海外受众的文化冲突心理而导致传播的失败,也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心理机制。研究跨文化交流的社会心理学家基于实证研究揭示了其中的规律: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受众会置身于同时接触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场景,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引发“排斥”或“接纳”截然相反的反应模式,如当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诱发了受众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的信念,或者感受到外来文化正在或即将威胁到本土文化,则更有可能采取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反应。基于此,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必须要注意了解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在翻译和理论推介过程中要注意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差异,充分尊重英语世界的文化价值观,并基于这一原则选取好的译者和出版方。具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中所需要的译者和出版机构,应当是充分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在尊重西方文化和价值的同时也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中国本土性与民族性的文化和价值,从而不仅能译出优秀的作品,还能胜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的最佳推介人与代言人。

注释:

- ①Semedo, F. Alvarez *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London: printed by E. Tyler for John Crook, 1655. 该书原作为意大利语,1655年翻译成英文,并附有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汉学家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的《鞑靼战纪》。

参考文献:

- [1]Cao, Shunqing.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oreword[M]. New York: Springer, 2014.
- [2]Domínguez, César, Saussy & Villanueva. *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Trends and Applications*[G].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3]Harvey, David W.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M].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0.
- [4]Wang, Ning. Variation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Book Review Article about Cao's Work [J].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USA), 2013, 15(6): 18.
- [5]曹顺庆,靳义增. 论“失语症”[J]. 文学评论, 2007(6):77-82.
- [6]季羨林. 东方文论选·序[G]. 曹顺庆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 [7]罗贻荣. “马小跳现象”的跨文化传播分析[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2):57-61.
- [8]王宁.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 [9]王宁. 从单一到双向:中外文论对话中的话语权问题[J]. 江海学刊, 2010(2): 29-35.
- [10]徐新建. 回顾与前瞻:2015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学术评述[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74-82.
- [11]许苗苗. 作者的变迁与新媒介时代的新文学诉求[J]. 文艺理论研究, 2015(2):130-137.
- [12]彦火. 葛浩文与性描写[N]. 羊城晚报, 2013-01-31.
- [13]赵志裕,康莹仪. 文化社会心理学[M]. 刘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14]郑振铎.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G]. 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15]周发祥,李岫. 中外文学交流史[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认知研究与伦理批评合力下的 外国文学教学

邹 涛

(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 本论文以认知科学和伦理批评为理论支撑,介绍笔者以美国当代作家斯蒂芬·多宾斯的短篇小说《堪萨斯》(1999)为阅读素材的一项教学实践,探讨如何在文学课程中利用认知理论有效发挥文学的示范功能、情感交流功能、认知功能以及“塑造”功能,彰显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文学意识如何帮助文学教师更好地促进外国文学与中国当下现实的深度互动。

关键词: 认知研究; 读心能力; 伦理批评; 外国文学教学

Teaching Foreign Literature with Insight from Cognitive Studies and Ethical Criticism

ZOU Tao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a teaching practice, in which Stephen Dobyns' moral story "Kansas" is chosen for close read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with insight from cognitive science and moral criticism, aims to realize the exemplary, affective, cognitive and formative functions of literature, and to deep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oreign literature and domestic reality in the practice of literary teaching with cross-cultu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cognitive studies; mind reading; ethical criticism; teaching of foreign literature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基于核心素养的外国文学阅读课程设计”(SC16WY01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记忆科学与叙事学的界面研究”(ZYGX2014J124)、电子科技大学教改项目“以伦理为导向的高校文学教学研究与实践探索”(2015XJYYB07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邹 涛,女,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导,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研究及叙事学研究。

1. 认知转向与伦理批评回归的合流

目前,国内外文学研究界正经历着认知转向与伦理批评回归这两股大潮。两股潮流看似各行其道,缺乏深度交叉点,但是,对文学功能的探究可以将两者汇聚一处,使文学之势更为铿然有声。

文学研究的认知转向可以看作是当代社会渴望摆脱后现代解构潮流之后的产物。价值体系的崩溃使人们分外渴望抓住相对实在的、可被证实的东西。当代认知科学由此得以与文科领域拥抱联姻。人文学者努力借助认知科学的力量支撑对人文学科价值的信念,自然科学家也乐于验证人文科学的假设。不过,正如 Meir Sternberg (2003: 314)所指出的,很多文学认知研究因忽略了理论传统而效果平平;Marie-Laure Ryan(2010: 471-472)也抱怨目前大部分叙事认知研究缺乏新鲜见解,只不过证实了我们早就知道的东西。

在文学研究界,认知转向与伦理批评的回归几乎同时发生。认知科学研究帮助我们理解主观世界与生理机制的关联,验证人文学者的诸多假设,但并不能真正引导我们如何做出主观反应,而伦理批评恰恰强调对主观反应的现实引导。伦理批评可以使文学研究在接纳认知科学的同时得以保留自己的领地,同时,对于文学功能的探讨可促进两股潮流的互动与结合,使两者殊途同归,共同彰显文学的独特魅力、促进文学的各种功能的更有效发挥。

目前,随着新一轮的素质教育热潮的兴起,文学教师正赶上了演绎文学功能的新机遇。学生综合素质的下降,尤其是心理问题的不断突显,比比皆是的高分低能等情况,使大家重新意识到博雅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文学课程作为博雅教育中的重要一环重新得到重视。笔者作为所在的 985 高校的文学类核心素质公选课程负责人之一,努力结合认知研究成果与伦理观照进行文学教学实践,期待改善国内文学研究与文学教学严重脱节的现状,有效发挥文学的各项功能。

2. 认知理论观照下的文学功能

斯坦福大学教授约书亚·兰迪将小说功能总结为四种:示范功能、情感交流功能、认知功能以及“塑造”功能(Landy, 2012: 171)。示范功能既包括典型人物对读者所具有的示范作用,也包括叙事形式为我们认识自己的人生提供的表达形式参考。情感交流功能包括情绪的宣泄、复杂情绪体验的激发以及共情(empathy)能力的培养,而共情能力往往被视为向善的基础。诗人雪莱(Shelly)(1994: 961)指出:“一个人要想高尚,必须深刻而广泛地想象;必须站在许多人的位置上思考。”认知功能指获得对自我、作家、文化语境以及世界的理解(Landy, 2012: 171-176)。兰迪认为,这三种功能强调小说“说”(say)了什么,而“塑造”功能则强调它“做”(do)了什么。“塑造”类小说“训练”我们的“技能”(skills),让我们知道在情感控制、社会意识、逻辑推

理、假设生成、有意自欺、宗教信仰等方面“怎样做”,使我们“更好地完成文本期待我们做的事情”(Landy, 2012: 183-184)。兰迪对小说功能的总结、尤其是对其实践意义的强调代表着众多文学工作者的美好信念。

认知科学为解释上面所提及的各种文学功能提供了有力支撑。奥莱夫·霍克等学者通过实验发现语言阅读与身体动作之间的联系。当受试者读到某个表示身体部位(如手、脚、嘴巴)动作的词汇时,大脑激活了动作神经元区域,该区域与人做对应的实际动作时激活的神经区域相邻或交叉(Hauk, et al., 2004: 301-307)。这部分解释了人在阅读时为何能产生类似于亲历的效果。国际顶尖自然科学杂志《科学》上的《阅读文艺小说提高心理理论》(2013)一文更是直接提供了实验证据,强调对读者提出较高要求的文艺小说比一般大众小说或非小说类更能提高心理理论(Kidd & Castano, 2013: 377-380)。“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简称 ToM) 又称“读心能力”(mind reading),指我们理解他人行为背后的思想、情感、信念、欲望等心理状态、并预测其后续行为的能力。它一般被分成两种:情感心理理论(affective ToM)和认知心理理论(cognitive ToM)。前者用于分辨和理解他人情感,和“共情”能力密切相关,后者则用于推测他人思想、信念和目的。科学家通过研究自闭症患者发现,自闭症往往表现为对虚构和故事讲述缺乏兴趣,而叙事对于培养“心理理论”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我们获得自我中心视角以外的他人视角以及时间意识等。“心理理论”为兰迪所说的“情感交流功能”、“认知功能”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充分发挥文学的功能,我们在文学教学设计中首先得精心挑选对读者具有一定挑战的文本;其次,针对兰迪所说的文学的示范功能、情感交流功能、认知功能以及“塑造”功能,我们需要一一设计对应的教学环节。

3. 教学实践:以《堪萨斯》为例

相关教学实践是在笔者负责的全校性核心素质课程“西方经典文学著作选读”上展开的。收集的数据来自笔者六个学期所授 12 个班共 460 名学生。

3.1 文本选择与问题聚焦

美国当代作家斯蒂芬·多宾斯(Stephen Dobyns)的短篇小说《堪萨斯》(Kansas, 1999)在主题上和形式上对授课学生都提出了挑战。该文本讲述主人公因自己在一件突发事件中无作为而抱恨终身的故事。前半部分描写一个 19 岁的男孩在搭乘一个农民的顺风车去暑期学校的过程中,发现该农民正带着手枪驱车追赶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男孩怕惹火上身,搭车途中一直不敢和农夫进行过多交流,所幸他到达目的地下车时农夫还未追上那辆车。下车之时农夫警告男孩不要报告警察,男孩答应了他并遵守了承诺。农夫事件到底结局如何?这成了压在男孩身上的一个永恒谜团,导致他临终之前,眼前出现该事件的四种可能幻象。临终场景以及这四种幻象组成了该故事的后半部分内容。在主题上,很多学生在预习完后认为主人公在突发事

件中的无作为完全符合常理常规,因此难以理解主人公为何对此耿耿于怀。在形式上,同时提供多种可能性的开放式结构也引起诸多学生的困扰,不知其意义何在。笔者意识到,此文本可以用来联系中国当下的一个普遍伦理问题。近几年不断发生的碰瓷事件、扶不起事件等类似现象将整个中国社会置于一个温水煮青蛙的道德滑坡险境中。面对在碰瓷事件、扶不起事件氛围中走进大学校园的新一代刚成年的学生群体,高校文学教师利用文学文本对他们进行伦理引导的任务变得迫切。《堪萨斯》在主题和形式上正好有益于引导学生反思国内众多的无作为事件。

3.2 学习准备:自我认知和读心能力初步训练

为了检测学生在学习之前的相关思想与情感状态,笔者在第一堂课上对学生关于“无作为事件”的态度与看法进行摸底测试。笔者将这次测试向学生解释为“理解能力”测试,以减少他们的戒备意识,引导学生尽可能说出真话。笔者首先向学生说明以下几点:①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培养理解能力,它既包括对真、善、美的领悟能力,也包括对黑暗面的理解能力;②对黑暗面的理解不是为了同情、认同或赞同,而是了解问题的根源,从而寻找对策,更有效地避免类似问题和悲剧的再度发生;③此次测试的是他们对争议事件的理解能力。既然是争议事件,难以说明对错。每个人心中都有人性的黑暗点,所以不必担心自己的回答不够理想化。只有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才能更好地理解人性和自我。

在完成上述说明后,笔者让学生当场在10分钟内快速完成问卷一。第一轮两个班的测试是实名制,后面学期的班则采取匿名制。从最终调查结果来看,实名制和匿名制没有显著区别,说明测试前的引导有效解除了学生的戒备意识,回答问题的诚实度较高。测试内容选2-3个国内近期具有较大影响力和争议的无作为案例,如2014年在深圳地铁口发生的梁娅事件、2012年在成都发生的赵涛事件、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2008年在汶川地震中发生的范美忠事件^①、2006年的彭宇案等等。此外,第一轮两个班的学生因没有让他们提前预习文本,因此根据《堪萨斯》情节设计的虚构的搭车事件也成为测试案例之一,以方便学生对照自己和主人公的行为之间的异同。所有案例测试的问题都是两个:第一个要求学生想象如果自己当时也置身其中,最可能做出何种反应?第二个则要求他们解释那些事件中相关人员无作为的可能原因。这个环节在完成摸底测试的同时,训练了学生的自我认知和换位思考的读心能力。

3.3 文本细读:读心能力强化训练及伦理引导

笔者在引导学生细读《堪萨斯》时从故事层和叙述层训练他们的读心能力,以帮助他们深刻理解该作品、产生良好的共情效果,进而促进他们的观念与态度的变化。首先,在故事层面,引导学生努力理解与人物的言行与背后的心理状态;其次,在叙述层面,引导他们努力理解作者写作材料选择、叙述技巧等背后的目的。

对于《堪萨斯》而言,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在于帮助学生理解小说后半部分的四种可能场景中的人物心理及其排序意义。主人公在这四种可能性以及前半部分提供

的原场景中的表现如下表所示:

原场景	男孩不敢多说,到达目的地下车,向农夫承诺不报警。
场景 A	农夫杀死妻子及其情人后开枪自杀,男孩只是目睹了这一切。
场景 B	男孩一路劝说农夫,成功引导农夫放弃追杀、将车开到警察局并将枪交给警察,而警察承诺要帮他处理该事情。
场景 C	男孩一路上一言不发,下了车后直接将农夫的杀人企图报告警察,结果发现警察将农夫开枪打死。
场景 D	男孩一路劝说农夫放弃原计划,当农夫用枪对准其妻子和情人时,男孩挺身而出挡在农夫妻子前面,子弹击中了男孩的要害部位。

在故事层面,笔者引导学生讨论了后面四个场景的特点、区别及其与主人公自我定位之间的关系,促使他们理解主人公的外在行为与思想、情感、信念、欲望等之间的关联,据此对主人公做出伦理判断。讨论结果总结如下:场景 A 中的男孩表现和原场景最为相似,而且场景 A 损失三条人命,客观上最惨烈,也因此是一般人最担心的。也许正是对这个最糟糕场景的忧惧,使得男孩难以原谅自己当初的无作为。那么,当意识已经无法压制这种忧惧时,它第一个从潜意识中跳将出来,进入了意识层面。男孩在这个场景中只是无意义地抗议了两声,体现出一种无作为的旁观者的自我角色定位;场景 B 是最美好的,无人伤亡,完全靠男孩在车里的劝说就使得农夫放下武器,解除危险。这很可能是因为第一种最糟糕场景进入意识后吓坏了意识主体,使主体本能地产生抵制和防御,让最理想化的、毫无损失的另一种可能代替和压制它。这体现的是最理想化的自我定位。然而,对于一个 19 岁的男孩,这种危机时刻的从容与口才更像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主体大概也意识到其过于理想化,于是,意识又滑入另一个极端;场景 C 大概是最让男孩良心不安的一种。因为农夫在极其痛苦的状态中依然对路边等待搭车的男孩施以援手,体现出他本质淳朴善良,也暗示他对追杀的犹豫。如果这样一个心地善良、备受屈辱且有恩于自己的人死于自己的告密,男孩的自我定位很可能是个卑鄙的告密者、忘恩负义之人等负面形象。农夫悲惨死去的场景和极度的自责可能使意识主体再一次难以承受,迫使意识朝另一个极端调整,即将自己从告密的“罪人”转变为第四个场景中的舍己救人、英勇牺牲的“英雄”。令人深思的是,也许是受国内扶不起事件的负面影响,有很多同学将第四个场景中的主人公自我定位为“可怜的牺牲品”。

针对场景 D 中的主人公自我定位的两种矛盾阐释,笔者在叙述层面引导学生思

考四个选项的排序方式反映出作家怎样的伦理选择。讨论结果如下:如果将其最后的自我形象定位为“牺牲品”,那么主人公最终就是郁郁而终,他一生受搭车事件困扰也就成了无法解脱、永无出路的人生困境。做出这种选择的“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是悲观的,认为主人公不管做何选择都是有害或于事无补的,其无作为也就变得似乎更加合理,而主人公的死也因此变成了一种讽刺,那么,作品的伦理功能也随之大打折扣。与此相反,如果将其最后的自我形象定位为“英雄”形象,则符合场景A-D的自我定位从糟糕到美好两级交替出现的心理规律。而且,让主人公在一生的自我伦理拷问之后以满意的自我形象安然逝去,这既传递出“隐含作者”的悲悯情怀,也符合基督教的宽恕精神。所以,结局的“英雄”形象不是基于主人公在搭车事件中的实际表现,而是基于主人公自我拷问的伦理意识。后一种英雄模式和中国文化中的“慎独”理念相契合,展现的是伦理的两面——自律性和社会性——的完美融合。社会性强调对他人负责,自律性强调自己内在的监督机制。由此,“隐含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当场的英勇行为之外的另一种救赎方式,即事后的伦理觉悟与升华以及相应的行动。这一种救赎方式对于我们走出无作为事件的阴影有非常积极的正面效果。

讨论结束后,很多学生,尤其是原来认为主人公最后定位是“牺牲品”的学生,表现出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大家意识到无作为事件可能影响人的一辈子,为了避免主人公的悲剧,自己要勇敢承担起社会责任。对于那些没能承担起相应责任的事件,大家要在反思中加强自己的能力,争取后面做得更好。譬如,刘思卓同学反思道:“人生有很多诱惑与借口,你随时都可以为自己开脱。但那样的人生是没有形状的,随意漫溢像一摊水。我希望我的人生是有形状的,通过我自己的修剪打磨反思克制,形成一个漂亮的冰晶。”她的话引起同学的热烈掌声。总体而言,文本细读讨论环节促使学生深切理解人物的道德困境及其思想、情感,完成读心能力训练,实现了情感交流功能、认知功能、角色示范功能和伦理引导,为实现塑造功能打下良好的基础。

3.4 走向文学的塑造功能

为了将学生的思想变化引向行动,在第一次课完成文本细读讨论之后,笔者布置了一项作业:模拟《堪萨斯》的开放式结构写一篇短文,讲述自己最遗憾的一件往事,并思考如果有机会重新经历该事件将有哪些可能性。如果没有遗憾的往事,则深入而细致地想象问卷调查中的相关事件的其他可能的不同应对措施。不管选择自己亲历的事情还是问卷调查中的事件,尽量暗示出自己将来最可能的选择倾向。

在第二次课上,笔者首先宣布了前一次课问卷调查的结果。数次调查结果体现出以下几点共性:其一,坦然承认自己会毫无作为的同学在10%—25%之间,事件本身的危险性和无作为的比例往往成正比^②。其二,选择有所作为的学生所采取的方式基本是报警,缺乏进一步的干预。在此基础上,笔者问学生:“如果你或亲友像梁娅那样突然倒在地上,获救的希望大吗?”学生听到此问题,往往呆住几秒然后难过地摇

头。这个问题使他们进一步意识到及时伸出援手的必要性,意识到救他人才有可能被救。接下来,针对问卷中的每一个案例,学生在自己所写的作文的基础上展开热烈的讨论,希望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以同学们对赵涛事件的讨论为例,如下表所示。

赵涛事件	高三学生赵涛在下晚自习骑车回家途中遭到精神不正常的龙辉狂砍。随着围观群众越聚越多,龙辉最终驾驶电瓶车逃跑,而赵涛因伤势过重身亡。
可能措施	迅速打电话报警,然后在歹徒的攻击范围以外大声呼救,并任意喊出几个名字,要他们快来,以震慑和驱逐歹徒离开。
	迅速联合其他人,身体较弱的人负责转移其注意力(如突然喊“那边警察来了!”或抛衣服过去阻碍其视线),其他人趁机以随身携带的包、伞、水瓶等为武器,或捡起石头,或折树枝为武器,袭击歹徒握刀的手和头部,打落其武器或扑过去将其按倒。

在讨论完各个案例之后,笔者请学生审视自己学习前后是否产生某些变化。学生反馈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①意识到这类事件都很可能发生在自己身边、甚至自己身上,帮助别人其实也是帮助自己;②意识到自身的胆怯与有可能不会去帮助的事实,不再把原来的无作为看作理想当然,而是感到内疚;③表示自己有了更好的应对紧急情况心理准备、更坚定了既保护自己又帮助他人的决心;④决心今后努力学习一些救助他人的知识以及保护自己的知识,以免措手不及。

为了进一步确认学生的变化,笔者在最初的两个实名制测试的班进行了第二次问卷调查,让他们在第二次课回忆自己前一次课写下的问卷调查的答案。结果发现,大多数学生对第一次问卷所作的回忆比实际回答更积极美好。因为是实名制,他们不可能故意回忆错。根据记忆科学理论,记忆深受当下目标和态度的影响(Greenwald, 1980: 603-618)。那么,学生被美化了的回忆可能正是因为他们当下的态度、目标及自我形象比学习之前变得更积极正面所致。如裴雪超同学所说:“之前的我可能傻傻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只会报警,或者只是心灵上的厌恶,口头上的批评,但我懂,这些和那些看了一眼什么也没做没有心灵的厌恶等的人是一样的,我没比他高尚多少,而现在我可能会做更多了,我懂得了该怎样为自己取证,保护自己,在获得了这份安全感之后,我就可以采取我的帮助他人的措施了。有时候讨厌自己,就基于讨厌那个有想法但不去做的自己。”

本课程虽然讲授的是外国文学,但努力与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教学实验结果对笔者产生莫大的鼓舞,意识到文学课程利用认知科学成果进行伦理引导确实能产生非常积极的效果,也深刻体会到跨文化、跨学科的视野和比较文学意

识能帮助文学教师更好地发挥文学的各项功能,促进文学与现实的深度互动。受此鼓舞,笔者在教育部的爱课程网上开设了一门名为“外国文学经典选读与现实观照”的 MOOC 课程,期待更多同行和学习者利用新媒体将外国文学研究、教学与当下现实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注释:

- ①范美忠事件只在第一轮两个班测试中使用过。在后来的班级中,笔者为了进一步引导学生坦诚面对自己内心可能的黑暗面,以自己在 2008 年地震中的表现为例,反思自己当时面临的伦理困境,并由此谈及自己对范美忠事件的看法。因此该事件后来不再用来测试学生,而是用于做测试前的引导。后来的调查反馈结果显示,老师主动剖析自我的做法得到学生的高度认同,也因此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回答测试问题的真诚度。
- ②唯一的例外是赵涛事件,其无作为比例一般只有 10% 左右。这大概是因为该事件的受害人是成都本地的重点中学高三学生,而笔者班上很多本地学生,尤其是那些毕业于该校的学生容易产生必须帮“自己人”的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 [1] Dobyns, Stephen. Kansas [G] // Laurie G. Kirsznner & Stephen R. Mandell. *Literature: Reading, Reacting, Writing* (5th ed.). Peking UP, 2006.
- [2] Greenwald, A. G. The Totalitarian Ego: Fabrication and Revision of Personal History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0(35):603-618.
- [3] Hauk, Olaf, Ingrid Johnsrude & Fridemann Pulvermüller. Somatotopic Representation of Action Words in Human Motor and Premotor Cortex [J]. *Neuron*, 2004(January 22):301-307.
- [4] Kidd, David Comer & Emanuele Castano. Reading Literary Fiction Improves Theory of Mind [J]. *Science*, 2013(342):377-380.
- [5] Landy, Joshua. Formative Fictions: Imagin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Training of the Capacities [J]. *Poetics Today*, 2012,33(2):169-216.
- [6] Ryan, Marie-Laure. Narrat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A Problematic Relation [J]. *Style*, 2010, 44(4):469-495.
- [7] Shelley, Percy Bysshe. A Defence of Poetry [G] // Duncan Wu. *Romanticism: An Anthology*. Oxford: Blackwell, 1994.
- [8] Sternberg, Meir. Universals of Narrative and Their Cognitive Fortune (I) [J]. *Poetics Today*, 2003, 24(2):297-395.

责任编辑:陈 宁

中美“苏学”学术话语与理论视角比较研究

万 燚

(四川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 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 由于深受西方学术思想浸淫, 美国学者在苏轼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渗入西方学术话语。如在评价苏词的贡献及地位方面, 尽管中美学界有大致相同的结论, 且常从题材内容、意境风格、形式音律等角度着手予以论述, 但在话语表述上依然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中国古人评苏词, 往往用具体的形象比喻, 给人以美感; 而美国汉学界评苏词, 则往往是抽象的论析, 运用概念、推理等分析手段, 使得整个论析显得严密、精确。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与国内苏学在理论视野上也大异其趣, 他们通常运用西方人文社科理论视角审视苏轼及其文学创作。论文以中美学界关于苏轼“以文为诗”的研究为例进行解析。

关键词: 中美苏学; 学术话语; 理论视角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Academic Discourses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Studies on Sushi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WAN Yi

Abstract: The Western discourses of social sciences are often used in studies on Sushi by American scholars for the reason that American scholars are influenced greatly by western academic thoughts. Take the study on the historic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of Sushi's ci poetry for instanc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academia occur in terms of academic discourses though the similarities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analysis of poetic contents, images, styles, rhetorical methods, and so on. For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simile is one of the most appropriate rhetorical methods to demonstrat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Sushi's ci poetry so that the readers could appreciate the profound beauty of Sushi's ci poetry; however, in American academia, scholars are inclined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and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 2015 年度课题“英语世界的苏轼研究”(SC15E043)和四川理工学院科研基金人才引进项目“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2015RC6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万 燚, 女, 四川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 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员, 主要从事海外汉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syntax of Sushi's ci poetry with abstract conception and deduction, thus their prudent and logical thought are quite outstanding. Furthermore, great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i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commenting Sushi's ci poetry. American scholars discuss Sushi's literary 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thoughts from western social science, the analysis of Sushi's "taking prose as poetry" is the typical instance.

Key words: studies on Sushi in China and America; academic discours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0. 引言

中美苏学研究,无论是在研究历史、规模上,还是在成果上都存在较大差异。美国的苏学研究历史短、规模小,成果相对而言也少。在1947年林语堂的《乐天知命的天才:苏东坡传》出版之后沉寂了一段时期,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进入全面发展阶段,至今也不过近60多年而已,且研究人数并不多,规模有限,还非美国学界的主流学术;而中国的苏轼研究史已近千年之久,研究人员之多,研究规模之大,早已居于被研究的中国传统文人前列,其成果也是汗牛充栋,难以计数。就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不足20年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发表了研究文章(包括赏析性文章)1100余篇。……还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孙毅,孙学堂,史伟,2001:692)又据《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4-2005)》统计,仅两年期间,“有关苏轼研究的论文三百四十多篇,专著二十多部”(刘扬忠、王兆鹏、刘尊明,2007:35)。而美国汉学界的苏学研究成果无法与之比肩。当然,美国的苏轼研究较之其他中国古代文人的研究而言,成果又相对丰硕。不但在规模上美国苏轼研究远不如中国,而且在研究的广度、深度上也难以匹敌。但正如宇文所安所言:“我们惟一能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新问题的提出和对旧问题的新回答,这两者具有同等的价值。”(Owen, Stephen, 2003:1)因此,中美苏轼研究还是有比较的可能性。而且由于美国学者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理论话语、治学方法,在对同一问题进行审视时,往往有我们无法看到的地方,值得我们去辨析与深思。

只有将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与中国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横向对比、鉴别,从自我与“他者”共同关心的理论命题中发现彼此理解与思考的共性与差别,再上升到中西诗学对话层面进行深入探讨,比勘两种不同话语的异同,才能更深刻、具体地认识中美苏学各自的研究特色,领略它们各自的独特韵味,也才能形成中国本土话语与域外话语的互动,推进中国的苏学研究与文艺理论建设。

1. 学术话语比较

作为深受西方学术思想浸淫的学者,美国学者在苏轼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渗入

西方学术话语,同时这也是海外汉学研究的突出特征。所谓“话语”,指“在一定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中形成的思维、言说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法则,是一种文化对自身的意义、建构方式的基本设定,它包括了术语概念层、话语规则层和文化架构层由表及里的内容”(曹顺庆等,2001:407)。将西方学术话语与中国学界的批评话语进行比较,探索话语言说方式背后文化规则、思维方式的差异,可以深化中西诗学的对话研究。

我们以中美学界关于苏词地位的评价为例予以简略分析。传统文论界虽然对苏轼变革词的贡献存在争议,但总体而言对苏轼的贡献还是有较高评价:

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胡寅《题酒边词》)(郭绍虞,2001:360)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辛弃疾,1993:599)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刘熙载《艺概》)(刘熙载,2009:497)

上述四家论东坡词之地位,均以中国传统诗学眼光视之,或用象喻比之,或以“境”论之。进入近现代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西学涌入,传统诗学批评势力犹在,故呈现出中西诗学交杂之态势。如胡适与龙榆生对苏轼在词史上的地位评价道:

东坡以前的词只是写儿女之情的,下等的写色欲,上等的写相思,写离别,以风格论,轻薄的固不足谈,最高的不过凄婉哀怨,其次不过细腻有风趣罢了。苏轼的词往往有新意境,所以能创立一种新风格。这种风格,既非细腻,又非凄怨,乃是悲壮与飘逸。(吴奔星、李兴华,1991:492-493)

自《乐章》盛行,创调既多,慢词遂盛。耆卿诸作,既多为应歌之词,杂以淫哇,不免为当世士大夫所诟病;而体势拓展,可借以发抒抑塞磊落纵横豪放之襟怀。有能者出,乃出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一扫妖淫艳冶之风,充分表现作者之人格个性。此亦势所必至,而眉山苏轼即乘此风会而起,于词体拓展至极端博大时,进而为内容上之革新与充实;至不惜牺牲曲律,恣其心意之所欲言;词体至此益尊,而距民间歌曲日远。陆游所谓‘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者,此其特具之精神也。(龙榆生,1997:254)

二人都认为苏词拓展了词之体势,抒发了苏轼“磊落纵横豪放之襟怀”,扫却“妖淫艳冶之风”,体现了苏轼的“人格个性”,此乃词之“势所必至”。还认为苏词在词体上的拓展,内容上的革新与充实,提升了词体地位。从学术话语来看,二者都夹杂使

用传统诗学话语与西学话语,胡适评苏词重“意境”与“风格”,而意境为传统诗学范畴,风格则系西学引入;龙榆生评苏词重词之“体势”、“内容”与“精神”,也可作如是观。

而当代中国学术体系,传统一脉已经断裂,西方学术话语充斥其间,如王兆鹏评苏轼在词史之地位道:

在苏轼之前,柳永已经将词世界红粉佳人一统天下的格局打破,其 60 多首羁旅行役词,已经展示出了“升平”时代一位为追求功名利禄而“携书剑”浪迹天涯、四处干谒却屡屡失望、苦闷的下层士大夫形象。这一形象的出现,促使词世界中女性统治地位的崩溃与解体,成为词世界里抒情人物形象转换的枢纽,使词的抒情人物形象从类型化、非我化向着自我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但柳永词里的士大夫形象还有些平面化、单一化,直到苏词出现,才更为丰富地展示出失意苦闷的文人士大夫的人格个性、精神风度、命运遭际的多元侧面:疏狂浪漫、矛盾苦闷、超然旷达、任性逍遥、执著地追求人生的理想、思考人生的意义和归宿,但人生的理想和愿望始终未能实现。柳永词,只是着重表现他在人生旅程中的追求与失落,或表现他在风月场中的蜜意幽欢和他的多才多艺,未能展示他内心世界、人格精神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东坡词所创造的东坡居士形象要丰富复杂得多,多角度展现出抒情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度。(王兆鹏,1994:1)

与前面所述论者相较,王兆鹏论词虽传统诗学意蕴犹在,但体现出较强的西方学术色彩,所用术语如“抒情人物形象”、“类型化”、“非我化”、“自我化”、“个性化”、“平面化”、“单一化”等基本上属于西方学术范畴,是新一代词学家吸纳西方学术话语及表述方式的代表。

可以说,从胡寅到胡适、龙榆生、王兆鹏,代表了中国学界苏词批评发展流变,胡寅、刘辰翁、刘熙载等论苏词,体现出中国诗学重体验、感悟、印象的特点,反映出中国古人偏重直观感悟的直觉思维,当下中国苏学研究,在传统诗学中融入西学因子。与之相较,美国汉学界对苏词地位的评价与中国学界相若,但却有明显的西方学术印记,他们往往是用条分缕析的方式展开论析,体现出西方诗学普遍讲究分析的逻辑严密性,且大量使用西方学术术语,往往使用一些抽象的概念,孙康宜、艾朗诺均如此:

苏词的“明确修辞”(explicit rhetoric)即“不是 A 而是 B”的表述方式,是一种积极的阐释行为。这种技巧的力量在于表明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强烈的观点。比如:“不见居人,只见城”、“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恩留人不留”等。这种“明确修辞”手段,加上“艺术面具”常常表现出的怀疑的感情,二者勾连在一起。在《水龙吟》和其他词里,诗人似乎一直都在清醒地探索这一手段,运用它来获得一种“悖论”的艺

术效果。比如:“似花还似非花”、“日出西山雨,无晴又有晴”、“欲去又还不去”等。富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水龙吟》里,“艺术面具”在表达怀疑感情时又使用数量比例来描绘事物,那种比例的精确就像一个警觉的记者或评论员在评论文里进行反映和推论。(Kang-I Sun Chang, 1980:190-191)

苏词与其他词人的显著差异在于,其他词人往往书写风流韵事、妇人美貌,表达的是与历史作者真性情有一定差异的情感,即“艺术面具”(persona),而苏词则追求一种“天真”(natural genuineness),努力在词中发出“诗人之声”(poetic voice),重视真情的表达,注重自传性细节的描写,赋予离愁别绪题材以新的力量。与苏诗力图超越主观性相异,苏词却努力凸显主观性,发出高度个人化的声音(Ronald Egan, 1994: 319-326)。

在孙康宜对苏词的分析中,“明确修辞”、“艺术面具”、“悖论”、“反讽”等均为非常抽象化的概念表述;艾朗诺所使用的“艺术面具”、“诗人之声”、“自传性细节”、“主观性”、“个人化的声音”等也为典型的抽象概念表述,均系典型的西方诗学话语。而以纯粹的西方诗学话语为工具在中国苏学研究中实难以见到。

综上,在对苏词的贡献及地位,中美学界有大致相同的结论,且常从题材内容、意境风格、形式音律等角度着手予以论述,但由于学术传统、文化规则不同,在话语表述上依然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中国古人评苏词,往往用具体的形象比喻,给人以美感;而美国汉学界评苏词,则往往是抽象的论析,运用概念、推理等分析手段,使得整个论析显得严密、精确。这种截然异趣的分别,其实也是中西诗学的差异。中国文学批评注重言外之意的话语言说方式,“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凄婉哀怨”、“细腻风趣”、“悲壮飘逸”等以“简言以达旨”,是一种“无中生有”,体现了“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而西方诗学话语注重抽象的、逻辑性的、系统性的分析,运用抽象概念如“艺术面具”、“抒情声音”、“抒情自我”、“悖论”、“反讽”、“主观性”、“客观性”等术语进行精细的阐释与论析,尤其注重对作品结构肌理的条分缕析,往往能将复杂的理论问题阐述得清晰、明确、深刻、透彻。这种注重形式结构的“本体研究”极其细致,是一种“有中生有”,体现了“逻各斯”的意义生成方式。

2. 理论视角比较

中西学术批评由于在文化传统、思维模式、价值判断及研究旨归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决定了批评者的理论视野也迥然有别。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与国内苏学在理论视野上也大异其趣,他们通常运用西方人文社科理论视角审视苏轼及其文学创作。兹举中美学界关于“以文为诗”的研究为例进行解析。

在中国文论史上,对于苏轼诗歌创作的“以文为诗”倾向,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

对立的观点:一是批评反对,以陈师道、严羽、张戒、王士禛为代表;二是赞赏肯定,以赵翼、纪昀为代表,今人葛兆光(葛兆光,1990:77-92)、朱靖华(朱靖华,1993:35-58)、王洪也持支持态度。中美学界对于苏诗的这一重要特征均给予了持续关注,时至今日,依旧聚讼纷纭。我们选取两位有代表性的中美学者进行比勘辨析,美国汉学界以何大江为代表,中国学界以王洪为代表。两位的观点存在暗合之处,但由于理论视角不同,也呈现出较大差异。

两人都认为苏轼“以文为诗”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合理现象。何大江从诗歌发展角度提出,苏轼“以文为诗”是诗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苏轼之前的唐代诗人李白、杜甫、韩愈诗里,已有“以文为诗”之倾向,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发展到宋代诗人苏轼手里,“以文为诗”才发展到成熟状态,从整体上奠定宋诗的美学风格。何大江还补充道,并非所有宋代诗人都是“以文为诗”,比如贺铸、王安石就更倾向于唐诗风格;也并非所有“以文为诗”的诗歌都有相同的表现方式,而是反映了各自的声音与风格特征。比如黄庭坚及“江西诗派”,黄庭坚虽与苏轼并称“苏黄”,但却有自身独特的诗人声音与表现方式(He, Dajiang, 1997:3)。

国内学界王洪也从诗歌史角度论“以文为诗”产生的合理性,其《苏轼诗歌研究》本着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立场,认为“以文为诗”之“文”,指的是唐宋古文运动之“文”,和“骈文”相对,是散行单句,不拘骈偶,不讲对仗、对偶、音律等文体。它以恢复先秦两汉散文传统为旗帜,实际上是适应新历史时期社会生活发展需要,以便更好地抒情表意的新兴自由文体。“以文为诗”之“诗”,是指六朝至唐以来形成的诗,不是《诗经》之诗,也非现代新诗,而是“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音、音分平仄,讲声律、对仗、对偶的近体诗”。因此,韩愈、苏轼等人的“以文为诗”,正是以这种便于表情达意的、形式较为自由的“文”,来改造这种形式方面过于束缚拘谨的“诗”。(王洪,1993:53)

在王洪看来,所有的艺术均可分为“自然艺术”与“人为艺术”两类,尽管“艺术”都是人为的,但根据艺术与生活吻合的程度又可分为上述两类。这两类艺术的对立面一直存在于诗、词、曲等艺术门类中,只是不同发展时期彼此的位势不同,但都并行存在、对立统一。诗至六朝,因曹丕“诗赋欲丽”、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提出,“以诗为诗”突出,“人为”艺术凸显,至盛唐推至极致。但尽管如此,依然有陶渊明诗的素朴、平淡,也有李白诗的“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说明艺术的两端一直存在着。苏轼的“以文为诗”,也并非苏轼突发奇想,凭空而起,而是在继承吸纳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诗风的基础上创新而成。李白借助古风表达在近体诗里难以表达的思想情趣,杜甫首创拗体(拗体实质就是近体诗不合规则的合法化),韩愈将“古文运动”倡导以散行单句取代表达不自由的骈文。在诗歌领域即是“以文为诗”,以散文字法、句法、章法破坏传统诗规,白居易提倡诗歌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语法构句上追求近于口语,“新乐府运动”即是对六朝以来“人为艺术”的反拨,对先秦、汉魏“自然艺术”的

高层次复归,“元白诗体”即是“以文为诗”形成史上的一个环节和链条。总之,李、杜、韩、白分别从不同方面奠定了苏轼“以文为诗”的基础。因此,苏轼“以文为诗”是诗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语言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也是审美风尚的发展变化所致(王洪,1993:68-76)。

可见,在“以文为诗”是否合理的问题上,两人见解近似,均认为“以文为诗”顺应了诗史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一种必然产物,且至苏轼手里才发展到极致,是宋音区别于唐调的重要方面。但细究起来,二者的研究仍然存在细微差异。王洪是从诗歌发展史上“自然艺术”与“人为艺术”的对立统一角度论苏轼“以文为诗”的合理性,肯定苏轼追求艺术“自然”之境审美理想乃历史必然,基本上是从艺术形式如语言、语法等层面来看问题;而何大江虽同样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论,但却着重从“诗人声音”(指诗人思想)的表达需求这一点来看,前者侧重于艺术形式本身,后者则侧重于“诗人声音”的表达需要方面。这一细微差异在两人探讨苏轼究竟如何“以文为诗”以及“以文为诗”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等问题时体现得非常明显。

两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展开了讨论。王洪主要从艺术形式上论苏轼如何将散文的语言、语法等运用到诗歌创作上,具体探讨了字法、句法、章法等方面,论述苏轼对诗歌艺术形式实施的改造,使诗歌更接近社会生活的原形,更具有“自然艺术”的性质(王洪,1993:77-107),始终将关注点置于“以文为诗”的形式特征上,这实际上是对传统诗法理论的合理运用。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何大江则运用俄国理论家巴赫金的“文类观”论述苏轼“以文为诗”,认为“以文为诗”属于一种独特的“文类”,而“文类”不是由一系列形式特征确定的,而是一种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方式。“以文为诗”即是一种认识世界、反映世界、阐释世界的特殊方式。每一种“文类”只能认识社会、世界的某一方面,换言之,每一种“文类”都是“盲点”与“洞见”的结合体。由此出发,何大江提出,苏轼“以文为诗”是苏轼独特世界观的表达方式,换言之,是苏轼“多元价值观”与“平凡中的智慧”世界观的表达需求决定了“以文为诗”,唐代近体诗已不能适应苏轼独特世界观表达的需要,必须以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来满足需求。甚至何大江还认为这种新方式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He, Dajiang, 1997:45)。

由上可知,何大江强调“以文为诗”并非只由诗歌形式来判定,还由诗人内在的世界观或看世界的方式共同决定。如果说王洪的研究是一种对传统诗学的合理运用,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看文学;那么,何大江则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看文学。同时,何大江也论述了“以文为诗”这一特殊文类的特征,比如诗境的阔大,题材的拓展,语言的多样、生活化与表现力的强大,其中,语言表现力的强大是此文类的突出特征。何大江还引用朱弁、缪钺等学者之语论证苏轼语言的表现力。

虽然何大江在阐述苏轼“以文为诗”作为文类在语言、意境、题材等方面的特点时与王洪等国内学者的见解殊途同归,但在对“以文为诗”的决定因素上存在着根本差异。何大江以“文类是由特定时代诗人声音表达的需要所决定”作为理论出发点,

而王洪则是以“‘以文为诗’是吸纳散文字法、句法、章法入近体诗”为理论出发点,两者的理论视角、研究路径完全不同。尤其是何大江把苏轼“以文为诗”放到苏轼在中国思想发展史的阔大语境下来审视,提出苏轼“价值多元观”与“平凡中的智慧”的思想决定其必然以“以文为诗”这一“文类”来表达,挖掘文学现象背后的思想背景,对国内学界的研究无疑是一种有益补充,具有借鉴意义。

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何大江借用巴赫金“文类观”视苏轼“以文为诗”为一特殊文类,试图突破中国文类史上的传统定义,这种以西方“文类”理论审视中国文学的作法,虽然发前人之所未发,具有突破“藩篱”之特性,但从另一角度看也存在一定学术风险。艾朗诺曾提出,苏轼并未新创任何文类,只是在前人基础上不断涵泳,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毕熙燕,2003:1)。或许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巴赫金“文类观”提出的语境是什么?其适用阈限有多大?是否适合中国诗歌研究?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参考文献:

- [1] Dajiang, He. *Su Shi: Pluralistic View of Values and Making Poetry Out of Prose* [R]. Ph. D. dis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7.
- [2] Kang-I, Sun Chang.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 [3] Ronald C. Egan.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4] Xian, Bi. *Creativity and Convention in Su Shi's Literary Thought* [M].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2003.
- [5] 曹顺庆等.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 [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1.
- [6] 曹顺庆. 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1): 123-130.
- [7]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8] 葛兆光. 从宋诗到白话诗 [J]. 文学评论, 1990(4): 77-92.
- [9] 刘熙载. 艺概注稿 [M]. 袁津琥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0] 刘扬忠, 王兆鹏, 刘尊明. 宋代文学年鉴(2004-2005) [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7.
- [11] 龙榆生. 龙榆生词学论文集 [G].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12] 史蒂芬·欧文. 初唐诗 [Z]. 贾晋华, 译.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2003.
- [13] 孙毅, 孙学堂, 史伟. 宋代文学研究(下册)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 [14] 王洪. 苏轼诗歌研究 [M]. 北京: 朝华出版社, 1993.
- [15] 王兆鹏. 唐宋词词的审美层次及其嬗变 [J]. 文学遗产, 1994(1): 48-60.
- [16] 吴奔星, 李兴华. 胡适诗话 [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1.
- [17] 辛弃疾. 稼轩词编年笺注 [M]. 邓广铭笺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18] 朱靖华. 苏轼新评 [M]. 香港: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3.

责任编辑: 冯 革

“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徐盛桓教授访谈答问录

华鸿燕¹ 廖巧云²

(1.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5; 2.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 重庆 400031)

摘要:本访谈首先探讨的是青年学者如何从事语言学前沿研究以及怎样运用所学的语言学理论参与其中,接着以具体的话题“语言表达式的转换与植入”和“如何认识认知神经语言学”为例深入剖析了语言学前沿研究应该如何进行。最后,徐盛桓教授谈到自己做语言学研究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徐盛桓教授;语言学研究前沿;语言表达式转换与植入;认知神经语言学

“I can Hardly Tell You How I have Enjoyed Myself”: An Interview with Prof. Xu Shenghuan

HUA Hongyan LIAO Qiaoyun

Abstract: Prof. Xu Shenghuan talked about, during this interview, the important issues concerning the new bearings in linguistic researches, including how senior scholars are engaged in the researches and how they can make use of the theories of the different linguistic schools. At the same time, Prof. Xu also talked about the problem of transduction-and-grounding of a linguistic expression and the research of Neuro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the interview, Prof. Xu also talked about his own linguistic studies.

Key words: Prof. Xu Shenghuan; the new bearings in linguistic researches; transduction-and-grounding of a linguistic expression; neurocognitive linguistics

【记录者按语】本访谈记录者为华鸿燕、廖巧云。华鸿燕是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硕士阶段师承徐盛桓教授;廖巧云是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徐盛桓教授的博士后。我们受《英语研究》杂志编辑部之托,趁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修辞的神经认知语言学研究”(11XY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华鸿燕,女,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

廖巧云,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认知神经语言学、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

2016年国庆节放假期间,在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南楼徐盛桓教授工作室,我们对徐盛桓教授做了一次学术访谈。徐盛桓老师现在是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全国模范教师;曾兼任四川大学、西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导师和其他一些学校的特聘教授或兼职教授。徐盛桓教授是“奔八”年纪的人了,仍然十分健谈;他思路敏捷,眼界开阔,见解深刻;他引用宋词名句“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来表达他在语言学研究那种悠然意会的愉悦心情。现将访谈记录如下,以飨读者。(记录曾送徐盛桓老师审阅,本文中图示由徐盛桓教授提供。)

华鸿燕(以下简称“华”):徐老师,谢谢您抽时间接受我们的访问。听说你回来是准备国庆假期后给一年级研究生上课,讲“学科前沿”讲座。我很好奇,也有点纳闷,一年级的研究生今年九月份才入学,只是上了几天语言学的课,怎么就能讲“学科前沿”课呢?

徐盛桓(以下简称“徐”):按照院研究生教务办的安排,我这次上课讲两次讲座。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在当前社会变革大时代,哲学社会科学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深刻阐述了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意义,特别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遵照习近平的指示,准备在这两次讲座中着重引导这些研究生新同学领会习近平讲话的精神,为进入语言学学科前沿的研究做好准备,为日后在学科前沿研究中产生理论、产生思想做思想准备,而不是讲语言学的知识。

廖巧云(以下简称“廖”):但是,研究生要进入语言学学科研究的前沿,要产生理论、产生思想,这是很不容易的。

徐:是的,我们进行语言研究要进入研究的前沿是很不容易的。研究生是“研究”的学生:一方面是学生,一方面又是要进行研究,所以要为进入研究的前沿作充分的准备。习近平指出,我们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而“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性突破正在开辟新前沿新方向。”(引自《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的三大方向》, <http://news.cctv.com/2016/06/02/ARTIYnK8mW4hE1hfbIzQ0ZY8160602.shtml>)我们希望从意识分析维度考察语言的运用,这就同探索意识本质的前沿研究方向一致。

过去的语言学研究生教育是读几本外国人写的语言学教程,主要是学知识,记住里面的概念、范畴一类知识性的东西。看来这是不够的,还要引导学生将语言学知识变为研究语言的理论,将语言学理论上升为语言研究的思想,为进入语言研究的前沿做好知识、理论和思想的准备。我觉得一个人产生理论、产生思想的动力、能力和基础,是他的人文精神养成的重要部分,是人进行理性思考、作出判断的一种思想状态,

是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说到底是人的人文素质的表现。为此,在研究生作为学生的阶段,光是学理论知识、记熟定义原则、会用概念范畴是不够的,最重要是将这些作为基础,作为自己生发理论生发思想的准备。建议须要注意:

(1)培养对知识的好奇心和对已有知识的健康、理性和有根据的怀疑,对前人说的知识进行开放的和不受束缚的思考和质疑;

(2)养成一种习惯,要理解人类知识的多样性及其在不同环境、不同水平、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的可能的运用,要知道知识是全面的、整体的、发展的、关联的;

(3)既然知识是全面的、整体的、发展的,那么我们在探索知识过程中,就不能停留在已有知识的获得和积累,不能只学习知识本身,更要重视知识探索过程的体验和重视知识探索的意义,更要重视知识的发现;

(4)知识的探索和发现的过程,是一个个人努力与集体的帮助和协作相结合的过程,是在团结协作环境下发挥个人长处的奋斗过程,因此,要关注自己个人的特点和集体境况的不同与统一。

总之,理论和思想的产生,是在个人健全的人格、素质和知识的基础上善于适应和运用社会环境的产物,说到底就是要做到关注自己个人的特点和集体境况的不同与统一。作为研究生的导师要注意引导,但是我认为作为研究生自己更要有自己的认识和承担,因为这是研究生对国家、对社会、对时代的承担。

华:这个说法很有启发,而且是我们以前比较少注意的。但我们应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呢?

徐:认识是行动先导,态度决定一切。我们是语言学的研究生,还是要回到语言学研究上来。在语言研究中,摆脱语言作为工具媒介的唯一功能,把探讨意识本质作为研究的一项任务,是当前语言研究的题中之义,因为语言是认知能力的一种表征,是观察大脑的一扇窗口,是探讨人的意识的一种途径。²¹ 21世纪是大脑世纪,我们研究语言就要从这些方面考虑。有了这样的认识,在语言研究中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为进入学科研究前沿做了一个方面的准备。

华:听您的说明,这似乎是指认知语言学的研究。

徐:不完全是。不错,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很重视从认知的视角和心智的视角研究语言;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人类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和大脑结构,有相同相似的生理功能和心理功能,面对的是相同或相似的客观世界,因此古今中外,人们的言说方式、语言产生的机制,基本上是一样的:语言运用都要依靠语言运用主体的大脑和身体,也都离不开同语言运用相联系的人际环境和所表达对象的情境,这就使语言运用的机制与表现形式,无论古今中外,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和人认识能力的限制,造成了不同时代的语言观的不同。到了现代,不同的语言观、不同的视域和不同的着重点,进一步加深了语言观的分歧,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学流派,例如我们通常说的生成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等,以及语言学科下同语言本体研究和有助于语言本体研究的分支学科,这就构成了宏大的语言学研究

叙事,也构成了语言学史;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学就是语言学史,语言学史就是语言学。这些语言学流派理论有着这样那样的不一样,表现为理论、范畴、概念和分析框架、分析手段、分析步骤的不同。因此,从外表看,这些语言学的面貌是很不相同的,有些论述看起来可能是分歧的、甚至对立的。但是,如果我们从语言的实际运用来说,因为语言现象是一样的,无论用哪一种语言学理论来分析,其结论应该大体是相同或相似的,虽然用到的名词、术语、说法、理论、方法可能不一样。例如,语法是不是自治的就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认知语言学认为,语法不是自治的,语法是象征性的,语法是概念化;但是,人们熟知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认为,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法,语法的自治就是这种不同的具体体现,语法规则并不在于是否真正或正确的意义上回应现实。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同我们的认识相联系的;只是这两种说法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维特根斯坦是在强调不同的实践活动有着相对的自治性的前提下表明,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法,在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的语法有相对的自治性;但是语言的语法组织的基本道理应该是同人们的日常经验基本相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法又不完全是自治的。语言哲学家陈嘉映说:“我们的各种实践活动,也都含有自治的维度。”(陈嘉映,2011:18)这全是说关于语法的自治性,但是对自治的维度就有不同的理解。

廖:这个说明很有启发性。我的理解,按照您所说,不同的语言学理论所面对的都是同样的语言运用的主体和语言研究的对象,因此不同的语言学理论有关的分歧与对立是可能得到消解的。

徐:不同的语言学流派、不同的语言学理论是长期的学术活动历史地留存下来的,是客观存在的;之所以会对语言运用有不同的认识,这里有研究主体的认识根源的影响,也有科学发展对研究对象揭示的深入而带来的认识深化,因此语言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时代的产物,但是必定同语言运用主体和语言研究对象的特点有关,例如各种语言学理论都会以不同的深度、广度和不同的形式提到主体在运用语言时要注意“语境”。现在语言学研究生所接受的语言学理论和语言学知识,往往是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在课后谈的某一学派的理论和观点,与其要消解,不如认真学好它,根据语言运用主体和语言研究对象的特点,更好地运用这些理论和观点。

华:这是很好的思路。

徐:下面我试图根据我们运用语言的特点,抽象出一些重要的概念和范畴,供不同的语言学理论背景的研究生同学思考和运用。这样的研究语言的理论,最明显的特点是整体性、关联性、过程性。语言运用时涉及主要的概念和范畴包括:语言运用、语言运用的思维、意向性、意识的双重结构、同一性、意象、事件和用例事件等。语言的运用,总要涉及这里提到的行为、事件和过程;只是语言学理论一般并不从这个角度来总结,因此初听起来会感到陌生,但是各人联系自己运用语言的经验,这些有关的行为、事件和过程就不会陌生,而会感到熟悉而亲近,用起来也不会有隔阂。下面我分别说一说,可能说得比较长。

(1) 语言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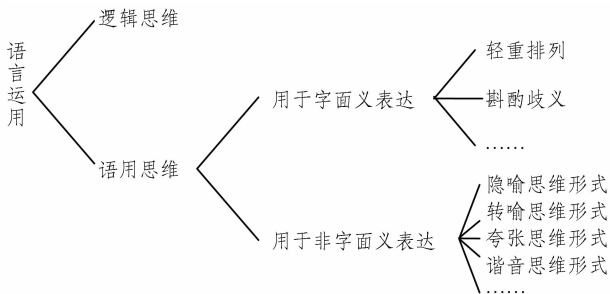
语言运用分为两类:运用的是词义的字面义和运用的是词义的非字面义。同想要表达的意向内容的概念字面义一致的表达式称为字面义表达,反之称为非字面义表达。句法研究在许多情况下所涉及的是字面义表达研究;同非字面义表达相联系有如下几项:修辞研究如隐喻、转喻、夸张、反语、谐音等,熟语研究中的委婉语、歇后语研究等和含义研究等。我们进行的语言本体研究不是前者就是后者,这样的区分就使我们建立起明确的研究意识——包括研究的对象意识和研究的工具意识,更好地开展研究。

(2) 语言运用的思维活动

思辨研究建立起的工具意识是指能明确地运用什么样的思维工具这一意识。语言运用涉及的思维活动包括逻辑思维和语用思维。

逻辑思维用于确定语句的合法性,这主要是运用演绎推理,就是根据一般性的前提对某一具体陈述作出判断性结论的过程。古代希腊人好辩论,寻根究底,产生对公理的研究,促进了逻辑学的发展,其中一个核心思想是追求形式上的有效性(validity),即有效的推理形式,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形成形式逻辑的演绎推理。演绎推理“都遵守肯定否定之对偶性、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他律,可称为四个基本原则”,这四个原则导出三个基本概念和两个根本:三个基本概念是否定、析取和蕴涵,两个根本是二分原则和推断关系;肯定否定之对偶性具体体现了二分原则,推断的有效性表现为真的前提一定得出真的结论。任何语言研究都要或者首先要确定语句表达的合法性,这就是以该语言的语法结构为前提,以拟表现的内容为参照以确定词语的选择、以表达主体的意向性为主导以选择和安排合适的表达形式,通过二分原则和推断关系获得语句的合法生成。语法研究包括语句生成研究、语法化研究和语法-语义界面研究,都须要获得语句的合法生成。

语用思维用于逻辑思维确定语句的合法性的过程中及之后。字面义表达是要获得语言运用主体在意向性主导下所做出的意向性表达式;在非字面义表达中,语用思维首先体现为含义思维,因为所谓非字面义表达就是用同意向内容的概念义不一的概念来表达想要表达的内容,这就像含义的表达;然后再分别体现为各种不同的思维形式,例如隐喻思维形式、夸张思维形式、谐音思维形式、委婉语思维形式等,如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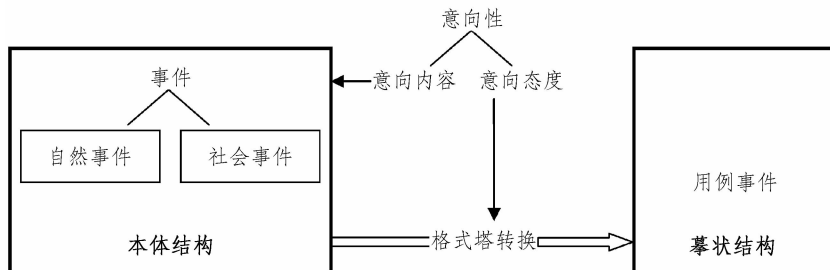


(3) 意向性

意向性是人的意识活动的一项核心内容,也是语言活动中意识活动的核心内容,是一次意识活动的发端,并贯串于这一意识活动的整个过程。意识活动是连接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中间环节,表现为主体在意识活动中对对象的注意、过滤、选择、表征时的心理状态,是意识活动在一定的社会生活过程和一定条件下在分配注意、行使选择和进行定位时的思维状态的反映,并呈现出判断、评价、表征的功能。把事件作出表征时就需要对事件的各环节作出判断和评价,这就需要主体意向性起作用;评价的条件主要是由语境和说话者的兴趣决定的。主体对事件的感知是以映像的形式出现在脑海里的;映像经过主体的调节就成为主体对事件所形成的意象。

(4) 意识双重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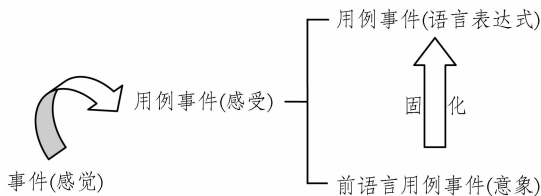
语言运用之所以需要一个意识双重结构,那是因为语言表达是由感觉意识发展为感受意识达成的。语言所表达的不是语言主体对自在发生的自然事件、社会事件的直接感觉,而是由此而所获得的感受。意识的感觉和感受的这两个结构体现为语言表达就是“事件”(event)和“用例事件”(usage event)。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本身是无边无界、浑然一体的,但在人们的长期世代和个体发育的视觉习惯上可以作出初步的区分,例如区分中心与背景以及简单事件和复合事件等。语言运用首先是主体所直接面对的这样的“事件”,事件是语言发生的结构。换句话说,语言运用就是据此在这里发生的。这是意识的一重结构,即语言发生的“本体结构”。然而,语言表达并不是直接地、原封不动地对自在的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本身的白描,而是在主体心理对有关的事件感觉的基础上获得的感受,即在主体意向性主导下,对所面对的事件及过去相关事件的感觉的基础上进行联想和想象,使事件在主体大脑里发生格式塔转换,成为主体对事件主要以意象的形式出现的感受,这就表示这一事件的其中一个“用例”,称“用例事件”,就是用语言结构摹状事件,称为语言表达的“摹状结构”,如下图所示:



(5) 事件和用例事件

在语言运用中有“事件-用例事件”(event-usage event)的假设。“事件”是语言所表达的对象在语言运用主体的心智留下的原始意象。主体对事件的感知是以映像

的形式出现在脑海里的;映像经过主体意向性的调节准备用语言作出表达,这就成为主体对事件所形成的用作表达的意象,这就是语言前“用例事件”,然后固化为用例事件,就是语言表达式,如下图所示:



(6) 意象

认知科学发展初期有一个研究认知科学的“斯隆报告”,指出认知科学的本质是研究智能实体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原理,其各分支学科都分享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就是发现心智的具象(brain-imaging)能力和计算能力和这样的能力在脑中的结构和功能。“具象能力”就是在大脑里将对象呈现为“意象”(image)的能力。意象通俗地说,就是脑海中以图像或图式呈现的对象内容。

(7) 同一性

同一性是指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是同一(identical)的。如果研究的最后结果表明,所得出的事件与用例事件和本体结构与摹状结构是同一的,那么就可以说,研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语言运用的过程古今中外是一样的,语言学理论是对这样运用考察后作出的总结和概括。这七项范畴是对语言运用所涉及的主体和表达对象所作出的刻画,但是由于语言学理论总结的主体对这些内容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取舍、不同的强调,所以就会有不同的语言学理论。我们希望这里所总结的概念和范畴,能够同大家运用语言的经验接近,因而为大家容易理解、接受和掌握。

廖:这是很好的概括。许多同学还想请您谈谈您自己的研究经历,给他们以启发。我知道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在1965年。

徐:是的,离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那时我20几岁,在华南师院外语系英语专业当助教。那是一篇一万多字同英美文学研究有关的论文。

廖:那么,您是怎样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徐:那时候我们大学四年级上课就读一本课本,课文选的是英美文学作品,课外读的也是英美文学作品,没有什么语言学之类的课程。我毕业以后留在华南师院外语系任教,所做的习作性研究就自然同文学研究有关。进行语言学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语言学理论较多地介绍到我国来之后我的语言学研究才开始的。不久前,我回顾我所经历过的研究,曾经尝试摘录三首宋词对我的

研究的心路历程做出描写: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这里是说,一开始我什么都不懂,处于懵懵懂懂、摸索尝试的状态,而且当时研究的人也不多,有点像李清照在《声声慢》里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这是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研究的情景。

廖:之后是怎样发展的呢?

徐:“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苏轼在《定风波》一词中写的。《定风波》是苏轼写一次同朋友郊游遇雨而无雨具的狼狈事,我这里借用,并无狼狈之感,只是觉得我的研究平平淡淡,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

华:您这是谦虚之说。来访问您之前我专门做了功课,查到进入 21 世纪这 16 年(2001-2016)里,您在我国语言类的刊物发表了 100 篇文章,其中仅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就发表了 14 篇,而所谈到的语言学论题都是比较新的。

徐:谢谢你替我做了统计。我只是在教学之余做了我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所以感到欣慰,有一种“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心情,像是宋朝词人张孝祥在《念奴娇·过洞庭》中写他在近中秋时节在洞庭湖面月夜“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的心情。

廖:徐老师,您现在在做什么新的研究?

徐: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我自己定的课题:语言表达式是如何生成和理解的。这里说的生成和理解是指:人的大脑里的认识是如何“转换”(transduction)成为语言表达式和人们读到一个语言表达式又如何“植入”(grounding)大脑的,这就是近来认知科学家在讨论的表现为逻辑式的语言表达式是如何同人的认知贯融的,这就是“植入认知”(grounded cognition)所要研究的问题。语言表达式是物质的,人们对语言表达式的认识是精神的,从哲学来说,这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问题。

认知科学是建立在脑科学发展基础上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目标是要揭开人类心智的奥秘。语言是心智的反映,而心智又是大脑的功能,所以语言是揭示大脑的一个窗口。认知科学最重要的事件是认知科学家从认知科学的计算模型转换到认知神经科学模型,也就是以大脑的神经活动作为研究的媒介,这个转换是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的。早期认知科学是非具身认知科学(non-embodied cognition),认为认知只是大脑的事情,进行的是像计算机处理逻辑符号那样的工作。到了八九十年代,发展为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随着认识的加深,出现了“4E+S”认知科学的新推进,就是陆续提出了除具身认知之外,还有“嵌入认知”(embedded cognition)、“生成认知”(enacted cognition)、“延伸认知”(extended cognition)和“情境认知”(situation cognition)。4E+S 认知克服了非具身认知比较狭隘的认识,认为心理活动、心理状态、心理过程和心理行为可以发生在大脑内,也可以发生在身体其他器官,还可能发

生在身体之外的世界中,这就对认知活动的发生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但是在语言运用的认知过程中心智如何处理语言形式符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就引发2008年巴索洛(Lawrence W. Barsalou)“植入认知”理论的提出(Barsalou, 2008:617-645)。

我运用“植入认知”的思想,将塑形符号作为认知活动的载体,在心智哲学的框架下将大脑里的“意象”作为语言运用过程中认知活动的载体,在《语言运用与意识双重结构》(2015:3-11)一文中论述了语言运用中的语言符号的转换和植入问题。基本思想是这样的:人们通过眼耳鼻舌身等的感官感知外界事物的物理信息作为语言表达的原初意识,意识是主体对信息感知后的产物,主要反映为主体大脑里不同形式、不同方式构成的映象,这就是在脑海里形成的“意象”。以意象作为语言意识的载体就可能说明和解释语言活动中的转换与植入的问题。不过,这只是一种假说,还有待从脑科学的原理和实证上做出论证。国庆假期之后,10月14-16日,由中国认知神经语言学会主办,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承办,在浙江省宁波市举行“中国认知神经语言学会高层论坛”,我将在论坛上作《指类句的生成和解读——转换与植入之谜》的主旨报告,用指类句的生成和解读作为例子,尝试说明语言符号的转换与植入之谜,即大脑里塑型符号的意象同语言表达式的逻辑式的互换。

廖:您能简单谈一谈认知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吗?

徐:认知神经语言学是运用脑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进行语言研究的新兴语言研究分支学科。人类很早就注意到大脑与语言的关系,早在19世纪后半叶,法国布罗卡医生和德国生理学家维尔尼克分别发现,大脑皮层左半球额下回后部的一个专门区域和大脑皮层的另一个区域,即左半球颞叶后部同语言运用有密切关系,前者的损伤会造成失语症,后者同言语的接收与生成有关;这两个皮层区域后来被分别命名为布罗卡区和维尔尼克区。

认知神经语言学研究包括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维度,两个维度的研究都不可偏废。思辨研究是要说明人在运用语言过程中脑机制特别是意识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并要为此作出形而上学的理论说明,既要说明这样的意识机制本身,又要说明机制背后的哲学问题;实证研究是通过记录、分析脑活动的情况,用以研究语言运用产生、接收、分析和储存的神经机制,从而提出假说或验证假说,从中说明这一机制同语言运作的关系。

我国认知神经语言学研究起步较晚,只有一些学校和学者做过一些汉语现象的“事件相关电位”(ERP, event-related potential)或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等的实证研究,通过生物电的测试来观察大脑在言语过程中的活动或被赋予某种刺激而发生的变化并从中体现出的特殊的心理意义。通过这样的刺激所引起的脑的电位变化可以观察语言认知过程中大脑的神经电生理的变化,也就是头颅表面记录到的大脑电位。实证研究是要说明本体论事实,说明何物存在;思辨研究要说明我们说是何物存在,是本体论承诺。“在通常的解释中,认为离开后者而讲前者,就是离开认识论的本体论,因而是独断论的本体论;以后者为前提而讨论前者,就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本体论,

因而达到了‘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的理论自觉。”(孙正聿, 2016:23)从我国认知神经语言学研究的现况来看,须要特别注意加强的是有关的思辨研究,须要提醒大多数的语言学研究的学生要注意研究语言的本体。

廖:这个说明既概括又有针对性。

徐:认知神经语言学开展的实证研究很重要,尤其是我国语言学研究工作者的自然科学基础一向比较薄弱。实际上,我国进行实证研究,无论是思想基础还是物质基础与技术基础都还比较薄弱;但相对来说,思辨研究的难度更大。我国还没有像克里克(F. Crick)、埃德尔曼(G. M. Edelman)、达马西奥(A. Damasio)等这样的脑科学理论家。前一段时间一提起认知神经语言学研究必称ERP,比较少关注思辨的研究,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就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谈翻译就必称奈达的“对等”论一样。这有其发展的合理性。只是我们要认识到,如果只停留在这里就会有局限性。

事件相关电位的实证研究的操作,本身是生物学、医学、物理学研究的操作;只有将电位的变化同语言运用的脑神经的变化联系起来才能进入到同语言研究有关。用认知神经语言学进行研究,要探究句法和语义变换背后的语言运用主体的意图与意向性的作用,这就必须同人的意识联系起来,从人及其活动的因素作出同语言运用的阐释,进入到语言研究。语言运用的语句词语以及语句词语所表现的客观对象都是物质的,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才能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而转换为ERP等所记录的电路或脑的图像,它们只有大小量的变化或脑图像的变化,或者充其量可以审视它们的N或P。这就带来了认知神经语言学的特点:从质的变化到量的变化的过程,这一点值得从事认知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者充分注意。

任何事物都可以从质和量这两个角度来考察。语言的表达式是靠表达式所体现的属性来满足人的交际需要,借用一个术语,这就使语句有了“使用价值”。但是,这样的使用价值难于在研究中揭示语言运用过程中各种语句在意识中的同或异。在认知神经语言学的ERP研究中,要看语句或词语呈现出的是P600或N400等的特征,这就使这些语言现象呈现出可同其他语言现象进行比较的特征,从而获得了“交换价值”。从运用其使用价值到运用其交换价值,实际上是一个从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原来的质的规定性这样内在的东西在认知神经语言学的研究中成了外在的东西,而原来的量的规定性这样外在的东西反而变成了内在的东西。这说明在进行认知神经语言学的ERP研究中,有关的语言现象从质到量的转换过程中,存在一个抽象的形式化过程,这种抽象化的过程,反映了语言运用某种普遍化。这种普遍化是人们运用语言的普遍心智模式的呈现,这是认知神经语言学得以进行研究的根据。同时,“价值”不再是“物”而是“量”,这也使这样来进行语言研究脱离了语言的本体研究。这是我们运用ERP手段进行语言学研究所要充分注意的。

华:您这一提醒很重要。据我所知,现在运用ERP进行实证研究已越来越多,在我做博士研究的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就有同学利用语言材料做ERP实验进行他们的研究。看来,我们做语言研究的,要在指导思想上明确运用ERP进行研究,应该立足

于语言本体的研究,而不是使自己成为操作仪器的技师。

徐:是的,我们做语言学研究主要的是研究语言本体。数学、物理学科等的手段的运用都是为语言研究服务的,而不是使我们自己成为操作这些仪器的行家。在我们现在热衷于运用 ERP 等手段进行语言研究的时候,重温德国哲学家胡塞尔为拯救欧洲人性危机而提出的“现象学还原”方法(胡塞尔,2011:16),很有现实意义。当时,胡塞尔有感于现代科学理性和实证科学在同人性有关的领域上显出的过分的主导地位,好像一切同人性有关的科学都变得很不“科学”,因而胡塞尔提出“现象学还原”方法,即在探讨与我们自己切身相关的人性与精神问题时,应当把那些实证科学的成见放进括号里,只是凭借直观来对我们所意识到的意向对象加以描述,这就是回到事情的本身,回到那种科学原理建立于其上的最直接的体验和直观,看看它们在未受到实证科学规范之前本身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结构。我们进行语言学研究,应当着力探讨语言在未受到实证科学规范之前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结构,而不讨论在实证科学规范之下语言看上去有有些什么数字上的变化而满足。须知,当小麦从田里运到商场,小麦从农民耕作对象或从农学家的研究对象变为商品,从小麦的使用价值变为小麦的交换价值,人们关心的是多少公斤什么质量的小麦可以换多少公尺什么质量的布,不再是农学家所关注小麦的育种、施肥、防病害等的研究对象。用 ERP 研究语言也可大体作如是观。

廖:感谢您对认知神经语言学所作的深刻分析。

华:最后想请您对我们青年语言学爱好者说一句话。

徐:我想用习近平总书记激励我们的话“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同各位青年朋友共勉。希望我们都能建立起自己学术研究的“自生能力”,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学术环境中获得个人学术发展的能力和在学术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能力。

华:感谢您的深刻洞见。

参考文献:

- [1]Barsalou, L. W. Grounded Cognition[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8(59): 617-645.
- [2]陈嘉映.谈谈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J]. *世界哲学*, 2011(3): 18.
- [3]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王文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4]孙正聿.存在论、本体论和世界观:思维和存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J]. *哲学研究*, 2016(6): 23.
- [5]新华社评论.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的三大方向.[2016-06-02]. <http://news.cctv.com/2016/06/02/ARTIYNK8mW4hE1hfbLzQOZY8160602.shtml>.
- [6]徐盛桓.语言运用与意识双重结构[J]. *外国语文研究*, 2015(1): 3-11.

责任编辑:郭建辉

亨利·詹姆斯与他异性小说美学： 他者化梅西(上)

多萝西·J. 黑尔 著 王长才 译

(1.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英语系, 美国 94720-1030;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 四川 成都 611756)

摘要: 本文认为, 亨利·詹姆斯对小说美学的贡献超出了通常人们认为的他在形式和写作上的发现。对詹姆斯来说, 叙述形式的问题是与将虚构人物当作自主存在者进行再现的伦理问题密不可分的。《梅西所知》这部詹姆斯小说为英美文学传统最明确地定义了此任务的界限。本文分析了詹姆斯明确的伦理目标, 即寻找正确的叙述形式, 以便最好地再现一位年轻女孩身份的内在性。詹姆斯美学方案采用的特定用语是对这些批评者做出的有力回应: 他们因作者詹姆斯叙述的这个虚构孩子的命运, 或赞美或谴责他。

关键词: 他异性; 人物自主性; 伦理; 亨利·詹姆斯; 意识形态; 自由人文主义; 托妮·莫里森; 小说美学; 视点; 种族他者性; 20 世纪英美小说; 《梅西所知》

Henry James and the Novelistic Aesthetics of Alterity: Othering Maisie (1)

Dorothy J. Hale trans. by WANG Changcai

Abstract: This essay argues that Henry James's contribution to novelistic aesthetics exceeds the formal and compositional discoveries with which he is typically credited. For James, the problem of narrative form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ethical problem of representing fictional characters as autonomous beings. *What Maisie Knew* is the James's novel that most clearly defines the stakes of this task for the Anglo-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 This essay analyzes James's explicit ethical goals in finding the right narrative form to best represent the intrinsicality of a young girl's identity. The terms of James's

基金项目: 本译文系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中西叙述学前沿问题研究”[教外司留(2015)1098]及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后经典叙述学热点问题研究”(SC15B08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多萝西·J. 黑尔, 女, 美国著名小说理论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教授, 主要从事英美小说、小说理论和叙述理论研究, 尤其对小说形式及与之相关的美学、伦理和政治价值问题感兴趣。

译者简介: 王长才, 男,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博士, 硕导, 主要从事叙述学研究。

aesthetic project elicit emphatic responses from critics who either praise or blame James as author for the narrative fate of his fictional child.

Key words: alterity; characterological autonomy; ethics; Henry James; ideology; liberal humanism; Toni Morrison; novelistic aesthetics; point of view; racial otherness; twentieth-century Anglo-American novel; *What Maisie Knew*

在《黑暗中演奏》(*Playing in the Dark*, 1992)里,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介绍她对美国“白色和文学想象”(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的研究时,颇具挑衅性地断言,她相信成为一位小说作家对她的阅读体验产生了影响:

作为读者(在成为作家之前),我一直按照别人教我的方式阅读。但对于作家的我,书呈现的样子完全不同。在那个范围之内,我必须非常信任我想象他者的能力,以及我有意识地投射到某种危险区域的意愿:这些他者可能代表我。(Morrison, 1992:3)

这段话的挑衅性在于,莫里森赞同小说家和她的虚构人物之间具有一种伦理关系——这些虚构人物并不存在,只是她想象力的产物,呼吁她公正地对待他们的人格。她的假设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被想象出的(imagined)他异性伦理是一种虚构的(imaginary)伦理吗?一种虚拟的伦理?人能为创造出的人物负责吗?对她自己创造出的人物?想象能理解和描绘真正的他者性吗?或者,对他者的想象永远只不过是自我反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黑暗中演奏》里,莫里森本人并没有提出这些哲学问题。事实上,让莫里森的说法很有意思的是,她只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小说可以而且应该与它们的作者共处于伦理活动中。本文认为莫里森就持这种观点,因为她是一种他异性小说美学的继承人,在英美文学传统中这种美学源自亨利·詹姆斯的作品。

当然,总的来说,莫里森的观点与虚构人物具有自主性的观点相呼应,这一观点就像小说本身一样古老。但随着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强化,尤其在19世纪,作家常常表达这样的信念:小说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将自己创作的人物作为真人进行体验。比如: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83:49)的著名说法,他将小说写作等同于作者成功地为读者将“他大脑的”造物带入生活,成为“能说话、可行动、活生生的人类生物”。特罗洛普甚至断言,小说的成功取决于作者这样的能力:在创作行为中与其虚构人物建立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确立“完全真实的亲密关系……他必须学会恨他们、爱他们。他必须跟他们争论、争吵、原谅他们,甚至向他们屈服……每个人物的深度和广度、狭隘和浅薄,他都应该清楚”(Trollope, 1883:49-50)。

认为小说的艺术成就与作者和虚构人物间确立的真实情感与可感知的社会关系相关的观点在 19 世纪非常普遍,甚至连萨克雷(Thackeray)这样的作家都乐于在小说实践中承担木偶主人的角色,还描述了创作过程中人物控制作者的反向权力关系。萨克雷说,写完一本书,他感觉就像一个废弃的旅馆,思念“与我一起住了 20 个月”的人们!“他们干扰我的休息:每时每刻折磨着我:我生病了,或想闲下来时,他们还挤靠在我身上……”(Thackeray, 1867:397)。在这里作者被他想象的人物呼来喝去。在萨克雷的描述中,他们与他本人无甚差异,他甚至还感到他们的社会地位高于自己:他是旅店老板,而他们是难伺候的客人。的确,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物是那么生动,那么成功,他们掌控他,按照萨克雷的比喻,他们的人性使他缩减为一个空壳:作者先是下降为旅店老板,然后又降为旅店,一个空荡荡的住所,只有人物住进来,通过他们的活力才热闹起来。

如果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的时代,我们对 19 世纪小说家们感到受其人物控制觉得很离奇,我想提出的是,这种反应未能认识到,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观念一直存在:它认为小说拥有他异性再现的独特形式资源^①。将萨克雷和特罗洛普与托尼·莫里森联系起来的传统[以及伊恩·麦克尤恩(Ian MacEwan)和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如果举其他当代例子的话]一直被低估或误认,部分原因在于在当代文化时期中他者性的观念已经变得更为抽象,正如我们对参与小说再现的权力关系的看法变得更加复杂一样^②。在这方面莫里森是个有用的例子,原因在于,她对人物他者性(characterological otherness)直接地体验,有意识地追寻的看法,因其信念而变得复杂:她相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的种族主义间接地——潜意识地——起作用,限制和决定了作者对他者的看法。下文将阐述这一点。

我想论证的是,莫里森对伴随“作为作家阅读”的、与人物他者性的伦理性介入的描述,更特别受惠于亨利·詹姆斯影响巨大的小说理论和实践。作家体验人物的自由,当这种体验成为更普遍的小说美学可能(aesthetic capacities)的理论基础时,詹姆斯的工作代表了此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个转折点。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和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可以创造一种社会世界的幻觉,其中充满各种各样鲜活的人物,他们可以达到这种模仿的效果,但很少或根本没有将再现方法系统化的念头。詹姆斯通过确认这一文类特有的形式元素和可能,努力将小说提升为一种高级艺术形式。场景和概述、视点的处理、故事“处理”(treatment)的平衡和对称——这些叙述技巧使得詹姆斯得以从理论上进行概括,认为小说由一些设计和写作规则整合,能实现美学统一。但如果詹姆斯被认为有助于将小说艺术定义为一种审美努力的观念,他也仍然持现实主义的理念,认为小说根本的目的(raison d'être)就是再现“活生生的”人物。几乎所有詹姆斯认定的小说元素,都是加强人物身份自主性的手段。通过引入人物视点,詹姆斯同时增强了小说形式的主观性,然后寻求将小说美学建基于

小说对他异性的处理能力方面^③。詹姆斯为小说形式主体化而发展的技巧,有助于将人物再现设定为与小说的艺术设想不可分割的伦理任务。

詹姆斯的小说艺术理论和实践因此引入了这些观念,不仅有描绘人物自主性的或好或坏的叙述技巧,而且,这些写作方法将作者置于一种与人物的伦理关系之中。对詹姆斯来说,小说艺术与他异性美学密不可分,这种他异性美学既建立在由小说形式确立的作者和人物间隐含的人际关系之上,也同样建立在将人物自身作为“活生生的”他者进行再现上。这样,小说家是其创造人物的仆人的观念被嵌入一种写作伦理性之中,这种伦理性将人物再现视为手段和目的,这些人物于其作者而言是他者。更重要的是,他异性美学由詹姆斯确立,并由诸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E. M. 福斯特(E. M. Forster)和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和威尔逊·哈里斯(Wilson Harris)等小说家的发展,经过20世纪,在21世纪创造了一类公众读者,他们分享了对小说的“作者的看法”:读者对小说的形式资源保持警觉,将一部小说在美学上的成功和作者采用的对他者性的再现策略关联起来。

从大的范围谈詹姆斯之于他异性小说美学形成的重要性,我在其他文章中已经说明^④。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说明莫里森在《黑暗中演奏》里论及《梅西所知》(1897),不仅有助于将莫里森和詹姆斯置于同一文学传统——将小说价值界定为对他异性的表现能力的小说美学传统——也会引向对《梅西所知》在詹姆斯小说美学理论和实践发展中重要地位的一种新的理解。

《梅西所知》最初只是偶然地引起莫里森的注意,只是因成功再现人物他者性获得她钦佩的众多作品之一。就像从莫里森的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在她看来,与小说呈现的他异性相遇引向这样的人物:他们于作者而言不仅仅是陌生人(stranger)(以前并不认识),而是奇特的(strange):非常规的,奇怪的,异常的——甚至是暴力的,犯罪的。作为读者,她评价道:“荷马呈现吃人心(heart-eating)的独眼巨人的方式使我们的心因怜悯而揪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方式促成了我们和斯维里加洛夫(Svidrigailov)和梅诗金公爵(Prince Myshkin)^⑤的亲密。这些人物的权威令我心生敬畏:福克纳的班吉(Faulkner's Benjy)、詹姆斯的梅西、福楼拜的艾玛(Flaubert's Emma)、梅尔维尔的皮普(Melville's Pip)、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⑥……”(Morrison, 1992: 3-4)对于莫里森来说,小说艺术直接与作者冒风险和他者确立“亲密关系”(她和特罗洛普用的词)的意愿相关,其特征不是简单的她能想象的人物数量和种类的问题,或者可能甚至不是这些问题,而是明确地在于伦理特征再现的“危险区域”(Morrison, 1992: 3)。对于莫里森来说,面对人物自主性,即特罗洛普和萨克雷视为小说家和人物间具体的、社会性相遇(特罗洛普的“作者必须跟他们争论、争吵、原谅他们,甚至向他们屈服”),成了有风险的心理事件,威胁到的不是身体而是灵魂。与小说人物“全面确立的亲密关系”(特罗洛普)被莫里森设想

为,不是一大队挑剔的、吵吵嚷嚷的客人兴高采烈地、临时接管了作者意识,作者在一旁伺候(萨克雷),而是自我延展到另一些主体的存在,这些主体的特征如此深刻地再现了“争吵”,以致理解这些他者要冒违背自身身份的危險。

尽管莫里森曾表示,是作为作家阅读的能力,让她也能欣赏这些小说作者让读者参与到伦理他异性设计中的方式,但她使用代词“我们”来描述读者反应的共识,这意味着,事实上,她作为作家的看法,那些适应叙述技巧的读者们也是可以接受的。当我们与这些陌生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因怜悯而揪心”,不得不“亲密”,以及保持“敬畏”。换句话说,因她自己与陌生人的相遇,因她自己的伦理风险,作家使得这些有自主性的他者能为读者所接受。到1990年代,萨克雷将小说看作接待服务,旅店老板取悦挑剔的虚构客人的看法,由于和他异性相遇的伦理风险已经变复杂了。如何接待与自己价值不一致的存在者(beings)?更不用说如何欢迎了。在莫里森看来,这项任务的伦理困境值得追问,因为个人的回报是如此丰厚。对于作者和读者都一样,小说为深刻的自我转变提供了真正的机会:“想象,”莫里森说,“不仅仅是在看或看什么,也不是原封不动将自己置入他人境遇中。就作品的意图而言,它是成为(becoming)。”(Morrison,1992:4,她的强调)

小说展现这种与他异性相遇的资源是什么呢?随着莫里森发展其“成为”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需要积极的和消极的结果。一方面,作者和读者必须接受想象力的挑战,从陌生人的视点看陌生人,从内心理解罪犯、杀人凶手或者疯子是什么样子。但另一方面,对他者性的体验要求相遇时有限度的理解,体现在陌生人会抗拒成为熟人。在莫里森的概念中,疏远的价值是多重的。通过对其特定品性的明确描述,甚至通过小说对其私密内在性的获取,我们能够理解作为人的虚构人物和我们自身不一样——但对于莫里森来说,小说的他异性也是由这些所再现的,即小说家对人物他者(Characterological other)的描述中似乎缺少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是,推动并使这种进入疏远世界的过程成为可能的东西——以及为了小说的目的,使侵袭意识角落无能为力的东西,这些意识角落排斥或远离作家想象力的触及。”(Morrison,1992:4)。

感到一个人物没被完全描画出来,感到它抵制完全再现,这为作者的想象力标明了限度,即使它增强了小说效果:人物先于或超出其创造者的控制或知识而存在。要对作者未能完全再现他者做出评判,就要既认为人物拥有人格(在莫里森这里的例子中,是拥有复杂的意识),这人格超出作者对他异性的想象,又要关注作者价值:通过作者价值,对“陌生性”的描述总是被作为一种相对关系加以衡量。这既是与这样一位他者的相遇:他明确地怪异——作为杀人犯,作为疯子——也是与一种不可知的状态相遇,这种不可知的状态内在于个人身份,一直“排斥或远离于”想象力^⑦。人与人的伦理性相遇在真实的人和虚构人物之间展开,因此由不同秩序的无意识力量建构,这种力量是不可知的、有限定的和有界限的(limiting and delimiting)。这种无意识对

莫里森来说首先是一种政治无意识,是在一个种族歧视的社会中形成的主体地位。

《黑暗中演奏》的首要目标是追踪黑人身份的文化特定观念对“[白种]主人的心理,想象和行为”的疏离力量(Morrison, 1992: 12)。莫里森将这种意识形态力量称之为“非洲民族主义者的在场”(Morrison, 1992: 6)。就像住进萨克雷客栈的人物一样,在场的非洲民族主义者是不能拒绝的客人。但与作者和人物他者相遇的感知经验不同,种族意识形态间接地表现其他者化的力量。这次,“排斥或远离于”作者想象力的意识角落是作者自己的。

对莫里森就种族意识形态运作的讨论而言,亨利·詹姆斯是个关键人物。莫里森指出,詹姆斯《梅西所知》中对美国“伯爵夫人”描写是典型的例子,以说明种族歧视的构成(racial formation)会让高超的叙述艺术(narrative mastery)失效,甚至叙述大师也不能幸免。她认为,对詹姆斯来说,选择在伦敦生活(既为梅西也为他自己)不是为了摆脱他作为美国人的意识形态构成。正是出现在詹姆斯故事世界中的伯爵夫人的古怪——体现在这两点的结合:其种族身份没必要的性质和故事世界中对该身份没有具体说明(小说从梅西的视点将她描写为“棕色的”)——对于莫里森标示着作为意识形态构成的象征功能。如莫里森指出的,遇到伯爵夫人时正值梅西要做关键决定之时。但当莫里森声称她“在《梅西所知》中有助于情节的转向,成为道德选择和意义的代理人”(Morrison, 1992: 13)时,只有这样才能是真的,即当代理人在种族政治的高度象征的层次上得以理解之时。事实上,这种种族政治放弃了小说对道德选择和伦理行为(指人际关系)的明确再现——这一点莫里森暗示了但没有展开。^⑧

莫里森对《梅西所知》的分析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如何从詹姆斯在伦理上失败的理论中提取出一种小说美学成就的标准。在她看来,小说的成功正是因为它对种族他者性的再现摆脱了作者的权威。詹姆斯在公正对待伯爵夫人的人格上失败了,在小说社会规范的叙述再现中,将她作为远离规范的代理人则成功了^⑨。莫里森对《梅西》的解读因而展示了小说如何以叙述方式,不仅仅再现了社会力量运作和自由人文主义伦理精神之间的冲突,也再现了意识形态的无形运作使自由人文主义伦理成为可能的方式。如果莫里森认为梅西决定放弃她父亲是由无意识的种族主义所驱使的看法是对的,那么自由人文主义伦理观就具有讽刺意味了,这种伦理观影响着人物对于对和错、必要性和自由的坦率讨论。作为这样一种表达:既是詹姆斯自己在社会方面对种族他者性的有限理解,又是意识形态表演的潜意识的/看不见的工作的元-再现(meta-representation),伯爵夫人在小说中的作用是将她奇怪在场的神秘抛出去以笼罩他人活动:非洲民族主义者在场的代言人得到关注,是由于其引入的小说对伦理选择和做决定的明确再现的难以辨认性。因此,非洲主义者的他者性被人了解,不仅仅因为它对伯爵夫人完全实现其身份(作为故事世界中的人)所设置的障碍,[用莫里森的话说,詹姆斯只“泛泛提及”(nodding mention)],而且还因主宰小说大师的能力,该能力通过引起“(詹姆斯的)情节建构的逻辑和设计的失败”而获得

(Morrison, 1992: 25)。这本小说成功了,是因为它的作者失败了——对作者控制的限制标志着获得的他异性在小说中的在场,这种他异性被理解为既是作者和人物之间差异的标记,也是限制作者感知的不可见的情况。

但是梅西自己呢?为什么莫里森将她纳入其塑造成功的陌生人名单之中?梅西凭什么与斯维里加洛夫、梅诗金公爵、福克纳的班吉、福楼拜的艾玛、梅尔维尔的皮普、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为伍?如果伯爵夫人代表了他异性的叙述表现是一种局限,一种再现的失败,那么相比之下梅西代表了对他异性成功的和“权威的”描述吗?如果是,梅西代表什么样的他异性?她的他异性是否像梅诗金公爵的一样,在于道德上的纯洁,这种纯洁性如此极端,以致从她周围堕落的成年人那里得到“小白痴”的称呼(《梅西所知》, 2008: 23)?或者梅西真的是个道德“怪物”(小说中的成年人也这样叫她)(《梅西所知》, 2008: 95),与独眼巨人和斯维里加洛夫一样?这是莫里森的观点吗?詹姆斯给了我们一个陌生人,她虽然只是个六岁女孩,却亲近“轻浮”(wantonness)(《梅西所知》, 2008: 210),接纳“堕落”(depravity)(《梅西所知》, 2008: 200)?她的他者性在于“侵入她幼小的阴沉地凝视着的灵魂,就像陷入一个无边的容器”的“邪恶力量”(《梅西所知》, 2008: 22)?梅西是打开我们心脏的吃人心者吗?

从《黑暗中演奏》里不能确定莫里森自己对梅西持哪种观点,但她对《梅西所知》作为一种他异性的实现的分析,确立了再现者和再现者之间的权力经济,这是詹姆斯自己对他和梅西·法兰戈关系感知的中心。正如詹姆斯所描述的,这本小说是以一种他异性的活动为基础的:他给自己设定任务,由梅西的视点讲述整个故事,“确立如此受限的意识,并让她保持,成为我设想的特别之处”(《梅西所知》前言, 2008: 6)。当我们转向詹姆斯时,重要的是要注意,他发明了一种他异性的小说美学,但这并不是建立在一种系统的伦理哲学之上,这种伦理哲学先验地建立一种特定的情感联系或人际关系模式,作为实现他异性的必要条件。这样,他处理小说他者性的方法不同于近年来的批评家们,他们的观点建立在一个抽象的、哲学的基础之上,认为某些情感——比如同情——固有地否认或接纳人的他异性,人的情感是被指引的。^⑩就像他全部作品所证明的,詹姆斯式的叙述调动了指向其人物的叙述立场的动态复杂性。这些包括利他主义、爱和认同的情感,也包括讽刺、异化、调解、工具化、堕落、污染、诱惑、牺牲、甚至叙述谋杀等否定性关系。更重要的是,在詹姆斯小说中,人物的再现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它建立了再现者和被再现者之间的关系,这充满小说本身的长度和广度,创造了它自己的叙述维度。^⑪詹姆斯的他异性美学要求我们注意叙述立场中的转调和偏移——为什么这个人物现在持这种观点?并将这些他异性的描绘回馈给作者,而作者要对这些负责:人物在公正对待他者上是成功还是失败了,在其想象中什么样的他者性应该得到表现,以及如何最有效地表现。

正如莫里森和詹姆斯大部分其他读者所观察到的,在詹姆斯的故事世界里,关于正确对待他者方式的深入讨论——特别是一个人可以、可能、应该为他者做什么——

提供了一种伦理话语,这种伦理话语为评判人物的动机和行为确立了一种标准^⑫。但也许是因为如此多詹姆斯的读者也使用这种伦理话语,将它作为一种规范来评判将人物作为伦理存在者进行再现的叙述技巧,更少的批评家会考察小说作为一种文类意味着什么。詹姆斯通过写作的形式特性,将小说提升为一种高级的艺术形式,这一设想也伴随着对叙述再现的一种信念:或多或少地在伦理上,或多或少地成功地公正地对待人物的人格^⑬。通常,争论是在局部的伦理层面上展开的:詹姆斯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细节塑造人物的爱的知识的使徒吗^⑭?或者詹姆斯是一个从事散文写作的阿尔弗雷德·希克柯克(Alfred Hitchcock):为了美学效果将他的虚构人物当作活的道具或“愚蠢的孩子”^⑮。

《梅西所知》从第一版时就引起读者对詹姆斯强烈的谴责^⑯。最近一些批评家认为,詹姆斯对他笔下的年轻女孩们在叙述上的压榨近似于亨伯特·亨伯特对年轻的洛丽塔的猥亵^⑰。我会回到对詹姆斯的这个指控,因为我认为指责詹姆斯违背伦理——甚至到施虐和毁灭的程度——的读者和批评家并不天真,而事实上是敏感地回应詹姆斯融入他的形式效果中去的他异性伦理。正如我将讨论的,对作者来说,似乎让他的人物堕落在呈现人物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一种有力的方式,这些人物似乎是作者的受害者。正如《梅西所知》所展示的,詹姆斯可以鼓励他对梅西再现的这种解释,因为故事世界中的人物表达了一种伦理标准,这种伦理标准更青睐个人自由和自主权,即使他们为了自身的自私目的将梅西当作工具^⑱。

但是在我们转而审视詹姆斯描述梅西的叙述策略之前,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世界的伦理话语与各种竞争性的伦理性模式相抗衡。如果所有这些都没有明确地被运用于詹姆斯自己对叙述形式的处理之中,它们确实有助于将不同的哲学框架理论化,这些框架由他的评论家们提出,在这部小说仍在引发的持续争议中,对这部小说——和詹姆斯——施加影响。一方面,梅西有权拥有自己的生活这一观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主张,和伴随任何人生活的独特性价值相关的主张,一种与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哲学有关的看法。但是,这部小说明显地维护了伦理关系的自由人文主义观点,认为伦理关系是由其选择的权利所限定的群体所规定,也是为了这群体而规定,一种个人抉择的期望,它将伦理定义为行动^⑲。通过再现对待善恶固有倾向的可能性,小说提供了第三种选择。如果梅西作为伦理上的陌生人(极端好或极端坏)降生在故事世界里,她是否可以因其行为受到谴责或得到赞誉?她的自由应该被限制还是被扩展到最大?她的品性是否胜过她的独特性?小说再现的第四种模式是一种伦理发展。按照这个观点,当她不再是孩子时,梅西进入了伦理性。在这种发展模式,社会影响的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孩子的伦理任务是在善和恶的伦理影响中驶向正确的航线,从经验中学习?或者孩子发展的重担是成年人的伦理责任,他们应该提供适当的道德教诲和情感关切,以培养她在伦理方面的成长?

小说的大多数读者对这些选项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作出回应,使其成为他们解释

梅西性格的关键。但我想说,这本小说传播这些竞争性的伦理模式,是因为詹姆斯自己不确定哪种最适用于他自己对梅西的处理。他应该把他的人物视为单独的存在,由超出他对她认识的部分才能最好地再现其性格?还是将她作为发展中的自由主义的主体加以描绘,她走向成熟的具体步骤是他想象和描述的任务?或者如他所愿,认为梅西和所有虚构人物一样,依赖于作者的再现能力,这种能力把她带入小说中的生活?但作为另一种选择,和莫里森一样,他可能认为她是个道德上的陌生人,她不寻常的堕落或良善对生活的日常看法提出了挑战,这种看法普遍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小说的恰当主题。在我转向对他异性美学的分析之前,因为它体现为詹姆斯叙述技巧的组成部分,我想简要地考察詹姆斯如何调动《梅西所知》的故事世界话语和形式结构中这些相抵触的伦理模式。(未完待续)

(注:我要感谢范岭梅博士及王楠博士给我提供条件,让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介绍与此研究项目有关的观点。我也非常感谢王长才博士对这篇文章的翻译。)

注释:

- ①参见罗伯-格里耶(Robbe-Grillet), (1989:27-29)。
- ②参见我的“《关于美》是美丽的?”(*On Beauty as Beautiful?*)中对史密斯与他异性美学关系的讨论。
- ③布鲁克斯认为詹姆斯的“激进的视角主义”(radical perspectivalism)是其“小说理论”的基础,但没有将此引向他异性美学,而是引向一种“认识论的热情”(Brooks, 2007:52)。
- ④参见我的“美学和新伦理”(*Aesthetics and the New Ethics*)和《英语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English Fiction*)。
- ⑤分别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和《白痴》中的人物。——译者注。
- ⑥分别为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亨利·詹姆斯《梅西所知》、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梅尔维尔《白鲸》、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中的人物。——译者注。
- ⑦一系列理论家提出将人物他异性界定为给读者理解设定的界限。参看阿特里奇(Attridge)、巴赫金(Bakhtin)、巴特勒(Butler)、伊戈斯顿(Eagleton)、吉布森(Gibson)和斯皮瓦克(Spivak)。
- ⑧塔克(Tucker)也提醒我们注意,在这种场景中两种不同模式的伦理代言人。要注意,塔克认为詹姆斯在伦理上为这种伦理模式的冲突负责,他得出结论认为:“小说作者詹姆斯最终看起来很像操纵者比尔(Beale the manipulator)。”(Tucker, 1988:348)
- ⑨迈克尔斯(Michaels)同意莫里森的观点,认为詹姆斯的种族主义是无意识的,但是他对伯爵夫人作为非裔美国人身份的代表有不同的解释(Michaels, 1972:291)。参见约翰逊对批评性论争所作的概述,这一论争是为回应莫里森对伯爵夫人的解释而特别引发的。
- ⑩参见基恩(Keen)对小说同情的文学历史传统,及其与同类认同情感——如利他主义和同情等——的关系的综合描述。
- ⑪参见沃洛克(Woloch)的小说人物理论,他类似地考虑到跨越叙述空间和时间时人物性格的再现是可变化的和动态的。

- ⑫有关詹姆斯伦理视野的强烈意见可以比较贝尔(Bell)、伯萨尼(Bersani)、布斯(Booth)、蔡斯(Chase)、克罗斯(Cross)、弗里德曼(Freedman)、克洛克(Krook)、利维斯(Leavis)、默多克(Murdoch)、努斯鲍姆(Nussbaum)、米勒(Miller)、米切尔(Mitchell)、拉尔森(Larson)、皮平(Pippin)、波里尔(Poirier)、西尔斯(Sears)、特里林(Trilling)、凡·根特(Van Ghent)、沃德(Ward)、伍德(Wood)和伊兹尔(Yeazell)。
- ⑬例如,可比较波里尔对詹姆斯人物再现方法的伦理性论述(Poirier, 1960:9, 250),与坦纳(Tanner, 1985:104)和巴特勒的观点相对立。
- ⑭特别参见努斯鲍姆、默多克和特里林对詹姆斯献身于爱的伦理观的阐释。参见汉森(Hanson)、希尔弗曼(Silverman)、斯蒂文斯(Stevens)、茨温格(Zwinger, 1995:673-675)关于詹姆斯笔下的儿童被加以情色性设定的争论。
- ⑮希区柯克将演员当作牛的说法,见麦吉利根(McGilligan, 2003:210-211, 277)。他将演员当作道具的言论,见特吕弗(Truffaut, 1984:111)。对于详细比较詹姆斯和希区柯克的学术研究,见格里芬(Griffen)和纳德尔(Nadel)所编论文集。
- ⑯我将在后面更详细地讨论发表在《文学世界》(1897)上的未署名的评论。
- ⑰沃尔特斯(Walters)认为詹姆斯对待梅西有着“一种情场老手玷污她童贞的乐趣……一种冷漠的、偷窥的、近乎色情的快乐”(Walters, 1972:197)。参见哈贝格(Habegger, 1989:156)对詹姆斯和亨伯特·亨伯特的比较。参见赫斯特(Hurst)对洛丽塔和亨伯特·亨伯特与梅西和克劳德爵士的比较(特别是36页)。参见史蒂文斯对詹姆斯更正面的看法:“嬉戏的爱说情色双关语的人,爱戏弄人者,以编织在直白和隐讳之间闪烁不定的多元的色情之网为乐。”(Stevens, 1998:132)。汉森(Hanson)类似地把詹姆斯描述为“很淘气,加入我们孩子们的具有情色意味的嬉戏中”(Hanson, 2003:372)。
- ⑱参见皮克(Pick)将詹姆斯式的工具性置于列维纳斯伦理框架内的更一般性的讨论。参见坦纳(Tanner)从自由人文主义伦理立场对“对他人的生命无情操纵和自私占有”的道德“恶魔”詹姆斯进行的系统阐述(Tanner, 1985:110)。
- ⑲参见希梅尔法布(Himmelfarb)对这种自由主义人文伦理模式的维多利亚时代背景的讨论,特别是231页。参见塔克对《梅西》中自由主义契约观念的运作进行的深入分析。

参考文献:

- [1] Brooks, Peter. *Henry James Goes to Pari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7.
- [2] Habegger, Alfred. *Henry James and the Woman Business* [M].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89.
- [3] Hale, Dorothy J. Aesthetics and the New Ethics: Theorizing the Nove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 *PMLA*, 2009, 124: 896-905.
- [4] Hale, Dorothy J. The Art of English Fic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G] //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Twentieth-Century English Novel*. Robert L. Caserio (ed.).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9: 10-22.
- [5] Hale, Dorothy J. On Beauty as Beautiful? The Problem of Novelistic Aesthetics by Way of Zadie Smith [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12, 53: 814-844.
- [6] Hanson, Ellis. Screwing with Children in Henry James [J]. *GLQ*, 2003, 9: 367-391.

- [7]Himmelfarb, Gertrude. Manners into Morals: What the Victorians Knew[J]. *The American Scholar*, 1988, 57: 223 – 232.
- [8]James, Henry. *What Maisie Knew*[M]. New York: Oxford UP, 2008.
- [9]McGilligan, Patrick. *Alfred Hitchcock: A Life in Darkness and Light*[M]. New York: Regan Books, 2003.
- [10]Michaels, Walter. Jim Crow Henry James? [J]. *The Henry James Review*, 1995, 16: 286 – 291.
- [11]Morrison, Toni.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 [12]Poirier, Richard. *The Comic Sense of Henry James: A Study of the Early Novels*[M]. New York: Oxford UP, 1960.
- [13]Robbe-Grillet, Alain. *For a New Novel: Essays on Fiction*[M]. Richard Howard (tran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1989.
- [14]Stevens, Hugh. Queer Henry in the Cage[G] //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James*. Jonathan Freedman (ed.).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8.
- [15]Tanner, Tony. *Henry James: The Writer and His Work*[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5.
- [16]Tucker, Irene. What Maisie Promised: Realism, Liberalism and the Ends of Contract[J].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1998, 11: 335 – 364.
- [17]Thackeray, William Makepeace. *Early and Late Papers*[M]. Boston: Ticknor and Fields, 1867.
- [18]Trollope, Anthony. *An Autobiography* (vol. 2) [M]. Edinburgh: Blackwood and Sons, 1883.
- [19]Truffaut, Francois & Helen G. Scott. *Hitchcock: A Definitive Study of Alfred Hitchcock*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4.
- [20]Walters, Margaret. Keeping the Place Tidy for the Young Female Mind: The Awkward Age[G] // *The Air of Reality: New Essays on Henry James*. John Goode(ed.). London: Methuen, 1972.
- [21]Zwinger, Lynda. Bodies that don't matter: The Queering of Henry James[J]. *Modern Fiction Studies*, 1995,41:558 – 680.

责任编辑:郭建辉

西方莎学界《约翰王》研究 300 年

李 敏¹ 张旭春²

(1. 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 2.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 要:《约翰王》作为莎士比亚 9 部历史剧之一,可以说是最不受重视的一部。大致从 18 世纪起,西方学者才开始对其关注。随着西方学者对该剧研究的逐渐深入,它的文学价值和经典性终于得到了确立。本文旨在批评性地梳理 18 世纪到 21 世纪初西方莎学界 300 年《约翰王》研究史:一方面立足于展现西方《约翰王》学者的洞见,另一方面也试图揭示他们的盲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尝试性地提出未来《约翰王》研究的新方向。

关键词:《约翰王》; 批评综述; 洞见与盲点

A Critical Survey of *King John* Studies

LI Min ZHANG Xuchun

Abstract: As one of the nine historical plays written by Shakespeare, *King John* had not been heeded for a long time until eighteenth century when commentators commenced to pay attention to it. Afterwards, its literary and canonical value was established due to western scholars' gradually in-depth study. This paper purports to make a thorough critical review of *King John* studies by Shakespeare scholars in the west from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first decade of 21st century, presenting their insight as well as their blindness, and thereby attempting to point out new directions for further study of this play.

Key words: *King John*; critical review; insight and blindness

0. 引言

在《约翰王》这部剧中,莎士比亚选取了金雀花王朝中“无地之王”约翰的统治时期作为此剧的创作背景,该剧剧情大致如下:艾莉诺太后声称理查一世留下遗嘱命约

作者简介:李 敏,女,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莎士比亚文学研究。

张旭春,男,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英国浪漫主义和 20 世纪西方文论研究。

翰为继承者,但这与传统的长子继承制产生了矛盾,从而引发了约翰与亚瑟王子(康斯坦丝与约翰的兄长所生)的王位之争;以该事件为中心,《约翰王》还旁及到 12、13 世纪之交英国的宫廷政治和宗教冲突等多重主题。

16、17 世纪,英国学者对这部作品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已知的最早提及该剧的文献来自弗朗西斯·米尔士(Francis Meres)的《智慧的宝藏》(*Palladis Tamia, Wits Treasury*, 1598)。在该书中米尔士分别列举了莎士比亚的六部喜剧和包括《约翰王》在内的六部悲剧(Lee, 1989: 204)。由于早期历史记录较少,引起了许多评论家对该剧的创作年代进行考证:有学者认为《约翰王》创作于 1588 - 1598 这十年间,但大多数都将时间锁定于 1596 年前后。^①大约到了 18 世纪英国莎学界才开始关注并对《约翰王》进行评论(基本晚于莎士比亚的其他戏剧)。然而,这一时期的所谓“《约翰王》研究”仅是一些只言片语,尚未形成完整的批评体系。这种状况即使在 19 世纪也未得到本质性的改变。^②到了 20 世纪,《约翰王》才突然引起了莎学界的广泛重视。根据《莎士比亚评论集》(*Shakespearean Criticism*)1 - 142 卷统计,有近 80 篇关于《约翰王》的评论都产生于 20 世纪。不仅数量大增,这一阶段《约翰王》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更深入的掘进——从最初仅仅局限于对角色的讨论发展到后来诸多新理论的运用分析。正如巴海克·芬纳蒂(Paraic Finnerty) (2011: 38) 所言:“《约翰王》在莎翁经典作品中的价值已被重新定位。”通过对历史进行戏剧化重构,莎翁将约翰王时期的历史呈现为一系列无命定引导或无秩序的任意事件——反映出莎士比亚先知先觉的早期现代性意识。^③

本文将以断代为线索,从 18 世纪、19 世纪和 20 世纪(包括 21 世纪前 10 年)三个阶段入手,对《约翰王》的研究史进行尽可能详尽的批评性梳理,以期引起中国莎学界对该剧的关注。^④

1. 18 世纪

《莎士比亚评论》中收录的最早有关《约翰王》的评论出自 18 世纪的雇佣文人查尔斯·吉尔顿(Charles Gildon)之手。18 世纪英国文坛深受法国新古典主义批评影响,这就导致了部分评论家对莎士比亚的否定性评价(如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莎士比亚序言》(*The Preface to Shakespeare*)这篇著名的论文中虽然用“人生的镜子”来赞扬莎士比亚对普遍人性的探索,但他还是从新古典主义规范出发对莎翁进行了诸多苛评)。^⑤吉尔顿(Lee, 1989: 208 - 209)虽然称赞了康斯坦丝和福康布里奇这两个角色,但同时他也指出整部剧也就只有这两个角色值得一提。从新古典主义批评教条出发,吉尔顿批评剧中情节、动作缺乏组织性和目的性,这不符合新古典主义的戏剧结构组织原则——尤其体现在约翰王之死与剧中女性的哀痛、私生子的英雄行为之间相互孤立、毫无关联。弗朗西斯·简特elman(Francis Gentleman)也在 1770 年对该作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Lee, 1989: 212 - 215)。他认为,《约翰王》语言表达不得体,而且时间和地点多变。在他看来,《约翰王》最大的问题是情节不统一(比如,第

一幕与全剧关联太少,大可直接删去);莎士比亚只是将一连串看似偶发的历史事件拼凑在一起——此种情节组织就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批评的不能反映可然律和必然律的“缀段式情节”(episodic plot)。

在这类评论中,“三一律”和“得体”等新古典主义戏剧标准显而易见。然而,吉尔顿和简特尔曼等人对新古典主义批评准则的僵化挪用也产生了一定的局限。比如,第一幕的结构功能实际上是揭示王位合法性这一主线索,它预示了后面的王位争夺;而福康布里奇的出场也是为他随后一步步转变做铺垫。如若删去,不仅有损全剧结构完整,更会影响到私生子的人物塑造。

当然,18世纪英国新古典主义批评在总体上并没有走向法国新古典主义批评那种绝对的僵化和保守——这从范存忠教授对《赵氏孤儿》在18世纪法国和英国的不同批评反映就可以明显看出。^⑥新古典主义批评思潮并未被全盘接受,仍有学者对莎士比亚打破常规的做法表示称赞,不至于使这部剧的光辉淹没于历史之中。路易斯·西尔伯德(Lewis Theobald)身为剧作家、编辑,虽然为了迎合新古典主义将原剧进行了相应的改编,但他对莎士比亚所塑造的约翰王却大加称赞——认为约翰是“善良与邪恶的结合体”(Lee, 1989: 209)。这符合亚里士多德悲剧英雄的标准:“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种人名声显赫,生活幸福”(亚里斯多德、贺拉斯, 1962: 38),如此才更容易引起观众的恐惧和怜悯。埃德蒙·马隆(Edmund Malone)则对《约翰王》的创作日期进行了富有意义的考辨:剧中康斯坦丝的悲痛之情之所以表达得如此痛彻心扉,是因为莎士比亚借康斯坦丝表达了他自己的儿子哈姆内特之死的悲痛(Lee, 1989: 218)。哈姆内特在1596年8月去世,因而马隆认为这部剧的完成时间大概就在这个时段或稍晚于此。这一观点有相当大的说服力,也为后来更多学者参与考证该剧的创作时间开辟了道路。

简言之,18世纪的莎学研究虽然也有对《约翰王》的肯定性评价(尤其是对剧中人物康斯坦丝、私生子和约翰王的角色价值进行了初步的挖掘,为后来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研究方向),但由于受到新古典主义批评规范的影响,该时期大多数批评家都对《约翰王》的情节结构和得体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这些批评大多从僵化教条出发,从而忽略了《约翰王》真正的艺术价值。

2. 19世纪

进入19世纪后,随着新古典主义的逐渐衰退和浪漫主义的兴起,欧洲的莎学研究刮起了一股“浪漫风”。除了继续深入拓展《约翰王》的角色研究之外,学者们还开启了主题研究路线。德国浪漫主义评论家奥古斯特·威尔海姆·史雷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的评论不容忽视——他把《约翰王》与莎士比亚其他八部历史剧视为一个统一整体,并认为《约翰王》在之后的四部曲中起的是序的作用,因为该剧所涉及的多重主题如篡位、暴政、宗教等在接下来的几部作品中都一一体现(Lee, 1989:

218-219)。史雷格尔的研究创造性地从作品与作品之间的联系出发,尤其着眼于不同作品之间的关联。这一思路启发了很多学者,引起后期评论家们对该剧主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英国著名浪漫主义批评家威廉姆·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对《约翰王》的评论也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他指出:“《约翰王》用优美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力减轻了主题上的悲痛”(Lee, 1989: 219)。尤其在第四幕休伯特要烫瞎亚瑟双眼的场景中,亚瑟的哀求与休伯特的仁慈既震撼人心又使读者们获得了些许抚慰。对这部剧的人物角色他也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分析:约翰王“懦弱多于残忍”,“卑鄙甚于可恶”;康斯坦丝散发着“母性温柔”;福康布里奇兼具勇敢和喜剧特色。赫兹利特打破了 18 世纪那种单一化模式,为后世批评家对该剧角色研究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

此外,19 世纪中期的德国还出现了一种黑格尔式的“哲学批评”。^⑦其主要倡导者赫尔曼·尤尔里奇(Hermann Ulrici)将文学批评与哲学思想相结合,吸纳了史雷格尔和黑格尔的文学思想——将戏剧看做一个有机整体以及戏剧展现不同历史力量的冲突等观点。他一方面探讨了《约翰王》中王权与宗教的斗争,揭示出福康布里奇身上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当时政教机构的腐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与反差;另一方面,他运用哲学思维为莎士比亚对历史材料的编排进行辩护,坚持主张诗学的真实优于历史的真实。受到尤尔里奇的影响,同样运用“哲学批评”法的学者还有 G. G. 格维纳斯(G. G. Gervinus)和美国学者唐顿·J. 斯奈德(Denton J. Snider)。格维纳斯将这部剧看做是一种道德谱系的展现,将剧中人物分成两组类别。一组是追随“利益”的约翰、埃莉诺和康斯坦丝,另一组是处于道德和爱国主义之间的亚瑟、休伯特和福康布里奇。值得注意的是,他观察到福康布里奇这一角色的发展恰好映照了约翰王的逐渐衰落,在结构问题的分析上独具一格。斯奈德则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展现了各种不同的伦理道德,它们之间的差别便构成了“戏剧冲突”,但最终都得到了解决、归于和谐。他将该剧的结构归为两大事件:一是外部斗争,集中于约翰王与法国、和罗马宗教之间;二是内部斗争,反映在约翰王的利益追求和英格兰贵族们的反叛。结尾恰好出现的亨利王子则使王位争夺的冲突得以解决,全剧又归于和谐统一。

总之,19 世纪的浪漫主义批评着重分析《约翰王》的艺术想象和角色情感,而随之兴起的哲学批评在注重整体有机统一的基础上还着眼于不同力量间的冲突。他们注意到《约翰王》情节结构以及人物设计在细节方面的精妙之处,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味地贬低。尽管不乏洞见,19 世纪的《约翰王》研究中的盲点也是明显的:对伊丽莎白一世社会的复杂性——如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没落与资本主义兴起这一矛盾冲突认识不够;对该剧的主题研究还主要局限于伦理道德的浮泛层面上,深度尚待进一步拓展。

3. 20 世纪前 50 年

进入 20 世纪,随着各种批评流派的兴起,《约翰王》评论也进入了一个多元批评的时代。E. K. 钱伯斯(E. K. Chambers)堪称 20 世纪《约翰王》研究第一人。他认为

该剧尤其缺乏结构的完整性,语言技巧较差:“无疑,在莎士比亚成熟的戏剧作品中,没有一部整体戏剧效果是如此令人失望的”(Lee, 1989: 244)。显然,钱伯斯对《约翰王》的否定(尤其是对其“结构紊乱”的批评)基本上承续了18世纪早期评论家的观点——这种不公平的否定遭到了朋荣等批评家的反驳(见下文)。1930年的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沿袭了19世纪的主题批评路线,主张《约翰王》的焦点是“背叛”(Lee, 1989: 245)——约翰王背叛了王权和亚瑟王子;艾莉诺背叛了另一个儿子杰弗里;休伯特背叛了自己的国王;贵族们集体背叛了约翰王转而又背叛腓力王;甚至英法联盟的破裂也是典型的背叛。他对主题的挖掘为后续学者对该剧主题意义的深入探索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借鉴价值。

英美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方法则被用于分析《约翰王》的语言形式和修辞手法^⑧。卡洛琳·斯伯琴(Caroline Spurgeon)开创了莎士比亚研究中的“意象类型分析法”。在分析《约翰王》时,她统计出该剧中的71种意象,对剧中的拟人手法和身体意象的分析也尤为精彩。美国诗人、编辑和小说家马克·凡·多伦(Mark Van Doren)分析了这部剧的语言和修辞手法,并指出通过这些过度的修辞手法和戏剧安排,“过度”(excess)作为这部剧的主题得以充分体现。莎士比亚在这部剧中运用了夸张至极的手法,这尤其体现在康斯坦斯这个角色上,她不只是沉湎于悲伤,还沉湎于悲伤的语言之中。新批评的《约翰王》研究以其深厚的文本细读工夫深入探讨了该剧精湛的语言艺术,从而彻底否定了钱伯斯的观点。然而,新批评对语言形式和修辞技巧分析的偏爱却使他们往往忽略甚至否定文本背后复杂的社会力量以及文本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这一点在该流派对《约翰王》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

20世纪上半叶最有创建的莎士比亚学者当属历史主义批评派的E. M. W. 蒂利亚德(E. M. W. Tillyard)——他的《莎士比亚历史剧》(*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1944)一书对20世纪新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对《约翰王》的评价中(Lee, 1989: 254-260),蒂利亚德认为王位继承问题、反叛主题和王者风范的展现是这部剧的结构动力。比起易变的约翰王,福康布里奇因具有力量、勇气和忠诚而更符合君主形象。此外,尽管蒂利亚德承认结构和道德动机方面缺乏统一性,但他指出莎士比亚通过“想象的力量”使得这部剧仍具有某种统一性的特点。这种力量其实指的是莎士比亚在剧中的修辞手法,他发现“河流决堤”的比喻方式在剧中重复多次,从而构成了一种统一。蒂利亚德的莎学研究的突出特点就是强调秩序、和谐,但这实质上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充满矛盾冲突的真实社会图景不相吻合。新历史主义批评认为,正是因为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各种混乱的社会能量的尖锐冲突,才导致了莎士比亚对秩序的向往——反之亦然,莎士比亚剧作中的“秩序话语”从另一方面反证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社会能量的混乱和冲突。《约翰王》这部剧无疑是这个悖论的典型体现。

纵观20世纪前50年,较之莎翁其他作品,西方莎学界对《约翰王》的关注度仍然不够,但是由于新批评派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从戏剧形式、语言艺术和修辞技巧入手对《约翰王》进行分析研究;蒂利亚德的观点也为后来新历史主义批评模

式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一切都为 20 世纪后期该剧研究的繁荣做了铺垫。

4. 20 世纪后 50 年

阿德里安·朋荣(Adrian Bonjour)是后半叶第一个从结构主义理论出发重新解读《约翰王》结构特点的学者。与之前批评家的否定性评价不同,朋荣认为《约翰王》的中心结构就是“一个英雄的衰败 vs. 另一英雄的崛起”(分别指约翰王和福康布里奇)这一二元对立,因此全剧结构非常平衡(Lee, 1998:260-269)。威廉·H. 马彻特(William H. Matchett)则主张这部剧在结构上是围绕着王权继承的问题展开的(Lee, 1998:277-286)。在审视了私生子、亚瑟、亨利三个人物之后,他认为这三人都比约翰更有资格来继承正统。上述三位批评家从结构主义理论出发对《约翰王》的结构及其主题的研究,完全颠覆了 18 世纪以来前期评论家所持的结构松散混乱的观点,进一步引起了西方莎学界对《约翰王》的重视。

另有相当多的批评家仔细考证了《约翰王》的材料来源。朋荣将这部剧与一早期佚名剧本《约翰王麻烦的统治》(*The Troublesome Reign of King John*, 1591)进行对比,着重分析了莎士比亚对原材料的挪用和改造。比如约翰王的塑造在两部不同的文本中,一个是英雄,另一个却是篡位者。1962 年杰弗里·布娄(Geoffrey Bullogh)再次考证了《约翰王》的材料来源与《约翰王麻烦的统治》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证实了前者来源于后者的事实(Lee, 1998:234-243)。“阿登版”系列编辑 E. A. J. 霍尼格曼(E. A. J. Honigmann)也坚持认为《约翰王》的创作要早于佚名版本(Lee, 2009: 114-120)。他将这两个版本以及莎士比亚的其他历史剧中的人物和文本结构进行对比,发现《约翰王》与《亨利六世(下)》、《理查三世》有许多共同点。他甚至大胆猜测佚名版很可能是一名演员根据演出回忆而记录写下的。这一观点遭到很多学者反对,如在 2004 年,彼崔斯·格鲁夫(Beatrice Groves)经过一系列细致的对照分析,尤其是从语言特点方面,进一步证实了莎士比亚的版本更为晚些的结论(Lee, 2007:70-77)。

20 世纪后 50 年中,受到新兴的女性主义批评思潮的影响,许多评论家开始关注《约翰王》中的女性角色。卡罗尔·列文(Carole Levin)对比了埃莉诺、康斯坦丝、布兰琪,认为女性角色比男性更加诚实可靠。在那个父权社会中,艾莉诺“是最为谨慎的一位女性”(Lee, 2003: 45),其他两人毫无权势和地位可言。菲利斯·拉肯(Phyllis Rackin)通过分析女性人物得出结论:“只要女性存在并言说,她们就对其他角色构成了颠覆性的威胁。”(Lee, 1998:217)这一批批评家不像早期《约翰王》学者仅仅关注康斯坦丝和福康布里奇,而是对剧中所有女性角色都进行了全面分析,这为该剧的评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女性主义的《约翰王》研究也启发了更多学者去关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状况等复杂问题。

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也开始被运用到《约翰王》的研究之中。罗伯特·莱恩(Robert Lane)认为这部剧的问题指向了伊丽莎白的继承者,展现了三种继承方式:通过上一任国王的遗嘱;通过法律认定;通过道德检验(Lee, 2000: 314-325)。雅克

琳·特雷斯(Jacqueline Trace)试图确定私生子福康布里奇在历史上的真实身份。在排除了一些候选人之后,该学者主张福康布里奇的原型人物极有可能是16世纪早期的约翰·德·佛顿(John de Verten)——一名士兵兼亨利八世的密友(Lee, 2012: 180-185)。这些新历史主义的《约翰王》研究成果在方法上注重文本内外、文本与作者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了解16世纪英国王权政治以及莎翁独特的戏剧艺术。

进入21世纪以来,对《约翰王》的研究还在不断丰富,评论家们的见地也更加深刻。^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提姆·斯皮克曼(Tim Spiekerman)指出《约翰王》是被政治权利的暴力斗争驱动的,这部剧就是一场关于英国王位继承的政治危机(Lee, 2007: 3-13)。伊夫·托雷(Yves Thoret)对康斯坦丝从悲痛到沮丧再到绝望最后到疯狂的心理变化过程的分析十分细致(Lee, 2010: 100-104)。约瑟夫·坎帕纳(Joseph Campana)则探讨了《约翰王》和《理查三世》中的儿童形象与情感。

5.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一部不为读者熟知的莎剧之一,《约翰王》经历了从17世纪几乎无人问津,到18、19世纪的零星评论,再到20世纪以来引起学者们的激烈讨论,这一过程虽然漫长却更好地展现了经典作品的历久不衰的价值。从第一个对开本问世到如今已历经近四百年,对它的评价也从最初简单的角色研究逐渐发展到结构、主题、政治等多元化视角,这部剧还在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学者们的兴趣。笔者认为,《约翰王》的文学价值还有必要做更多探讨,例如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将新历史主义理论运用到该剧的研究之中,即从文本和现实出发,研究莎士比亚是如何把社会权力机制的运作挪用《约翰王》当中去的,尤其是私生子福康布里奇的存在是如何被一步步纳入并服从于统一的王权的;此外,仅仅增加对女性角色的关注是不够的,我们还应更多地探讨身处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之下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与女性王权的复杂勾联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对于文本话语下隐含的各种社会能量,莎士比亚又是如何通过《约翰王》的创作展示了这些社会能量的交流与协商。限于篇幅,本文在此难以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展开。总之,笔者希望本文对《约翰王》在西方300年研究史的梳理为中国莎学界提供一个观察了解莎士比亚的新视野,并促进我国莎学界认真思考《约翰王》在莎翁经典中的地位。

注释:

①见Cohen(1997:486-491)在《诺顿莎士比亚:历史剧》(*The Norton Shakespeare: Histories*, 1997)中对该剧的简介。他在开篇首句直接注明该剧的年代为1596年,并于“文本注释”中指出该剧的风格和韵律是《约翰王》约写于1596年的有力证明。

②《莎士比亚评论集》(*Shakespearean Criticism*)1-142卷中涉及到18世纪与19世纪的《约翰王》研究分别都只有九篇文献被收录。

③详见Finnerty(2001)。

- ④国莎学界对《约翰王》长期关注不够,而中国的《约翰王》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与《约翰王》研究相关的仅有两三篇。
- ⑤详见 Johnson(2006:361-368)。
- ⑥根据范存忠教授的考证,《赵氏孤儿》在法国受到了以阿尔更斯侯爵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批评家的严厉的批评,但是在以赫德为代表的英国批评家却对《赵氏孤儿》的戏剧艺术大加赞赏。这是为什么呢?范存忠教授指出,“从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后期,英国戏剧家和戏剧评论家,在法国影响之下,也讲究新古典主义的规律与惯例,不但根据这些规律与范例来进行创作,也根据这些规律与范例来改编(当时也称‘改善’莎士比亚的伟大的戏剧。可是,创作家和批评家不断地发出反抗的呼声。”比如对三一律,从德莱顿到法考尔等人都提出,它“不切实际、不合情理”。因此,“启蒙时期英国的戏剧家、批评家,谁都受到新古典主义戏剧规律的束缚,但谁都没有严格遵守那些规律,而不少人还有意无意破坏了那些规律。”参见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11-117页。
- ⑦“哲学批评”派的评论参见 Lee(1989:222-240)。
- ⑧下述关于新批评派评论详见 Lee(1989:246-254)。
- ⑨从2000到2009这十年间,《莎士比亚评论集》中共收录了24篇与《约翰王》相关的研究文献,切入角度多种多样,探讨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细致。

参考文献:

- [1] Bloom, Harold. *William Shakespeare: Histories* (New Edition) [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9.
- [2] Campana, Joseph. Killing Shakespeare's Children: The Case of *Richard III* and *King John* [J]. *Shakespeare*, 2007 (1): 18-39.
- [3] Finnerty, Paraic. "Both are Alike, and Both Alike We Like": Sovereignty and Amity in Shakespeare's *King John* [J]. *Literature & History*, 2011 (20): 38-58.
- [4] Cohen, Walter. King John [G] // Greenblatt, Stephen (ed.). *The Norton Shakespeare: Historie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7.
- [5] Johnson, Samuel. The Preface to Shakespeare [G] // Hazard Adams & Leroy Searle (eds.).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6] Lee, Michael (ed.).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vol. 9) [G]. New York: Thomson Gale, 1989.
- [7] Lee, Michael (ed.).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vol. 41) [G]. New York: Thomson Gale, 1998.
- [8] Lee, Michael (ed.).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vol. 68) [G]. New York: Thomson Gale, 2003.
- [9] Lee, Michael (ed.).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vol. 108) [G]. New York: Thomson Gale, 2007.
- [10] Lee, Michael (ed.).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vol. 123) [G]. New York: Thomson Gale, 2009.
- [11] Lee, Michael (ed.).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vol. 132) [G]. New York: Thomson Gale, 2010.
- [12] Lee, Michael (ed.).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vol. 142) [G]. New York: Thomson Gale, 2012.
- [13] 范存忠. 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1.
- [14] 亚里斯多德, 贺拉斯. 诗学·诗艺 [M]. 罗念生, 杨周翰,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责任编辑:肖 谊

复杂适应系统语言观视角的当代 英语过去分词词化研究

——以《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8版)为例

王仁强 康 晶

(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 重庆 400031)

摘 要:近年来,词化现象成为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然而,不少词化研究缺少基于大数据的实证调查,同时也缺乏深度的理论阐释。本文以复杂适应系统语言观为理论基础,基于《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8版),对当代英语过去分词词化现象进行研究,以期揭示现代英语词化现象的生成机制,优化现代英语词典的收词立目。

关键词:当代英语;词化;过去分词;复杂适应系统语言观

A Study of the Lexicalization of Past Participles in Modern English Based on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8th 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as a CAS

WANG Renqiang KANG J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lexicaliz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and hot issues in linguistics. However, many previous researches either lack solid empirical basis or profou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In this article, we have adopted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a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study the lexicalization of past participles in Modern English based on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8th ed.), so as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lexicalization in Modern English, and to optimize the entry of lexemes in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ies.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超学科视域下的分析语词类问题实证研究”(15BYY16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仁强,男,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词典学、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及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康 晶,女,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词典学研究。

Key words: Modern English; lexicalization; past participles; language as a CAS

0. 引言

近年来,词化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并成为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Blank, 2001; Hohenhaus, 2005; Brinton & Traugott, 2005; Ježek, 2016; 董秀芳, 2013; 刘辰诞, 2016; 王文斌, 2005)。词化和词范畴(wordhood)密切相关,前者强调成词的过程,后者强调成词后的结果状态。词化是语言动态变化的方式之一,是语言结构取得词位地位的重要途径,取得合法词位是进入词典的先决条件。然而,目前有关词化问题的研究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①词化问题与词库概念息息相关,但学界常常混用“词库”(lexicon)概念。正如 Aronoff & Fudeman (2011: 54) 所言,在语言学研究中“词库”这个术语往往具有多重含义,但研究者往往并不明确陈述自己的概念内涵。Hohenhaus (2005: 357) 指出,关于词化在共时层面的角色和词库的本质存在很大的争议。主流形态学著作中的“词库”通常指个人语言(idiolect),尤其是理想化个人语言的心理词库(Haspelmath & Sims, 2010: 60; Aronoff & Fudeman, 2011: 56; Bauer, 1983: 190),这显然是主要受到生成语言学的影响,而论及言语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即语文词典)的形态学论著算是凤毛麟角(Štekauer, 1998; Hohenhaus, 2005)。②缺乏大数据的实证研究,尤其缺乏基于词典的大数据研究。

尽管有研究指出屈折变化形式获得独立的词范畴地位也是词化的一种形式(Ježek, 2016: 6),但动词过去分词形式能否词化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主流的观点认为,屈折变化只是句法现象(Haspelmath & Sims, 2010: 90; Aronoff & Fudeman, 2011: 168),因而过去分词就只是动词在具体句法环境中的屈折变化形式。不过,也有研究偶尔提及过去分词形式的词化情况(Biber, et al., 1999: 530; Jurafsky & Martin, 2009: 134)。Bauer (1983: 40) 甚至认为,几乎所有的英语过去分词形式都可以充当形容词来修饰名词。但是,英语过去分词形式的词化是否仅仅限于形容词范畴?英语过去分词形式的词化究竟有多普遍?遗憾的是,目前尚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复杂适应系统语言观为理论基础,基于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8th ed.) (《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8版),以下简称“OALD-8”),对现代英语过去分词词化现象进行研究,以期揭示现代英语词化现象的生成机制,优化现代英语词典的收词立目。

1. 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复杂适应系统语言观为理论基础。复杂适应系统语言观认为,使用模式影响语言表征、语言习得和语言演变(Beckner, et al., 2009; Bybee, 2010)。作为复杂适应系统,语言有如下特点:①分布控制和集体涌现:语言既存在于言语个体中

(即作为个人语言),又存在于使用群体中(即作为社群语言);②内在多样性:作为复杂适应系统,语言并没有理想的使用者;③永远的动态性:语言永远处于动态变化中,社群语言和个人言语层面的言语总是在不停地演化;④通过因素加强和竞争而达到适应:语言作为复杂适应系统,并非封闭系统,而是要受到语言使用者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必须适应这些外在环境;⑤非线性和相变:语言复杂适应系统中,量变会导致语言的相变,这是语言演化的重要理论基础;⑥网络机构敏感性和依赖性: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作为复杂适应系统,语言演化要受到社会网络中各个因素的影响;⑦变化的局部性:语言的演化由局部开始,并受到人类认知的影响。复杂适应系统语言观给语言学的发展带来一场革命,把语言演化的研究带入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使人们认识到语言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而语言的演化发展与语言社团对语言的使用息息相关。近年来,复杂适应系统语言观日益得到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演化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和二语习得等众多领域的认同。

词化现象作为语言演化的一个环节,复杂适应系统语言观为其提供了最好的阐释。鉴于词典词通常等同于词位(Haspelmath & Sims, 2010:15),本研究拟词典为载体对过去分词的词化问题进行大数据的实证研究。数据处理过程如下:①首先,以OALD-8为基础建立所有词类标注数据库;②筛选出所有的动词词条(包括涉及动词用法的兼类词);③筛选出所有收录的过去分词词条(包括规则与不规则形式);④删掉词典中没有标注词类的过去分词;⑤对筛选出的过去分词词类进行统计得出研究中所需数据;⑥结合当代美语语料库(COCA)和历时美语语料库(COHA)两大美语语料库对分词词位地位获得进行个案研究。

2. 调查结果

2.1 OALD-8 词化过去分词的收录情况

统计发现,OALD-8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对所收条目中现代英语的词标注了词类。在整部词典收录的47 258个条目中,标注词类的条目有46 047条,其中有886个标有词类的过去分词词条,占成词条目总数的1.92%。在这886个过去分词词条中,规则形式的过去分词词条有847个,占95.60%;不规则形式的过去分词词条有39个,占4.40%,如表1所示。

表1 规则形式和不规则形式过去分词所占比例

	规则过去分词	不规则过去分词	合计
数量	847	39	886
比例	95.60%	4.40%	100%

那么,词化过去分词形式的原型动词占整部词典收录动词词条的比例如何?如表2所示,OALD-8收录的单类动词词条2 849个、兼类动词词条3 081个,合计5 930个动词词条。由此可见,886个过去分词的原形动词占整部词典收录动词词条的比例是14.94%。

表2 OALD-8 整部词典动词收录情况统计

单类	兼类						合计
	兼2类 (V+)	兼3类 (V++)	兼4类 (V+++)	兼5类 (V++++)	兼6类 (V+++++)	小计	动词合计
2849	2774	249	46	11	1	3081	5930
48.04%	46.78%	4.20%	0.78%	0.19%	0.01%	51.96%	100%

2.2 OALD-8 中词化的过去分词词类归属情况

如表3所示,词化的过去分词形式属于单类的占绝大多数,占总条目的98.87%,属于兼类词占1.13%。其中,兼类词以兼两类为主。

表3 OALD-8 中词化的过去分词词条总体兼类情况统计表

兼类情况	单类词	兼类词			合计
		兼两类	兼三类	小计	
数量	876	8	2	10	886
比例	98.87%	0.90%	0.23%	1.13%	100%

单类的词化过去分词可以分别归入形容词和名词,其中形容词独占99.66%(详见表4)。

表4 单类过去分词词条内部结构

词类	形容词	名词	合计
数量	873	3	876
比例	99.66%	0.34%	100%
例词	absorbed, bored, classified, detailed, excited, interested, married	felt, thought, signified	

兼类的词化过去分词尽管总量只有10个,但在词类归属方面却有7种情况。其中,兼两类的词化过去分词有5种情况,形名兼类词有4个,占50%,其他4种情况各有1个(详见表5)。而兼三类的词化过去分词只有2个,其中“given”兼属形容词、介词和名词,而dammed则兼属形容词、副词和名词。

表5 兼两类的词条内部构成

序号	兼类类型	数量	比例	例词
1	[noun]&[adjective]	4	50.00%	colored, unknown, wicked, drunk
2	[verb]&[adjective]	1	12.50%	born
3	[adjective]&[preposition]	1	12.50%	gone
4	[adjective]&[exclamation]	1	12.50%	done
5	[adverb]&[conjunction]	1	12.50%	granted
合计	5类	8	100%	

3. 讨论

3.1 当代英语过去分词词化的规模与类型

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能否词化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Bauer(1983:40-41)指出,英语过去分词形式时而表现为动词的屈折变化,时而又颇像动词的派生形式,其地位和本质值得深究。主流的观点认为,屈折变化是句法现象(Haspelmath & Sims, 2010:90; Aronoff & Fudeman, 2011:168),因而过去分词只是动词在具体句法环境中的屈折变化形式。诚然,也有研究提及过去分词形式词化的问题。比如, Biber 等(1999:530)在讨论英语形容词的时候提到-ed 过去分词形式充当形容词的情况,并列出 22 个-ed 形式的过去分词形容词。Jurafsky & Martin(2009:134)在讨论英语语料库词性标注时,以 married 为例提醒在给-ed 形式进行词性标注要注意区分动词与形容词,间接提示-ed 形式过去分词的词化问题。Ježek & Ramat(2009:409)以意大利语为例,说明分词形式获得形容词功能的情况非常普遍。Bauer(1983:40)甚至认为,几乎所有的英语过去分词形式都可以充当形容词来修饰名词。Bauer 等(2013:306)再次指出,过去分词形式常常充当名词修饰语,以致于有研究指出其本身就具有形容词属性。然而,上述研究多半是例举式的理论思辨,且主要局限于-ed 形式的过去分词,对于英语过去分词的词化的规模和类型缺乏相关的实证调查。

本项调查表明,OALD-8 整部词典中有 886 个成词的过去分词词条,尽管只占成词条目总数的 1.92%,但其原形动词占整部词典收录动词词条的比例却高达 14.94%。词化的过去分词形式属于单类的占 98.87%,属于兼类词占 1.13%。兼类的词化过去分词尽管总量只有 10 个,但在词类归属方面却有 7 种情况。兼类词以兼两类为主,其中形名兼类词最多。调查结果以确凿的数据证实,词化过去分词与形容词确实具有极大关联(Ljung, 1976; Ježek & Ramat, 2009:409),但同时也证伪了 Bauer(1983:40)的观点:并非所有的过去分词形式都经常性地充当形容词来修饰名词,因为词化过去分词的原形动词只占整部词典收录动词词条的 14.94%。

3.2 过去分词词化的机制

Bauer(1983: 40)指出,屈折变化衍生一个词项的各种词形,而派生则产生新的词项。既然 OALD-8 显示词化过去分词的原形动词只占整部词典收录动词词条的 14.94%,那么过去分词词化的机制是什么?

鉴于语言是一个复杂系统,使用模式影响语言表征、语言习得和语言演变(Beckner, et al., 2009; Bybee, 2010),显然词化是一种语言演变,是使用模式变化引发的语言演变,并最终在共时语言层面词库中实现的语言表征。正如 Kristiansen & Geeraerts(2013: 2)所言,语言使用和语言系统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语法不仅仅构成用于语言使用的知识库,其本身还是语言使用的产物。以过去分词形容词为例,如果分词作为形容词的用法已经规约化,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过去分词已经不仅仅是动词的屈折变化形式,而且获得了独立的词位地位,可以作为独立词条并标注为形容词收入词典。王仁强、陈和敏(2014)指出,判断规约化程度有四个标准:个例频率、类型频率、使用域和使用年代。我们不妨以典型的分词形容词“interested”为例,基于当代美语语料库(COCA)和历时美语语料库(COHA)进行调查。如表 6 所示,“interested”作为形容词用法的个例频率很高,达到 32742,而使用域也很广泛,在五个语域中都有很高的个例频率。

表 6 “Interested”形容词用法在 COCA 中的调查情况

语域	Spoken	Fiction	Magazine	Newspaper	Academic	合计
个例频率	7745	5526	6130	6398	6943	32742

典型的形容词既可以充当述谓形容词又可以充当名词修饰语,尤其是后者(Croft, 1991: 55)。鉴于类型频率与语言结构的能产性密切相关(Bybee, 2010: 95),我们不妨对其修饰名词的类型频率进行调查。基于 COCA 的调查发现,“interested”可用来修饰 408 个不同名词(表 7 是其修饰的频率最高的前 20 个名词),这说明它的能产性极高。

表 7 “Interested”形容词用法类型频率

序号	被修饰的名词	频率	序号	被修饰的名词	频率
1	party	455	11	teacher	23
2	reader	89	12	participant	20
3	student	69	13	member	19
4	person	60	14	faculty	16
5	group	48	15	family	14
6	people	39	16	public	14
7	citizen	33	17	state	14
8	individual	30	18	team	14
9	observer	28	19	parent	13
10	buyer	27	20	school	12

通过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 中对“interested”的词源进行调查,我们发现:“interested”的形容词用法最早出现在 1705 年,源于动词“interest”的过去分词用法。如表 8 所示,基于 COHA 的调查表明,近 200 年来,其形容词用法的使用频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表 8 “Interested”形容词用法在 COHA 中的调查情况

Time span	Frequency
1810s – 1850s	2075
1860s – 1900s	5848
1910s – 1950s	10596
1960s – 2000s	9407

鉴于“interested”的形容词用法有超高的个例频率和类型频率,较长的使用历史以及广泛的使用域,其形容词用法早已实现了规约化,无疑可以作为独立词条收入词典。

此外,通过 OALD-8 中对过去分词词化的调查,我们还发现部分英语过去分词不仅作为独立词条收录,甚至还有 10 个词条已经实现了多范畴化,并作为兼类词收入词典。实际上,前人对过去分词词化的研究仅限于单类词,缺乏对兼类词的讨论。

4. 结语

综上所述,词化问题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前人对于过去分词词化问题的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当代英语词库中过去分词词化的范围和类型进行了系统调查,并从复杂适应系统语言观视角对其词化的机制进行了阐释,无疑有助于深化词化问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Aronoff, M. & K. Fudeman. *What Is Morphology* (2nd ed.) [M]. Mai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1.
- [2] Bauer, L. *English Word-form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 Bauer, L. *The Linguistics Student's Handbook*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4] Bauer, L., Lieber R. & I. Plag. *The Oxford Reference Guide to English Morpholog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5] Beckner, C., et al. Language i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Position Paper [J]. *Language Learning*, 2009, 59(1): 1–26.
- [6] Biber, D., et al.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M].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1999.
- [7] Blank, A. Pathways of Lexicalization [G] // M. Haspetmath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vol.2)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1.
- [8] Booij, G. *The Grammar of Words: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Morphology* (3rd ed.)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9] Brinton, L. J., & E. C. Traugott.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0] Bybee, J. *Morph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5.
- [11] Bybee, J. Morphology as Lexical Organization [G] // M. T. Hammond & M. P. Noonan. *Theoretical Morphology: Approaches in Modern Linguistic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8: 119 – 141.
- [12] Bybee, J. *Language, Usage and Cogni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3] Croft, W. *Syntactic Categorie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The Cognitiv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14] Haspelmath, M. & A. D. Sims. *Understanding Morphology* (2nd ed.) [M].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2010.
- [15] Hohenhaus, P. Lexi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G] // P. Štekauer & R. Lieber. *Handbook of Word-formation*. Berlin: Springer, 2005: 353 – 373.
- [16] Ježek, E. *The Lexicon: An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17] Ježek, E. & P. Ramat. On Parts-of-speech Transcategorization [J]. *Folia Linguistica*, 2009, 43 (2), 391 – 416.
- [18] Jurafsky, D. & J. H. Martin.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An Introduction to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Speech Recognition* (2nd ed.) [M].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9.
- [19] Kristiansen, G. & D. Geeraerts. Introduction: Contexts and Usage i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3(52): 1 – 4.
- [20] Lipka, L. Lexi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Revisited and Extended [J]. *SKAS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2005, 2 (2): 40 – 42.
- [21] Ljung, M. -ed Adjectives Revisited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76, 12 (01): 159 – 168.
- [22] Schmid, H. *English Morphology and Word-formation* [M]. Berlin: Erich Schmidt Verlag, 2011.
- [23] Štekauer, P. *An Onomasiological Theory of English Word-Formation*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8.
- [24] Wang, R. Q. Two-level Word Class Categorization in Analytic Languag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ultiple Class Membership in Modern Chinese and Modern English [G] // *Proceedings of the 3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German Linguistic Society*. Marburg: Marbury, Germany University of Marburg, 2014.
- [25] 董秀芳. 词汇化: 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3.
- [26] 刘辰诞. 边界分派: 词汇化的认知动因 [J]. *现代外语*, 2016 (4): 449 – 458.
- [27] 罗思明, 徐海, 王文斌. 当代词汇化研究综合考察 [J]. *现代外语*, 2007 (4): 414 – 423.
- [28] 王仁强. 现代汉语词范畴认知研究——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为例 [J]. *外国语文*, 2011 (1): 71 – 77.
- [29] 王仁强, 陈和敏. 基于语料库的动词与构式关系研究——以 sneeze 及物动词用法的规约化为例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 (1): 19 – 31.
- [30] 王仁强, 周瑜. 现代汉语兼类与词频的相关性研究——兼评“简略原则”的效度 [J]. *外国语文*, 2015 (2): 61 – 69.
- [31] 王文斌. 英语词化探析 [J]. *中国外语*, 2005 (5): 64 – 68.

责任编辑:朱晓云

言语行为视阈下“义”之外交原则

——以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讲话为例

刘风光 肇迎如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44)

摘要:外交话语是外交思想传播的有效载体,外交原则通过外交话语加以建构。本研究以习近平主席 2015 年 9 月 26 日在联合国发展峰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为语料,对“义”的外交原则进行深入阐释,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析宏观施事行为、次宏观施事行为和言语行为群以及微观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和表达类施事行为在习主席讲话中的体现,并通过对其取效行为的分析揭示该政治语篇中体现的中国一直秉持的“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以及所彰显的大国担当和领导力。

关键词:言语行为;政治语篇;“义”外交原则

The Diplomatic Principle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in President Xi’s Spee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ech A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eech in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LIU Fengguang ZHAO Yingru

Abstract: Political discourse is an effective carrier of diplomatic thoughts and the diplomatic principle is also established through political discourse. Taking President Xi Jinping’s speech delivered in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on 26th September, 2015 as data, this study further elaborates on the diplomatic principle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From both macro and micro levels, the paper explores both macro-illocutionary acts, sub-global illocutionary acts, speech act sequences and micro-illocutionary acts such as representatives, directives, commissives and expressives in President Xi’s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学语篇认知语用文体研究”(15BYY18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风光,女,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英语语用学、文体学和语篇分析研究。

肇迎如,女,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用学和语篇分析研究。

speech and analyzes the perlocutionary act with an aim to reveal China's diplomatic principle of taking a right approach to justice and interest by putting justice before interest as well as China'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and leadership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Key words: speech acts; political discourse; diplomatic principle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0. 引言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Rackham, 1932:139),开启了人类对于语言与政治密切关系的探讨。保罗·切尔顿(Paul Chilton)(2004:5)指出,脱离语言,政治就不复存在。政治通过语言得以体现和实施。“语言具有政治性,语言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对政治活动具有潜在和现实的影响”(孙玉华、彭文钊、刘宏, 2015: 2)。在外事外交领域,政治语言体现一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政治语篇是政治交际的载体之一。麦克奈尔·布赖恩(McNair Brian)(1999:72)认为,政治家和其他政治参与者为达到某一特定目的所进行的交际形式可以被看作一种政治语篇。政治语篇的研究已引起众多语言学家的关注。对政治语言的修辞研究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随着语言学理论的不断充实和发展,以概念隐喻为基础的认知分析、以鲁思·沃达克(Ruth Wodak)(2002:495-517;2007:203-225)、诺曼·菲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1992:13;2003:22)和保罗·切尔顿(2004:5)为代表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72:57)为代表的语言与哲学关系视角下的政治语篇分析以及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理论共建为基础的综合类分析成为政治语言及政治语篇的主要研究手段。鲁思·沃达克(2007:216)认为语用学非常适用于阐释政治语篇。语用学能清晰地区分直接语境里的重要成分,如:说者、听者、语境、意图等。因此,以发掘意识形态为目的的政治语篇分析可以采用语用学的理论和方法。“预设”、“礼貌”和“会话含义”等语用学概念多被用来进行政治语篇的语用学分析(杨敏,2011:37-42)。冯·戴伊克(van Dijk)(1982:27)认为话语是一种语言的运用,与交际事件概念相适应的语言形式、意义与行为的复杂统一体。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波考克(John Pocock)(2009:47)强调政治语言即行动,须将之当成在历史上被展示的事件来看待。在波考克看来,言说本身即为政治行动。言说的政治性在于言说是人们之间相互施加和交流权力的行动,话语具有对他人施加权力的力量。言说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言说的内容,为了建立一个政治文本的意义,为了发现其作者事实上都说了什么、意指了什么或传递了什么。政治语篇是具有一定意向的语篇,其言外之力可以通过宏观和微观言语行为实现。因此,利用言语行为理论对作为政治意图实施载体的政治语篇的言说范式进行探讨和分析,可深入了解语言与政治意图、计划、原则在政治实践中的共变关系,揭示如何通过语言运用的策略获得政治权力、操控意识形态,同时拓展言语行为理论的应用领域,加深政治语

篇构建模式的理解,有效促进外事外交发展。

“外交原则是指导人们从事外交活动,制定外交政策的观念和信仰的总和,它建立在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之上,反映了人们对外交行为的不同思考与预期。外交原则对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一国的外交原则,有助于理解该国的外交政策”(张静,2010:5)。从某种程度上说,外交原则是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灵魂,是外交实践的行动指南。从语言学角度阐释外交原则的构建与实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外交原则与语言的相互依托渗透关系,充分揭示外交原则在以语言为载体的具体外事外交活动中的实施,以期塑造国家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

习近平主席 2015 年 9 月 26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主席强调,国际社会要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为新起点,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中国以落实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为己任,团结协作,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不断向前。习主席提出“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同各国一道为实现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作出努力”。本文以此次讲话为语料,讲话中涉及各类宏观、微观施事行为部分共计 1 900 余字,由 24 个段落组成(不包括称呼语“主席先生,各位同事!”的独立句段)。通过分析其中的宏观和微观施事行为及取效行为,旨在揭示该政治语篇中言语行为群所构成的宏观施事行为以及微观阐述类、承诺类、指令类、表达类等施事行为体现的“义”之外交原则。

1. “义”的外交理念与宏观、微观施事行为及取效行为

1.1 “义”的外交理念

“义”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义谓天下合宜之理。本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道理或举动。孔子最早提出了“义”的概念。《现代汉语辞海》(1997:1392)阐释“义”的含义:一指“公正的、符合人民意志的道理”;二指“合乎正义或公益的”;三指“情谊”。在中国外交原则中,“义”的含义体现为睦邻友好情谊;正确的义利观,重义守信;互惠互利;先容后义。

1.2 微观、宏观施事行为及取效行为

言语行为的基本概念最早由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形成,并于 1962 由其学生在《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结集出版,后经约翰·塞尔(John Searle)(1969:25;1975:18,1979:21)补充、修正和发展,其理论更加科学系统化。言语行为是指说话即做事,说出一个句子,就是或者部分是社会机构和规约框架内的行为。简言之,言即行,语词即行动。根据约翰·奥斯汀(1962:90)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一个言语行为可以抽象三分为:说话行为(即言内行为)、施事行为(即言外行为)和取效行为(即言后行为)。其中,施事行为用以表达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根据言外之的、适从向、表达的心理状态以及命题内容四个维度,可将施事行

为细化为五类,即阐述类(或断言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和宣告类言语行为(Searle,1979:24)。而取效行为则强调“话语说了之后,将经常甚至正常情况下会对听者、说者或他人的情感、思想或行为产生某种结果的影响”(Austin,1980:101)。其本质是说话人通过语言手段对听话人施加影响。话语产生效果是说听者相互作用的过程。说者所为仅限于言语行为和其他辅助行为,效果是听者反应,是听者所为。因此,取效行为不是说者一人所为,而是说者和听者两人合为。

在社会语言交际中存在更大的言语行为交际单位即语篇。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只是孤立语境的单一言语行为研究,而语篇分析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进一步促进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冯·戴伊克(1982:43)首先从语义视角提出“宏观结构”理论语篇分析模式。在语义层面,篇章组织的宏观框架结构即篇章模式的主要类型包括“问题—解决模式”、“主张—反主张模式”、“提问—回答模式”及“一般—特殊模式”等(刘辰诞、赵秀凤,2011:52)。冯·戴伊克(2004:12-14)将语义连贯理论应用于言语行为序列的语用连贯中,把命题序列与宏观命题相匹配,把言语行为序列与宏观言语行为相匹配。宏观言语行为的概念与语义宏观结构有着系统的联系:一个宏观言语行为的命题“内容”,不仅可以从形式维度、意义维度还可从语用维度即话语执行的整体言语行为研究篇章的整体结构。冯·戴伊克(1977:4)语用宏观结构理论认为,语篇中含有言语行为群;这个言语行为群的总体言语行为就是宏观言语行为。宏观施事行为多以一个主要的施事行为来实施,但有时是几个施事行为构成的总体概念。在某些情况下,一个行为群没有“主要行为”,只有许多单一行为组成的宏观行为。同理在语篇中也可能没有主要施事行为,其宏观施事行为是由多个并列的单一言语行为构成的宏观概念。换言之,连续说出几个话语以完成一个宏观施事行为。比如,通过说出一段完整的话语表示承诺、警告、陈述、祝贺或谴责等,也可以通过几组言语行为群构建宏观施事行为模式。

习近平主席联合国发展峰会讲话中的“义”的外交原则是通过语篇中的宏观系列施事行为与微观个体施事行为体现的,并最终有积极的取效行为实现。塑造了中国以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己任,团结协作,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不断向前的大国形象,表现了中国与各国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的决心。

2. 微观施事行为层面“义”的外交原则体现

田海龙(2002:23)提出政治语言研究“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运用语言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施加影响)以及公众如何通过他们使用的语言认识这些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他们是亲和还是专横)”。公共政治语篇是一个国家外交原则的载体,而其言外之力又通过恰当的言语表达形式得以实现。在习主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发言中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以及表达类施事行为分布及频次如表1所示,习主席在其讲话中大量使用阐述类及指令类言语行为,辅以体现中国大国担当的承诺类言语行为,发

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彰显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所秉持的“义”的外交原则。

表1 微观施事行为

微观施事行为类型	阐述类	指令类	承诺类	表达类
频次	22	29	9	2
百分比	34.92%	46.03%	14.28%	3.17%

2.1 阐述类言语行为

中国在国际社会一直秉持“义”的外交原则,在处理自身及国际问题过程中坚持维护国际正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维护国际道德秩序。阐述类(Representatives)言语行为表示说话人对某事做出一定程度的表态,对话语所表达的命题内容做出真假判断。其基本条件是说话人保证命题的真实性,真诚条件是说话人相信所陈述的命题为真,适从向是说话人尽力使语词与世界相符。陈述、断言、总结等都是典型的阐述。在外交政治语篇中,以真实的国内国际发展现状、发展问题、发展方向为陈述内容,恰当选择阐述类言语行为的施事者、陈述限定词,可有效地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所秉持的“义”之外交原则,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坦诚相待、实事求是的合作态度,以及愿与各国一道迎接国际挑战、实现共赢发展的大国担当和影响力。

在联合国发展峰会讲话中,习主席表示:“回首过去,我们经历了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也承受了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此处阐述言语行为客观扼要地描述了峰会之际,全球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挑战。其中,国际经济局势的真实情况是世界经济在经历了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因此,习主席对当前局势的陈述符合客观事实,并且说话人相信所阐释的经济情况真实,满足该言语行为的真诚条件,同时,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危机两方面回顾世界经济格局,尽力使话语阐述角度与世界相符。此处阐述类言语行为主语为包容性人称代词“我们”,指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坦诚指出经济全球化下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经济问题,体现了中国愿与各国一道迎接国际经济挑战的决心。此外,讲话后半部,习主席表示:“中国基本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少了4.39亿,在教育、卫生、妇女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习主席利用阐述类言语行为对中国发展现状做了客观概述,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中国基本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习主席的陈述符合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客观事实,通过限定词“基本”、数词“4.39亿”的使用,尽力使话语内容与中国国情相符,准确真实地描述了中国在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讲话中,阐述类言语行为描述内容与客观事实相符,体现了近年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的“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国际形象。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中国的事实,讲关于中国的真理,以事实服人,以理服人(楚树龙,2015)。要做好中国思想海外传播

就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讲好中国故事。此外,断言话语如:“环顾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及“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包括最近发生在欧洲的难民危机,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断言类言语行为客观真诚地陈述了中国对国际危机与挑战的认识和看法,表现了中国在国际问题面前的责任和忧患意识,同时也为解决国际问题的系列举措提供了理论指导。

2.2 指令类言语行为

在“义”的外交原则指导下,中国对国际危机和挑战怀有较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充满矛盾和利益纷争的国际社会,中国在明确自身立场的同时,以各国共同利益为先,号召各国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共同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实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指令类(Directives)言语行为是说话人向听话人传达自己的意图,使听话人做出说话人所期许的行为。其基本条件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做某事,真诚条件是说话人要听话人采取行动,适从向是说话人尽力使世界与语词相符,命题条件是在将来采取行动。在政治语篇中,施事者有效选取促使他人采取行动的指令类施为动词,以坦诚的态度号召听话人采取行动,在发挥国际作用的同时亦塑造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解决国际问题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讲话中,习主席表示:“我倡议,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落实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努力实现合作共赢。”此处,习主席采取的指令类言语行为基本条件是试图通过演讲号召各国加强跨国合作,以落实发展议程。其中动词“倡议”体现该指令类言语行为的真诚条件,表示习主席首先提出建议,坦诚号召大家采取实际行动促进国际合作。通过指令类言语行为向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动员各国尽力达成发展议程,同时命题条件是期望各国在未来采取实际行动。讲话中,指令类言语行为目的在于劝说听话人采取实际行动,体现说话人的责任意识。又如,习主席表示:“各国要根据自身禀赋特点,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此处指令类言语行为通过能愿动词“要”实现;“发达国家应该及时兑现承诺、履行义务,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南北合作主渠道地位,深化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其指令类言语行为通过能愿动词“应该”实现,这里“要”和“应该”作为指令类能愿动词,完成讲话中指令类言语行为,向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如表 2 所示,讲话中,习主席通过“必须”、“应该”、“要”、“让”、“不能”等能愿动词,实施指令类施事行为,展现中国在重义守信互惠互利的“义”的外交原则指导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责任意识和大国担当,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表 2 能愿动词

能愿动词	必须	应该/应	要	让	不能
频次	1	5	19	6	1
百分比	3.12%	15.62%	59.37%	18.75%	3.12%

2.3 承诺类言语行为

“义”的外交原则核心是先义后利、重义守信、互惠互利。中国致力于以自身发展带动周边国家发展、辐射世界各国,将互利共赢的合作方式提升至更高水平。承诺类(Commissives)言语行为指发话人承担做某事的义务,即发话人对未来某一行为做出承诺、保证或威胁。其基本条件是说话人对将来某行动做出承诺,真诚条件是说话人打算采取行动,适从向是说话人尽力使世界与语词相符,命题条件是在将来采取行动。政治语篇中承诺类言语行为是有效向受话人许下承诺、施事恩惠的言语表达方式。施事动词具有行动效应,言即行,发出承诺类言语行为即向各国许下承诺,并受国际社会舆论监督。在有效的时间状语限定下,如期兑现承诺,夯实“义”之外交原则所依托的物质基础。

讲话结尾部分习主席庄严承诺:“我宣布:——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此处习主席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债务问题作出承诺,通过动词“宣布”及时间状语“将”,习主席向各国做出承诺,表示中国将在未来采取行动,履行其减免各国债务的承诺。讲话中,承诺类言语行为最能体现中国“义”的外交原则。“惠”是“义”的物质支撑,中国只有通过“惠”才能坐实双边关系来夯实利益共同体。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以义为先”,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帮扶,支持其提高自身发展能力。

2.4 表达类言语行为

“义”的外交原则倡导中国在国际挑战中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对国际问题给予真诚关切。表达类(Expressives)言语行为表达的是发话者对某种事态、某种事情所持的感情或某种态度。该类行为表达各种心理状态。如祝贺、欢迎、感谢或道歉等。其基本条件是说话人表达某种心理状态,真诚条件是反映出对听话人的态度,适从向是假定语词与世界相符,命题条件是对某种事态的描写。政治语篇从施事人真实心理状态出发,恰当使用表达类言语行为,可展现一个国家以国际责任为己任,与国际社会同呼吸共患难的决心和意志。

讲话中,习主席以情动人,表示“我们既为11亿人民脱贫而深受鼓舞,也为8亿多人仍在挨饿而深为担忧”。此处表达类言语行为以世界人民所处的真实生存情况为命题条件,以中国忧虑世界人民疾苦的心理状态为基本条件,“鼓舞”、“担忧”等具有感情色彩的动词表现中国面对世界经济不断增长、世界人民逐渐走出贫困而发自内心的欣喜与骄傲,同时对于缺乏基本生存资源、挣扎于生存边缘的8亿多世界人民的生存现状表示担心和忧虑。此外,“11亿”、“8亿”具体数据真实可信,反映世界人民所处真实形势,程度副词“深受”、“深为”突出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受苦受难人民真心实意的关怀。

3. 宏观施事行为层面“义”的外交原则体现

冯·戴伊克(1977:4)认为,系列言语行为中的数个言语行为在功能上要互相关联,从而形成一个合成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序列被看作一个单位,即合成言语行为被视为或解释为一个单位。冯·戴伊克(2004:12-14)指出,从语用学角度来看,一篇新闻报道是一个宏观断言,一个勒索便条是一个宏观恐吓。一个话语的意义也是如此,是语言使用者对于一次谈话行为的回忆:不关注细节性的局部言语行为,更多地关注语用“结论”或话语要点,即总体的宏观言语行为。

3.1 宏观言语行为

语篇层面上的宏观施事行为以政治交际性目的为导向。习近平主席联合国发展峰会讲话作为政治语篇,属于宏观指令类施事行为,其目的在于通过说服国际社会与中国共同承担和平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从而构建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形象,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外交原则。自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面对中国快速发展与崛起,在国际社会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以及“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等各种“变种”威胁论,并向网络领域延伸(李庆四,2013:51-54),对中国国际形象和参与国际性事务造成了阻碍。在此国际交际环境之下,中国领导人系列发言的政治目的是通过整篇发言的宏观指令类言语行为,展现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立场和“以义为先”的外交原则,并且再次将国际社会的目光从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转移至亟需解决的各类世界性发展问题上来。

3.2 次宏观言语行为及言语行为群

根据冯·戴伊克(2004:12-14)的观点,在宏观言语行为层面,一个语篇即一个宏观言语行为,其下由多个言语行为群组成次宏观言语行为(sub-global speech act),实现问题解决以及计划实行等多种语用功能。宏观言语行为作为复合言语行为表达单位,集合了阐述类言语行为的客观陈述功能、指令类言语行为的号召功能以及承诺类言语行为的许诺与保证功能。多种施事行为宏观层面组合具有语篇连贯性,能够更好地彰显中国在外事外交中所秉持的“义”之外交原则。习近平主席联合国发展峰会讲话作为政治语篇,其篇章宏观指令类施事行为主要通过阐述一指令类次宏观施事行为和阐述一承诺类次宏观施事行为实现。阐述类言语行为群与指令类施事行为群共同构成篇章结构之下的阐述一指令类次宏观施事行为,阐述类言语行为群与承诺类施事行为群共同构成阐述一承诺类次宏观施事行为,以上两个次宏观言语行为在篇章宏观语用行为建构中属于递进关系。

篇章层面宏观施事行为布局与构建决定了一篇政治演讲能否有效表达政治理念、实现政治目的。语篇层面的问题—解决模式对应在本政治语篇语用层面为阐述一指令类次宏观施事行为。在真实且合理的客观事实描述基础上提出指令号召,既具现实条件又具客观说服力。习主席首先通过阐述一指令类次宏观施事行为,如

“回首过去,我们经历了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也承受了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我们见证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面对着南北发展失衡的现实。”“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包括最近发生在欧洲的难民危机,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等数个阐述类言语行为构成阐述类言语行为群,从世界经济进步、发展所遇挑战、解决措施等几方面对世界发展形势作出整体概括。“我们应该以此为新起点,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我们要争取公平的发展,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号召呼吁各国共创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首先,此处数个指令类施事行为组成指令类言语行为群,号召世界各国采取系列举措,共谋进步发展。指令类言语行为群气势恢宏,决心之大,表达了中国谋求公平、开放、全面、创新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坚定信念。和平发展是中国的第一要务,也是世界的恒久主题。“义”的外交理念体现在中国既对各国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怀有期许,但同时又提倡各国在其能力和水平范围内,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愿与各国一道,共建开放型经济,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中国愿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区域和互联互通合作,努力探索深化同其他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阐述—指令类次宏观言语行为为后文中国以身作则阐述—承诺类次宏观言语行为的实现提供了可能适切的条件,二者呈递进连贯关系,是宏观指令类言语行为实现的基础。

文章后半部分语篇层面问题—解决模式对应语用层面为阐述—承诺类次宏观施事行为。在描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础上,向世界各国做出承诺,既具物质实现性又具公信力和说服力。首先,习主席通过系列阐述类言语行为群真实陈述了中国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各方面发展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为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经验提供现实依据。同时也坦诚地指出了中国与其他各国在新时期需要面对的困难与挑战。随后承诺类言语行为群展现了中国对其他国家采取务实合作的措施如“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免除贷款债务、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习主席在讲话中利用阐述—承诺类次宏观言语行为之施事语力将讲话推向了高潮,达到了赢得国际社会赞誉和积极响应的取效行为效果,表达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决心和行动,体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大国,讲情重义、先义后利,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让中国的发展更好地惠及国际社会。

4. 取效行为层面“义”的外交原则实现

对习主席联合国峰会讲话既要宏观和微观层面探讨施事行为,也要从取效行为角度观照语篇中“义”的外交原则的实现。根据奥斯汀(1962:90)言语行为理论,取效行为是言语行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说话人话语在听话人理解后引起听话人自身做出各种反应,产生感情、思想或行为等效果,是说话人与听话人共同的行为结果。通过探析取效行为,可以进一步分析施事行为积极或消极的话语影响。本文主

要从积极取效行为层面探讨习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讲话中的微观施事行为以及宏观言语行为群在国际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

会上,习主席讲话在听众身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引起了情感上的共鸣。据《人民日报》2015年9月27日报道,习近平主席宣布免除国际债务等系列举措时,全场一再响起热烈掌声。振奋人心的新举措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赞许。由此可见,习主席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展现大国风范的系列承诺类言语行为群,在国际社会取得了良好的感情效果,中国“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外交原则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肯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习主席峰会讲话给予肯定及高度评价,潘基文表示:“习近平主席今天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再次宣布了一系列支持联合国发展议程的举措,令人鼓舞。联合国期待同中国在推进发展议程,解决有关地区热点问题,顺利完成气候变化新协议谈判等领域加强合作。”

会后,习主席讲话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积极的响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美等新型大国关系。在参加联合国总部系列峰会之行期间,习主席同时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落实了其在联合国讲话中所提及的争取公平发展机会、优化发展伙伴关系的承诺。据中国网9月27日报道,中美共达成49项成果,共同应对国际挑战,解决发展问题。例如,中美双方承诺,用以在商业领域加强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安全,考虑国际规范,非歧视,且不对商业机构在相关产品的购买、销售或使用方面不必要地设置基于国别的条件或限制。同时,中美联合制作的宣传片《一路一带,连接你我》和《中国与你同行》登陆美国主要电视台,在9月25日至29日期间,日播放量达240余次,引起美国观众极大兴趣(李晓宏,2015:2)。在联合国发展峰会后,习主席会见了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以及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据人民日报2015年9月28日报道,约翰尼斯表示,新形势下,罗方积极致力于深化罗中关系,期待着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经贸往来,推进人文交流。布哈里表示,尼日利亚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推进尼中关系全面发展。科罗马表示完全同意习主席所说“患难见真情”。塞拉利昂人民在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历史性困难时期,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宝贵的迅速支持。中国的支援也带动了国际社会对塞拉利昂的关注和帮助。塞拉利昂政府和人民对中方深表感谢。哈西娜表示,中方在会上宣布的重要举措,深受包括孟加拉国在内广大发展中国家欢迎。孟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人文领域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框架下的合作。英国广播公司网站9月27日报道指出,中国在峰会上所做的系列承诺表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德国《世界报》27日报道指出习近平为所有国家争取“公平的发展机会”赋予各国平等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权利(殷森、青木、陈一、杜海川、吴志伟等,2015)。可见,习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在各大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取效行为影响,各国纷纷采取行动,共同实现议程发展目标。习主席将中国以义为先,重义守信,互惠互利,先容后义的外交原则传递给国际社会。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强调合作共赢,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主张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外交原则,坚持维护国际正义,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同时,中国在周边外交中以正确的义利观作为构建与周边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指针,以自身发展带动周边国家发展、辐射世界各国,互惠互利,以义为先,体现了中国积极承担世界责任的自信及与各国一道共同努力解决发展难题的决心和气魄。

5. 结语

本研究从宏观和微观言语行为视角,详实分析了习近平主席联合国发展峰会讲话,旨在探讨讲话中篇章宏观言语行为、次宏观言语行为以及言语行为群的实现方式以及微观言语行为层面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以及表达类言语行为所体现的“义”的外交原则,并从取效行为角度进一步探析和验证了在中国“义”之外交原则指导下,政治语篇中宏观微观言语行为如何有效传播中国思想,塑造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形象。未来,中国外交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中国需继续秉持“义”之外交原则,在不同观念和利益、国内和国外、维稳和维权、国家利益和正义原则之间寻求平衡,并在这个过程中对新的国际规范的形成发出中国声音。

参考文献:

- [1] Aristotle. *Politics* [M]. H. Rackham (trans.). London: Heinemann, 1932.
- [2]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1980: 101.
- [3] Chilton, P. *Analyz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4] China Pledges \$2bn for Developing World [N/OL]. *BBC NEWS*, 2015-09-27 [2016-05-31].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34372188>.
- [5] Fairclough, N. *Analyzing Discourse* [M]. London: Routledge, 2003.
- [6]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2.
- [7] Foucault, M.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S. Smith, Trans.) [M]. London: Tavistock, 1972.
- [8] McNair, B.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9.
- [9] Pocock, J.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0] Searle, J. R.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11] Searle, J. R. *Indirect Speech Acts*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 [12] Searle, J. R.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13] van Dijk, T. A. From Text Grammar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B/OL]. *Discourse in Society*,

- 2004[2016-05-31]. <http://www.discourse-in-society.org>.
- [14] van Dijk, T. A. Pragmatic Macro-structures i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G] // M. de Mey,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ognitive Viewpoint*. Ghent: Communication & Cognition, 1977.
- [15] van Dijk, T. A. *Studies in the Pragmatics of Discourse* [M].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Mouton Publishers, 1982.
- [16] Wodak, R. Friend or Foe: The Defamation or Legitimate and Necessary Criticism [J].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2002 (4): 495-517.
- [17] Wodak, R. Pragma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Pragmatics & Cognition*, 2007 (1): 203-225.
- [18] 楚树龙. “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外交的长期任务和挑战[G] // 孙玉华, 刘宏. 话语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语言研究.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5.
- [19] 杜尚泽, 李秉新, 李晓宏. 习近平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5-09-27(1).
- [20] 杜尚泽, 李秉新. 习近平分别会见罗马尼亚总统、尼日利亚总统、塞拉利昂总统和孟加拉国总理 [N]. 人民日报. 2015-09-28(2).
- [21] 刘辰诞, 赵秀凤. 什么是篇章语言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 [22] 李庆四. 美国为何总讲中国威胁论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3(5): 51-54.
- [23] 李晓宏. 中美联合制作的宣传片登陆美国主要电视台 [N]. 人民日报. 2015-09-27(2).
- [24] 倪文杰, 张卫国, 冀小军. 现代汉语辞海 [M]. 北京: 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7: 1392.
- [25] 孙玉华, 彭文钊, 刘宏. 语言的政治 VS 政治的语言——政治语言学理论与方法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5(1): 2.
- [26] 田海龙. 政治语言研究: 评述与思考 [J]. 外语教学, 2002(1): 23.
- [27] 吴闻达. 习近平访美达成 49 项成果 继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N/OL]. 中国网, 新闻中心. 2015-09-27[2016-05-31]. http://www.china.com.cn/node_7000058/content_36690330.htm.
- [28] 殷森, 青木, 陈一, 等. 习近平亮相联合国得高分 主持妇女峰会彰显中国担当 [N]. 环球网, 国际新闻, 2015-09-28[2016-05-31].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09/7655865.html>.
- [29] 杨敏. 西方政治语篇分析的语用学视角 [J]. 中国外语, 2011(2): 37-42.
- [30] 张静. 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外交理念与实践比较研究 [D]. 北京: 外交学院, 2010.

责任编辑: 蒋勇军

试论文字系统的创造对人类意识的影响

孙 桐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089)

摘 要:语言的发展对人类意识的演化影响深远。然而目前的研究对于语言的发展更多地关注口语的产生,而文字系统的创造很少受到关注。但事实上,文字系统的诞生和沿用也是语言发展重要的一环,对人类意识的进步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本文从回顾著名语言学家的语言观和意识观及其理论模型出发,论述了在文字系统诞生的背景下,人类在脑结构、信息储存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变化,从这三个方面探讨了文字系统为人类意识带来的发展,并对语言与意识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解读。

关键词:语言发展;比克顿;人类意识;文字系统

About the Influence on Human Consciousness by the Writing System of Language

SUN Tong

Abstract: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human consciousness. However, the researches on this topic have mainly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oral language more than of written language, and the impact of the creation of writing system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onsciousness has rarely been touched upon. In fact, the rise of the writing systems is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which greatly accelerate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 This article reviews relevant literatur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onsciousness proposed by famous linguists and then argues for the development brought about by the writing system on human consciousness in terms of three aspects: the changes of the human brain, information storing and processing, and social advance, based on which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consciousness is proposed.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Bickerton; human consciousness; writing system of language

0. 引言

“意识(consciousness)”这个抽象的概念应该如何解读?《新牛津英语辞典》(*The*

作者简介:孙 桐,男,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与语言测试研究。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1998: 390)对“意识”的释义为:“神志清醒的以及能够感知自身所处的环境的状态。”《新牛津美语辞典》(*New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2010: 369)对“意识”的释义除了上述含义,还包括“人们特定的观念和意见”,以及“认识到思维本身和客观世界的存在”。后者的释义在“意识”原本含义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即意识既可以指人对环境的感知,也是一种具备思维的状态。

语言学家通过研究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对人类意识的本质和来源进行探索,其中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比如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成晓光,2005;刘润清,2013)。但也有学者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如维果斯基(Lev Vygotsky,1986)认为语言和思维在儿童发展中最开始是独立的,后来在某个阶段紧密结合,并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意识;范晓(2003)认为语言仅和抽象思维密不可分,与形象思维是独立的。可见,从思维的角度看,人类由于掌握了语言,其意识是独特的;因为除了感知环境,人还可以思考、推理,表达观点和感情,可以认识到自身和世界的存在。

人类意识的独特性最终导致了文明社会的诞生与发展,而语言在其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比克顿(Bickerton,1990)认为:“若语言给了我们改变环境的力量,我们就无需再通过改变自身适应环境。”(Bickerton,1990: 233)比克顿(Bickerton,1990, 1995, 2009, 2014)以生物进化的跨学科视野探索语言的本质,其中探讨了语言、意识、思维、人类进化等话题,并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语言的诞生使人类的意识飞跃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然而,比克顿对语言与意识的探讨仅限于口语对意识的影响,而书面语,即文字系统对人类意识的影响还从未涉及。本文从回顾著名语言学家的语言观和意识观及其理论模型出发,认为文字系统的诞生如口语的诞生一样,第二次使人类的意识得到了飞速发展,并从人类在脑结构、信息储存和社会发展等方面论述了在文字系统诞生的背景下,意识方面取得的变化。

1. 语言研究中的意识问题

1.1 意识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性

研究语言可否忽略意识?不同学派的语言学家对此有不同认识。如绍米扬(Shaumyan)(1987:xi)认为:“从本体论上看,语言的地位非常特别……它们属于一个独特的世界,那是一个被认为由符号系统构成的世界,也叫做符号世界。它的特征是本源上来自人类意识,而在本体论上又独立于人类意识。”美国结构主义奠基人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极力反对将“意识”纳入语言研究的范畴。他说,语言学家应该证明,人并没有“思想”,只是发出声音(说话),这种语言声音足以激发其他人的神经系统,成为一种外部刺激,影响其他人的行为(刘润清,2013: 179)。但其后心智主义的代表乔姆斯基(Chomsky,1986: 18)提出,语言研究不能忽略人的心智:“相反,不探讨

有关语言习得的心智的属性,这样的研究很难取得丰富的成果。说得更具体些,要研究语言机能(language faculty)初始状态的属性,这可以用‘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来描述。”他把语言分为“外化语言(E-language)”和“内化语言(I-language)”两种表现形式,分别指具体的语言行为的集合和语言作为大脑及心智的一个属性,并主张以“内化语言”为语言研究的重点(Chomsky,1986)。认知语言学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语言学流派,它从当代认知科学中汲取跨学科经验,研究语言与思维,这是当前最具革新性、最为振奋人心的方法之一;该学派认为,语言是了解认知功能的一个窗口,能为研究思维和意识的本质、结构和组成带来深远的见解(Evans & Green,2006:5)。当代语言研究愈发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语言是意识的一种产物,意识是我们了解语言、研究语言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

1.2 口语的诞生对人类意识发展的影响

比克顿作为语言学家,同时从古生物学、人类学、神经科学、生物学等角度来解释语言普遍性的问题,并且对意识的含义进行了分层次的重新解读。本小节将重点探讨其语言观和意识观。

1.2.1 比克顿的语言观

比克顿认为所谓的动物“语言”还称不上是语言,只有人类的语言才是真正的语言,语言是人类独有的。比如,有些动物虽然有自己的交际系统,但其“交流”仅限于表达个体在某一时刻的状态和感受。其交际系统的符号数量极为有限,而且仅能重复利用这几个单位,所表达的意义变化不大。而且,人类语言的精细程度、复杂程度和创造力,是任何一种动物“语言”都无法企及的。比克顿对此总结:“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动物的交际系统是封闭的。”(Bickerton,1995:16)

那么,人类的语言系统是如何进化出来的呢?比克顿(Bickerton,1990)解释,经过训练的猿类、洋泾浜使用者和两岁以内的儿童所用话语的结构惊人相似(Bickerton,1995:50)。他提出,这些话语代表了一种句法结构不严谨的表达形式,即只把一些概念串联在一起(其与动物的叫声和语言都有本质不同),并称其为“原始语言”(protolanguage)(Bickerton,1995:50-51)。在某个“神奇的一刻”,人脑的内部结构产生了质的变化,人类语言完成了从“原始语言”到“人类自然语言”的飞跃(付蓓,2013:11)。促使这种飞跃完成的事物,比克顿称之为“句法(Syntax)”。受语言学与神经学和生物学的跨学科结合的影响,《句法的生物学基础及起源》(*Biological Foundations and Origin of Syntax*)(2009)涌现了一批有关句法与生物进化及人脑的论文,其中比克顿写道:“显然,我们目前需要的是:要更加深入了解句法的生物学基础,需要这样一些学者,他们同时在语言学和神经生物学两个领域训练有素,其思路不会过分倾向或依赖于任何一方。”(Bickerton & Szathmáry,2009:13)

比克顿的语言观被称为语言进化的“突变论”,但这并不是对语言进化的唯一解

释。如安奇森(Aitchison)(1996)认为,人类语言发展的进程是迅速发展的阶段和相对停滞的阶段交替进行的:“很有可能在25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开始使用一种简单的语言了。到了10万年前至7.5万年前,语言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复杂期。在这段时间,语言就像燎原之火得到了迅速发展,直到约5万年前才逐渐平缓下来。”(Aitchison,1996:41-42)此话题的探讨至今仍在继续。

1.2.2 比克顿的意识观

比克顿的意识观是建立在他的语言观的基础之上的。人类通过语言,智力得到极大提升,其思维达到了更高的境界。比克顿把人类的思维分成两个层次:第一表现系统(Primary Representational System)和第二表现系统(Secondary Representational System)。前者的思维方式是“线上思维”(on-line thinking),指的是生物对环境刺激的即时反应;后者的思维方式是“线下思维”(off-line thinking),指的是生物在不接受环境刺激时可自主进行的思维活动。比克顿还从人工智能专家马文·敏斯基(Marvin Minsky)(1985:58)提出的有关自我意识的理论中获得了灵感:“把大脑分成两部分,A脑和B脑。把A脑与真实世界的输入与输出连接起来,使它可以感觉到外界的联系。但B脑不与外界联系,只与A脑连接,A脑的内容就是B脑的全部世界。”比克顿对意识的分类,就是以思维和脑的二分法为基础构想出来的。

比克顿将人类意识分为三类:第一意识(C1)、第二意识(C2)和第三意识(C3)。其中第一意识是全部生物皆有的一种意识,其实质是维持体内平衡,延续生物自身的生命。第二意识指生物对其第一意识的感知,它是人类独有的。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意识的产生是由于人脑在具有动物拥有的功能的基础上又创造出了特别的区域,而只有语言才能够开辟这些脑区(Bickerton,1995:130)。比克顿(Bickerton,2014)虽然没有再直接讨论意识的问题,但他表示不能完全肯定动物不具备线下思维。然而他本人仍然倾向于支持动物不具备第二意识,这体现在他对思维的看法上:“人类能够运用抽象概念和逻辑思维解决问题,而人类以外的生物在不能接触到实物的情况下不具备此能力,这意味着线下思维只属于人类。”(Bickerton,2014:79)对于该问题的解决,比克顿提出:“我们需要知道人类以外的生物的大脑中概念和范畴分别是如何被表现出来的,但在此之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猜测。”(Bickerton,2014:79-80)第三意识指用语言表达第二意识。比克顿在提出“第三意识”之后,却开始对“第二意识”和“第三意识”的划分产生疑惑,因为只要具备第二意识,就能对其进行表达。他最后的结论是:“第二意识”和“第三意识”即使在定义上能够区分,它们实质上也是一体的。

纵向地看,比克顿提出的三种意识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深刻地阐释了语言与人类意识的紧密联系:从原始的交流方式到原语言,再到自然语言的产生,使人类意识的复杂程度不断飞跃。然而,无论语言的发展还是人类意识的进步都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两者之间的促进关系不见得在语言诞生后就一直趋于平稳。本文认为,语言发展的另一个标志,即文字的诞生,对人类意识的发展又是一次深远的影响。

2. 文字系统的发明对人类意识发展的推动作用

安奇森根据当时的最新数据,认为语言的诞生“介于 25 万至 5 万年前,平均估算为 10 万年前”(Aitchison, 1996: 35)。根据比克顿(Bickerton, 1995)的观点,语言把思维和智力提高了一个层次,但为什么实际上人类的文明史只有几千年,而非数万年?在这 10 万年的时间内,人类的意识又是如何在语言发展的情况下进一步被推动的呢?本节将论述文字的发明和书写系统的形成如何使人类意识进一步发展,对此可以从人脑研究、信息储存和人类社会发展等方面找到相关的证据。

2.1 文字系统与人脑

人脑是意识产生的身体器官,文字系统对人类意识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只有从神经科学的跨学科角度探索,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答。一旦人类开始使用文字符号记录语言,阅读和写作这两项语言技能就诞生了。未能掌握读写的人会失去非常重要的获取信息的途径,他们在社会中的生存技能、学习能力和知识结构都会大打折扣,个人发展亦将受到很大限制。如今,掌握语言的文字系统是正常的;若在读写方面存在学习障碍,就会被诊断为相应的症状。

根据英国失读症协会(British Dyslexia Association)的定义,失读症(alexia)的含义包括如下数个方面:一种特定的学习障碍;主要影响阅读与拼写能力;处理词汇的语音有困难;词汇方面的短时记忆欠缺;在口语和笔语的使用中皆可体现;与遗传基因有联系(Reid, 2011: 5-6)。失写症(agraphia)专指书写能力丧失或学习困难,一般由脑部损害引起(Richard & Schmidt, 2010: 28),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被确认为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病症(Houdé, et. al., 2004: 442)。鞠躬(2004: 523-524)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描述了失读症和失写症的神经机制:

失读症多伴有其他的失语,病损部位包括枕叶(特别是优势半球的枕区)、颞顶叶交界区(特别是角回)、优势半球的额叶(特别是额下回 Broca 区附近),这些部位损害都可以引起失读症。失写症较为复杂,它不仅涉及大脑的语言机制本身,也涉及其他高级神经心理机制,如视觉、听觉、动觉、空间结构等方面。失写症可以由优势半球的额中回后部、左顶叶上部、大脑外侧裂周围区、尾状核和内囊等部位的损害引起。

根据比克顿的意识观,对于文盲或失读症、失写症患者,他们同样具有第二意识和第三意识。然而,拥有高层次意识并不意味着其程度没有差别。为意识的程度划分“级别”目前很困难,因为我们对读写能力如何影响脑结构的了解有限。根据韩济

生(2009:944)对近年来神经科学发展的综述,阅读能力的发展也会影响大脑功能以及结构的发展:与文盲相比,识字者在视觉空间任务中的表现更好,他们在扣带回后部连接双侧顶叶的部分显著比文盲宽。另外,阅读能力包括对文字的识别和理解,该过程与大脑中的词汇和亚词汇通路紧密相关,其中梭状回负责字形整体的识别,颞顶联合区负责词汇水平的阅读加工,额下回激活反映了阅读加工的自动化程度(韩济生,2009:954-956)。书写能力与脑功能的关联更为复杂,但至少可推测其与阅读能力涉及到的脑区有紧密联系,因为阅读出现问题很容易同时导致书写方面的障碍:大多数情况下,一位患有某种失读症的患者也会患有同一种类的失写症,这两种失语症极少单独发生(Ahlsén,2006:115)。总之,当今人脑研究的发展为文字系统对意识的影响带来了很多证据,相信随着语言学与神经科学的跨学科合作,此话题将不断继续深入。

2.2 文字系统与信息储存

语言文字系统的应用使人类对信息的处理和储存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使人类的思想和知识积累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文字的历史比起口语的历史短得多。公元前3500年以前,西亚的两河流域(现在的伊拉克)的苏美尔人(Sumer)创造了最早的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字。起初主要是象形符号,后来以软泥版为纸,以小枝干为笔,“压刻”成一头粗、一头细的笔画,称为“钉头字”(周有光,1997:5)。东亚产生文字比西亚和北非晚2000年,公元前1300年以前,中国黄河流域的殷商帝国创造了“甲骨文”,这是汉字的祖先(周有光,1997:6)。文字系统发明后,人类探索世界的知识开始逐渐积累,信息得以被长时间储存。在知识方面,后人在解决新问题时可以借助前贤的成就,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

瓦切克(Vachek,2014:25)驳斥了语言学研究重口语轻书面语的观点,提出书面语具有独特的功能:“口语的任务是为在语言自身之外的现实环境中的迅速而便捷的交流提供途径,而书面语在亦可达到同样目的的基础上,还能把信息保存下来,以便未来的查阅。”瓦切克(Vachek,2014)还列举了几种仅有书面语才能实现的“高级”实际需要,如文学、学术研究、商业管理等。在文字系统正式诞生前,口语交流使信息转瞬即逝,仅能被记忆所储存。但记忆会遗忘或扭曲,导致大量信息失真、流失,人类的经验和知识很大程度上不能够积累起来,故此文字发明前人类文明进步速度较为缓慢。

我们还可以从智力的角度看待文字系统通过信息储存对人类意识的影响。根据卡特尔(Cattell,1987)的二元智力观,人的智力可以分为晶体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和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晶体智力包括词汇及语义知识以及通过社会文化而习得的概念;流体智力包含心理反应速度、抽象及概括思维、推论和多任务处理等方面的能力(Houdé, et. al., 2004:19)。文字系统的发明和使用,对流体智

力的影响尚无定论,而晶体智力却大有飞跃。前一代人的新发现可以成为后一代人的知识,他们以此为基础利用自己的流体智力将进一步扩展知识。如今的学术研究就是在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若没有文字系统根本无法实现。

几万年前的人也许能够用口语交流打猎经验,传授工具的制造,讲述“神话”故事,但没人能够记录日月食的真正成因、气候及环境的变化状况;这就是文字系统的力量。总之,文字系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意识,这与仅有口头交流的原始社会相比,人们思维有了深度与广度的飞跃。

2.3 文字系统与社会发展

文字系统对人类意识发展的促进作用,宏观上能够通过社会发展的进程体现。若判定人类语言诞生的时间为10万年前,最早人类文字正式诞生是在约5500年前,那么后者恰好是文明社会诞生的时间。换言之,语言诞生之初并未直接大幅度促进社会发展,迄今为止大约95%的时光人类都处于原始社会,但最后这5%的时间里,由于文字系统的诞生,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时间就发生了空前的重大变革。苏联语言学家易思青(V. A. Istrin, 1966: 15)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看清了这个事实:

文字,以及以后在它的基础上产生的印刷术,所实现的这些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在某一个地方发生的巨大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现象,以后都变成人类的财产从而把人类结合成一个整体……所有后代的人都能掌握前代人所取得的全部知识宝藏,更加向前推进社会的发展。

文字为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科技使21世纪的社会步入电子信息时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普及,人们可以更加高效地获取、储存、分析来自全球的大量数据。迈尔-舍恩伯格和库克耶(Mayer-Schönberger & Cukier, 2013: 9)把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年代称为“大数据(big data)”时代:“大数据指的是我们能够利用大规模数据完成,而小规模的数据却无能为力的任务,这有助于形成新洞见及前所未有的价值观,市场、机构、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将为此改变。”刘润清(2014: 4)描述了大数据时代外语教育科研的前景:“如今,我们掌握的数据库越来越全面,它不再只包括一点点可怜的数据,而是包括与研究问题相关的大量甚至是全部数据。我们不再需要担心某一小部分数据对整套分析产生不利影响。”当代大数据的发展通过更便捷的信息交流途径和更迅速的信息传输速度,正在为人类意识的广度、深度和个体之间的连结程度和方式实现一次新的飞跃。信息时代的数据归根结底还是以文字为基础。

2.4 语言与意识之关系新解

根据比克顿(Bickerton, 1995)的语言观和意识观以及本文所论述的文字系统对

人类意识的影响,我们可以把语言和意识的关系置于生物进化的视野中进行纵向比较,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生命诞生即有意识。更高级的意识,即使可以萌生于语言诞生之前,其程度也非常微弱;经过语言,人类的思维和智力得以进一步开发,产生了和当今程度接近的高级意识。数千年前发明的文字系统对第二意识和第三意识进行了全面的强化,使人类从原始社会迈进文明社会。

表 1 生物交流方式的演变与意识的进步

交流方式	意识复杂程度	最早出现时间	物种举例	备注
身体运动、释放物质等	第一意识	数十亿年前生物诞生	细菌、无脊椎动物	
肢体动作、不同的叫声、原始语言	第一意识,微弱的第二意识和第三意识	远古时期	猩猩、大象、某些鸟类、早期人类	某些动物,如黑猩猩,经过训练可习得原始语言
语言(口语)	第一意识、第二意识和第三意识	10 万年前	人类(原始社会)	第二意识和第三意识的潜能尚未激发
语言(口语 + 文字系统)	第一意识、强化的第二意识和第三意识	5500 年前	人类(文明社会)	第二意识和第三意识的潜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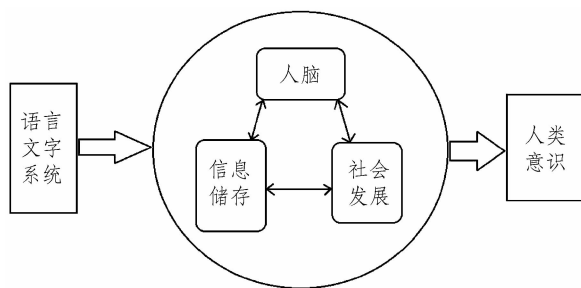


图 1 语言文字系统对人类意识的影响

如图 1 所示,本文认为语言文字系统可以通过三个方面对人类意识产生影响,分别为:人脑的读写功能、信息储存的途径和方式以及社会的发展,这三个方面彼此亦相互支持。意识是一个抽象概念,反映了我们在某些方面对事物的认识,文字系统对意识的影响无法直接观察,但是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可以反映出文字系统对人类意识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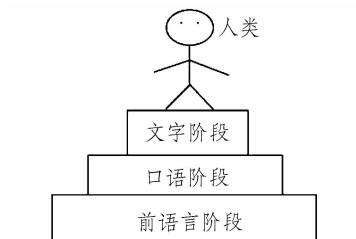


图2 人类意识的进步

图2反映了人类意识的进步经过的几个阶段。根据比克顿的语言观和意识观,人类意识可以根据语言的诞生分为“前语言阶段”和“语言阶段”。而“语言阶段”实际上还能以文字的诞生分为“口语阶段”和“文字阶段”。人类意识处于“文字阶段”,并不意味着文字取代了口语或成为绝对主导的交流方式,而是反映了在相应历史时期,文字是影响意识发展的主要因素。

3. 结语

本文回顾了著名语言学家关于语言与意识的研究,并在比克顿的语言观与意识观的基础上,论述了文字系统在人脑研究、信息储存和人类社会等方面对人类意识的促进作用,提出了对语言与意识关系的新解读。然而必须指出,对于语言进化、语言与思维、智力、人脑乃至意识等具有跨学科性质的语言学研究因研究条件所限制,目前只能处于初级阶段。正如郝叟等人(Hauser, et. al., 2014: 1)对有关语言进化文献的四点评述:第一,对动物的研究几乎没有为研究人类语言交流提供参照,未能揭示内在生物机能;第二,化石和考古学证据未能促进我们对早期祖先语言计算和表征的理解,起源与进化的细节无从分辨;第三,我们对语言基因知之甚少,对近期将基因与语言进程联系起来几乎不抱希望;第四,所有建模的尝试得出的假设都缺乏依据,更没有经过实证检验,因为无法证实任何有关语言起源的洞见。由于各相关领域发展的局限,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也无法超越理论和假设。期待着未来的研究能够在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跨学科的角度对语言与意识的发展进行更有创见性的研究。

本文承蒙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刘润清教授悉心指导,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 [1] Ahlsén, E. *Introduction to Neurolinguistic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 [2] Aitchison, J. *The Seeds of Speech: Language Origin and Evolution*[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3] Bickerton, D. *Language and Species*[M].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4] Bickerton, D. *Language and Human Behavior* [M].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 [5] Bickerton, D & E. Szathmáry. *Biological Foundations and Origin of Syntax*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9.
- [6] Bickerton, D. *More than Nature Needs: Language, Mind and Evolution* [M].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7] Cattell, R. *Intelligence: Its Structure, Growth, and Action* [M].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987.
- [8] Chomsky, N.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M]. Santa Barbara: Praeger Publishers, 1986.
- [9] Evans, V. & M. Gree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0] Hauser, M. D., et al.. *The Mystery of Language Evolution*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4, 5: 1 – 12.
- [11] Houdé, O., et al. (eds.). *Dictionary of Cognitive Sciences: Neuroscience, Psych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M].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4.
- [12] Mayer-Schönberger, V. & K. Cukier.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M].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 [13] Minsky, M. *The Society of Mind*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5.
- [14] Reid, G. *Dyslexia* (3rd ed.) [M].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 [15] Pearsall, J. (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6] Shaumyan, S. *A Semiotic Theory of Language*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7] Stevenson, A. (ed.). *New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 (3rd ed.) [M]. Angus Stevenson, Christine A. Lindber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8] Vachek, J. The Primacy of Writing? [G] // Christopher Moseley (ed.). *Writing System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 IV).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19] Vygotsky, L. *Thought and Language* [M]. Alex Kozulin tran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6.
- [20] 成晓光(编). 西方语言哲学教程 [M].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21] 范晓. 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及其相关问题 [J]. *语言科学*, 2003, 2(6): 73 – 85.
- [22] 付蓓. 解构毕克顿的语言进化突变论 [J]. *英语研究*, 2013, 11(4): 10 – 14.
- [23] 韩济生. 神经科学(第三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
- [24] 鞠躬. 神经生物学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
- [25] 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修订版)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 [26] 刘润清. 大数据时代的外语教育科研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4 (7): 1 – 6.
- [27] 易思青. 文字的发展 [M]. 杜松寿, 译校.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66.
- [28] 周有光. 世界文字发展史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路小明

再谈译者行为批评的战略性的

周领顺¹ 赵国月²

(1. 扬州大学 翻译行为研究中心, 江苏 扬州 225127;

2. 长江师范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科研部, 重庆 涪陵 408000)

摘 要:译者行为批评自成体系,具有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科学的运转机理,它继承了中国传统译学的精华,也融合了国际译学的研究成果,所表现出的人文性、科学性、原创性、完整性、继承性等,反映了构建者较强的学科意识。译者行为批评的确立,为反思译入历史、深化译出认识以及“中国学派”翻译理论的构建,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战略意义。

关键词:译者行为批评;中国学派;战略性

Further Discussions on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ZHOU Lingshun ZHAO Guoyue

Abstract: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as a systematic theory, has its unique consciousness to find problems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 studies. As well, it has sets of scientific operational principles. It doesn't only inherit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but also merg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broad. From its framework, we can find founder's disciplinary episteme, which was embodied as the discipline's evident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ity, scientificity, originality, integrity and continuity, etc.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is rather beneficial to reflect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to and out of China and the maturity of "Chinese school".

Key words: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Chinese school; strategic significance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批评研究”(15AYY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领顺,男,扬州大学翻译行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语言对比与翻译批评研究。

赵国月,男,长江师范学院讲师,扬州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语言对比与翻译、翻译批评及文学翻译研究。

0. 引言

我们曾以《译者行为批评的战略性的文章》为题,从“问题意识”、“运转机理”、“译学传承”和“国际视野”等几个方面,阐述了译者行为批评的战略性的文章问题(周领顺、赵国月,2015: 9-14)。

译者行为批评(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是继“变译理论”和“生态翻译学”之后,由中国本土学者提出的且较成体系的原创性理论(杨荣广、黄忠廉,2016: 18-23;陶李春、许钧,2016: 78-82),它在“国内独树一帜”(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2015),反映了我国学者理论创新的成果。译者行为批评注意到翻译批评发展到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如“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的关系”问题、“译者的身份和角色变化是怎样影响译者的译内和译外行为”的问题等(赵国月,2015: 109-111)。译者行为批评以译者的意志及其在行为上的表现为基点,以一个独立循环的概念系统而运作的。译者行为批评借鉴语言学知识,又融合社会学理论,以具有主观意志的人——译者,作为研究对象,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层次,探索译者与译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探讨译本生成过程中的译者行为特征,该探索过程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翻译这一特殊的跨文化交际现象。译者行为批评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译论的同时,又放眼国际,它汲取了西方翻译理论的精华,使中西译论得到了较好汇通;“它完善了翻译者的自身人格,又融通了文化,锤炼了翻译艺术,为我国翻译理论的创新发展的文章,发挥了一定的引领作用”(高天枢,2016: 83-85)。

译者行为批评的构建前期以系列专题论文逐渐起步,中期系统化以译者行为批判为专题的两本专著《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周领顺,2014a)和《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周领顺,2014b)的出版为标志。目前,学界的反应对译者行为批评的完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杨宁伟,2016;张虹、段彦艳,2016;唐蕾,2016;戴文静,2017等)未来译者行为批评,将以具体的实践应用为依托进行理论深化。理论引领实践,但又滞后于事实,惟有对事实的不断挖掘和提炼,才能使某一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译者行为批评也不例外,它需要学界不断地批评和提升。本文集中汇总了学界的有关反响,并以构建者的名义,具体从翻译批评的“三阶段”划分、“视角创新”和“现实意义”、“中国学派”翻译理论的构建等几个方面再作分析。

1. 译者行为批评对翻译批评发展的“三阶段”划分

由于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成熟，翻译研究开始从“经验阐述”向“理论分析”过渡，直至近二三十年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又进一步融合了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展开阐释。作为翻译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翻译批评的发展也经历了语文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三大时期（王宏印，2006）。三大批判范式各有各的侧重点：语文学批评侧重于语言文字层面的对错和译文的好坏判断；结构主义批评将现代语言学纳入翻译批评中，要么用语言学理论分析原文本与译本的对等关系，要么借助翻译文本来研究语言学本身的问题；后期的解构主义批评将目光聚焦于文化与交流，从传统的语言文字层面和文本层面转向更大的文化层面。正因为解构主义使翻译批评研究从文字层面向文化层面的转向，翻译批评发展才具有了显著的阶段性意义。我们从上述三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可以归纳出，借助语言科学知识是结构主义批评的主要特色，但其不足是仍停留在语言文字层面，此时的译者是处于隐身状态。相反，解构主义批评又脱离了语言文字层面，而是重点关注文化与交流，将译本的批评视角扩展到了翻译外的社会层面，此时的译者是处于显身状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解构主义批评虽然转向了文化和社会层面，但又完全脱离了语言和文本层面，只专注于社会因素，忽略了对翻译本质的探讨以及对于译者身份和角色的区别。这样做导致的结果便是顾此失彼，未从“翻译外”回归到“翻译内”，即回归到翻译的本源，也就未能从译者的语言内和语言外行为对译文质量进行双向评价。

译者行为批评重新审视翻译批评研究的发展，根据批评的整体特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翻译批评的出发点是文本批评视域，对翻译内的语言和文本层面进行纠错式批评，具体时间在“文化转向”前，也即王宏印所言的语文学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两个阶段；第二期，翻译批评从文化批评视域切入，对翻译外的社会性因素重点考察，具体时间是在“文化转向”后，也就是所谓的解构主义批评；第三期的翻译批评同时关注翻译内和翻译外的各个要素，切入视角是行为批评，时间就在当下。[Shih（露丝·蒔），2015：87-94；赵国月，2015：109-111]在第三期，译者行为批评吸纳前两阶段的研究成果，去伪存真，以动态的视角，从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切入考察译者和译文质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翻译批评既避免了结构主义批评语言文字层面的静态单一，也避免了解构主义批评的泛文化倾向，做到了动静合一，以尽量确保翻译批评的客观和公正。

译者行为批评对翻译批评发展的三阶段划分，并不意味着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否

定或抛弃。相反,它是融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翻译批评发展的重新审视,这样有利于理论界更加清楚地认识翻译批评乃至翻译理论的发展现状和态势。

2. 审视翻译批评发展的新视角:行为批评视域

自语言学和文化学前后介入翻译研究后,翻译批评要么从一个角度出发,如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翻译策略、美学、读者反应等,要么融合这几个要素进行综合分析。无论如何,这种批评模式不可避免地会把动态的翻译活动等同于静态的译本,最终将翻译行为看作一个恒定的过程,局限于语言内和文本内看问题,从而忽略了译者主导的翻译行为作为社会活动的动态多元性以及译者的存在。皮姆(刘云虹,2013:83-88)认为,以内容作为原则的人总是将译者预设为属于某一种文化,这就完全忽略了翻译活动的特殊性,忽略了翻译行为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涉及的是多种文化,他始终居于一个跨文化空间、一个文化的交汇点。

基于此,译者行为批评提出,翻译批评要基于静态文本的“求真度”和基于动态社会的“务实度”相互作用的“合理度”,追求译文对原文的求真度兼译文对社会的务实度,唯有如此,才能对翻译质量做出全面的评价(周领顺,2014a:36)。依据译者行为批评的观点,行为批评视域属于语境研究,关注语言外的因素,同时又不忽视语言内的因素,对译者来说,就是着眼于译者行为的合理度,在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层次对译文质量所做的动态评价。总而言之,动态的行为批评视域融合了静态的文本批评视域,二者相辅相成。比如,译者行为批评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求真一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它是对一元思维模式的突破,在批评实践中不会非此即彼地看问题,真正解决了翻译批评理论与翻译批评实践相脱离的问题;其次,顺应翻译现象的多元发展态势,能对几乎所有的文本类型和所有层次的翻译进行描述和分析;另外,它既可以有效避免传统翻译批评模式过度的规约性成分,摆脱完全依赖原文为衡量标准的做法,又可以避免传统翻译批评模式的过度描述性成分,以免翻译批评流于泛文化批评,流于形式(赵国月,2015:109-111)。“求真”与“务实”之间是辩证统一的逻辑关系,“求真”是译者针对原文而言,而“务实”是译者针对社会效果而言。在“求真一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的引导下,译者或译评者必须遵循“求真为本、求真兼顾务实;务实为用(上)、务实兼顾求真”的译者行为特征。即便是遇到“务实高于求真”的情况,译者或译评者也不能不顾对原文的求真要求,否则产生的译文就走向了“非译”。总而言之,译者行为批评是翻译批评学的进一步细化和拓展,具有统筹人文,兼顾科学;独具原创,

自成体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求真为本，务实为用等特点。

另外，人文主义学科偏重人的研究，主要考察主体、人生、主观、个体存在、自由意志、价值、直觉、体验、情感等几个与人紧密相关的要素，而科学主义则侧重物的研究，主要针对客体事物、自然、客观、知识、逻辑、实证、普遍规律、因果决定等因素展开研究。译者行为批评聚焦于译者——翻译的主体，但又未忽略原文和译文——翻译的客体，有机地结合“文本视域”和“行为视域”，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并重的翻译批评方法论。译者行为批评在构建论述中，就是通过文学文体和应用型文体翻译实践案例的描写性评价，来检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合理性，即译者意志性与译者身份和角色作用于“译者行为”，并进而影响翻译质量的相互关系。

综合来看，译者行为批评走的是一条基于社会学的翻译批评新途径，它既能丰富翻译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又能打破传统的翻译和译者规约性定义，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描写“翻译”和“译者”，奠定了进一步展开翻译批评理论研究的坚实基础。在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体系中，译者的意志性、翻译的社会性和译文生存空间的复杂性得到高度关注，它提倡对译文的批评“不以主观代客观、不以创作代翻译、不以残缺掩全面”（黄勤、刘红华，2015：125-128）等。总之，从行为批评视域出发的译者行为批评，做到了“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有机结合的真正翻译批评”（刘云虹，2009：62-65）。

3. 译者行为批评的现实关照

任何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是基于一定的现实基础，否则都是站不住脚的。理论源于实践，最终还要回归实践。对翻译实践的正确引导、翻译现象的合理辨析、翻译作品的客观评介以及翻译人才队伍的科学培养，都离不开翻译批评。由此可见，对翻译批评研究深化、推动翻译批评实践，不只是学科建设的内在需求，也是指引翻译活动，然后促使翻译的价值得到彰显的必然诉求（刘云虹，2015：65-70）。但是，如何改变翻译批评长期以来“失语”和“缺场”的状态，需要理论研究者，尤其是翻译批评者不但要理性地反思历史，更要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无论是对历史的反思，还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高度的理论眼光和科学的批判范式是深入洞察翻译活动的前提条件。从这个层面来看，针对翻译批评研究与实践中的现实状况、未来发展乃至历久弥新的根本问题，译者行为批评的确立都凸显出了重要的现实价值。

我国对外国作品的译介从佛经翻译开始，可以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积

累,翻译活动取得了杰出的成果,翻译作为重要的推动力,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相应地,翻译学界对译入历史的关注与研究也取得了较好的成就。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在翻译作品的评介、翻译质量的监督和翻译现象的分析等方方面面还缺乏深刻而富有理性的深思,尤其是对翻译史和翻译批评史上存在争议,需进一步加以澄清的问题,应立足于翻译活动的本质,以历史的目光,通过对有代表性的翻译与批评个案的重新审视,力求从历史发展的维度不断揭示并把握译入翻译的内涵与贡献,进而真正发挥翻译批评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建构力量。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译者行为批评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行之道。我们可以借助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途径,从历史的视角和用发展的眼光综合考察翻译内和翻译外影响与制约译者选择的各种因素,以此揭示翻译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同时从多重维度对翻译行为及其结果进行整体性的、尽可能公允的分析与评判,使翻译批评不再扮演审判官的角色。由此可见,在针对外译中的批评中,译者行为批评可发挥较为积极的理论价值和分析作用。

另外,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尤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受到各方的普遍关注。对此,译者行为批评也可以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和学术意义。刘云虹(2015: 65-70)指出,一方面,围绕翻译的重要性、翻译与创作的关系以及翻译对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影响和作用等问题,各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另一方面,针对翻译观念、翻译策略与方法、译介模式和翻译主体等涉及翻译的根本性问题,各界在关注的同时产生了种种疑问和质疑,甚至对中国文学如何能更好地“走出去”表示出或多或少的怀疑与担忧,翻译的合法性与价值也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拷问。译者行为批评作为翻译批评新的理论模式与途径,正是将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作为考察核心,将翻译主要主体译者的意志行为与译者的能动性选择作为切入点,综合分析翻译内和翻译外的各种复杂因素,通过同时对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的双向评价,在翻译、接受与文化传播的各个环节与层面进行多维度的整体观照,对译出翻译中的译者行为、译介模式、翻译方法、译内和译外效果等进行系统性的思考与批评,依此可以解决对外翻译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者提供一定的理论思考。由此看出,借助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翻译学界可以对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中国文学译出翻译有更深入的认识,对译出翻译的整个过程和诸多要素以及其中凸显出的一些问题和倾向进行系统、全面的检视与批评。(刘云虹, 2015: 65-70)

理论的核心本质就是对事物普遍规律的把握和对特殊现象的预测,理论的提炼基于现实,更要致力于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译者行为批评的创建秉承这一理念,将

理论框架深深扎根于翻译实践，通过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阐述，凸显了其理论强烈的现实关照。

4. 余说

沈壮海（2017）认为，学术话语体系是学术研究活动所形成的重要成果，是学术研究质量、风格、实力的具体体现；这种成果产生影响之后，也便深深渗入学术活动之中，影响着学术领域的再生产，成为知识与价值传播传递中的重要内容，在更广的范围影响着社会主体即人的塑造。他指出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意义之重诸多层面：首先，学术话语的发展革新是学术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其次，学术话语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第三，学术话语塑造着学人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文化新观察和新建设；第四，学术话语还关系到文化的理解、文明的互鉴；第五，学术话语也与文化安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学派”的提出由来已久，最开始是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提出的，80年代大陆学者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学派”的看法，但依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学派”的发展并不如人意。目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许多理论仍有套用西方理论的倾向，且不管成熟与否，适用性如何。在这方面，翻译研究领域表现尤为更甚，最明显的体现便是对于术语的挪用。国际上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多数是建立在印欧语互译基础上的，即使有非印欧语的加入，也带有浓厚的印欧语色彩（潘文国，2013：21-24）。周领顺指出，“中国学者要积极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对话，进入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进而在某些领域引导国际学术的发展走向，就必须怀抱强烈的学派意识”（王广禄、吴锡平，2015）。我们应当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重要原因之一也正在于中国人思考中国问题、分析世界大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能简单被他者塑造而失却自己的主体性，不能陷入“跟着说”的迷局而失却了表达自我、提出新见的意识和能力（沈壮海，2017）。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与它逐渐摆脱学徒状态并取得自律性是步调一致的。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除非能够在特有的转折点上从其依傍性的学徒状态中解放出来，并坚定地获得自我主张，否则根本谈不上名副其实的“中国学派”。使“中国学派”真正成为可能的关键，是当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得以从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中历史性地摆脱出来，并获得自我主张，而实现这种自我主张的可能性，又要求我们的学术立场从“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中解放出来，要求使外来的思想、理论和学术大规模地中国化，要求我们的学术实践全面地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和考验（吴晓明，2016）。

译者行为批评是中国本土学者依据中国本土实践构建地成体系的理论,它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译学,有选择地融合西方翻译理论,真正将中、西译学批评意义上的“译者行为”概念吸纳进理论体系,把“译者行为”研究系统化,聚焦于该专题的深度研究,使其在翻译批评学科内体现出应有的作用和价值,最终从宏观角度冠以“译者行为批评”之名,使该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标记性。同时,将提炼出的译者行为评价理论框架,用于批评翻译实践的可操作性较强,适合评价分析外-汉、汉-外等翻译现象。另外,它所使用的术语体系基本都是基于中国实际,体现了较强的本土话语特色,用本土的术语描述中国的实际彰显了较强的解释力和描述功能。概而言之,译者行为批评将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译论相融合,获得了翻译理论中国话语的自我主张,呈现为“足够的学派意识,自成一格”(许钧,2014:112),这对于“中国学派”的系统构建,无疑是具有战略性的。

参考文献:

- [1] 戴文静. 中国文论英译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以《文心雕龙》的翻译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1):28-34.
- [2] 高天枢. 基于创新与回归视角的翻译批评研究——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J]. 出版广角, 2016(6):83-85.
- [3] 黄勤,刘红华.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开山之作——《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与《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评介[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3):125-128.
- [4]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卷首语[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1):1.
- [5] 刘云虹. 论翻译批评精神的独立[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9):62-65.
- [6] 刘云虹. 翻译价值观与翻译批评伦理途径的建构——贝尔曼、韦努蒂、皮姆翻译伦理思想辨析[J]. 中国外语, 2013(5):83-88.
- [7] 刘云虹. 译者行为与翻译批评研究——《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评析[J]. 中国翻译, 2015(5):65-70.
- [8] 露丝·蒔. 翻译批评领域新的里程碑——《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与《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评介[J]. 翻译论坛, 2015(4):87-94.
- [9] 潘文国. 构建中国学派翻译理论:是否必要? 有无可能? [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4):21-24.
- [10] 沈壮海. 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理与路[N]. 光明日报, 2017-01-06(11).
- [11] 唐蕾. 华裔获得译作家身份建构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以李翊云《逃避之道》汉译为例[J]. 当代外语研究, 2016(5):86-89,93.
- [12] 陶李春,许钧. 关于翻译研究的思路与重点途径——许钧教授访谈录[J]. 中国翻译, 2016

(3):78-82.

- [13] 王宏印. 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14] 王广禄, 吴锡平. 在翻译中讲好中国故事——记扬州大学翻译行为研究中心教授周领顺[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08-19:(2).
- [15] 吴晓明. “中国学派”如何真正成为现实?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03-17:(1).
- [16] 许钧. 矻矻经年自成一格——《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与《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序[J]. 山东外语教学, 2014(1):112.
- [17] 杨宁伟. 基于视听文本的译者行为批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138-139, 143.
- [18] 杨荣广, 黄忠廉. 应用翻译研究:进步与前瞻[J]. 上海翻译, 2016(2):18-23.
- [19] 张虹, 段彦艳. 译者行为批评与《孝经》两译本中评价意义的改变[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4):151-158.
- [20] 赵国月. 翻译批评研究:开拓创新、回归本体——评周领顺新著《译者行为批评:框架》暨《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J]. 外语研究, 2015(1):109-111.
- [21] 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a.
- [22] 周领顺. 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b.
- [23] 周领顺, 赵国月. 译者行为批评的战略性[J]. 上海翻译, 2015(04):9-14.

责任编辑:陈 宁

人类学视阈下的民族志与翻译研究

龙吉星

(贵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人类学视阈下的翻译研究不断受到学界的重视。本文关注人类学的核心研究方法及书写方式民族志,通过分析翻译对民族志写作的影响以及人类学家对民族志翻译问题的反思来研究民族志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人类学;民族志;翻译研究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f Ethnograph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LONG Jixing

Abstract: As one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domai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f study is increasingly valued. With regard to the situ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in ethnography and aims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ograph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anthropology; ethnography; translation studies

0. 引言

人类学与翻译研究虽然隶属于不同的学科,但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作为近现代兴起的学科,人类学与翻译研究都强调研究的跨学科性。在研究对象上,双方都关注他者,尤其是他者的文化;在研究目的上,二者都试图通过研究他者来反思自我;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都吸收和借鉴了多学科的理论,而这样的吸收和借鉴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应用文化的比较之上。有鉴于此,翻译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跨学科互动亦不可避免。本文以人类学的核心研究方法及书写方式民族志中的翻译研究为切入点,从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苗疆腹地基督教典籍英译苗研究”(16CYY012)和2016年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当代中西翻译学的转向研究”(2016SSD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龙吉星,女,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导,主要从事翻译文化与诗学研究。

翻译对民族志写作的影响以及人类学家对翻译问题的反思两方面来分析民族志写作同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以期对翻译的跨学科研究探索新的视角与方法。

1. 人类学视阈下的翻译研究现状

根据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统计,从 1986 到 2015 年间国际核心期刊共收录了以“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y”(翻译研究和人类学)为主题且属于人类学或语言学的文章共 67 篇,其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依次为:Borgatti & Li(2009)、Barker(2006)、Bradby(2002)和 Basu & Simon(2008)。

文化人类学与翻译相结合的研究兴起于 21 世纪,每年都会有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献出版,其引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西方翻译界,一些学者把民族志深描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深译(thick translation)的翻译方法,如 Appiah(2000);一些学者对深译做了研究,如 Hermans(2003)、Cheung(2006)、Cheung(2007)等;一些学者则关注人类学的文化理论同翻译研究的结合,如 Nida(1954)、Huang(2002)、Maranhão & Streck(2003)、Rubel & Rosman(2003)、Sturge(2007)等。总体而言,学界已经关注人类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但研究成果还不多,学者们主要关注翻译与民族志的关系。国内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对深译的研究,如段峰(2006)、孙宁宁(2010)、王雪明、扬子(2012)等。

2. 翻译对民族志写作的影响

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民族志是一种描述群体或文化的艺术与科学”(Fetterman,1998:1),人类学家通常以民族志的形式记录所研究的社会。尽管当代出现了以本地区本民族为研究对象的都市人类学、乡土人类学等,人类学的研究仍以异民族及其语言文化为主,这点与翻译研究很相似。“所有的翻译都只是与各种语言的陌生性达成妥协的一种权宜之计”(Benjamin,1969:75)。民族志同翻译一样,“也属于各个文化和社会的语言达成妥协的一种权宜之计”(Crapanzano,1986:51)。既然是对异文化的研究,民族志的撰写离不开翻译。无论是前人类学时期的民族文化描写,还是后来的比较科学的民族志研究,翻译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1 翻译与民族志资料的搜集

人类学的前学科时代可以说很漫长,在现代交通便利之前,早期探险者和传教士等对异民族的奇风异俗和神话传说的记述形成了人类学前学科时代的记述文本。这种以记述为乐而缺少方法论反思的文本,对文化意义的猜测和曲解自然不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语言翻译的问题。对于这些最早进入土著部落的探险家和商人以及传教士们来说,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与土著人进行交流。刚开始时,他们简单比划或使用手语进行交谈。随着他们不断融入当地社会,与土著居民的交流日益增多,原先的

手语逐渐被混合语或洋泾浜所取代。那些最先掌握混合语或洋泾浜的人便做起了翻译,外来者通过他们与土著人进行交流。早期进入土著部落的外来者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书信、日记及文稿中,为后人研究土著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们的描写勾勒出了外来者对于土著人和土著社会的最初印象。这些有关异域风俗的早期资料影响巨大。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把中国描写成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后来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期传教士所作的传教报告、绘制的地图以及编撰的简易词典等,为后来者了解当地社会文化,学习土著语言提供了珍贵的资源。

20 世纪以后,人类学家开始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大约在 20 世纪初期,人类学家开始意识到,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必须像其他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对象那样来研究自己的对象——即要系统地进行观察。为了更准确地对文化进行描述,他们便开始同所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他们观察,甚至参与那些社会的某些重要事务,并向土著居民询问他们的习俗。换句话说,人类学家开始了田野工作。”(卡罗兰·恩伯、梅尔文·恩伯著,杜彬彬译,1998:97-98)田野调查要求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较长一段时间亲身体验当地的社会文化,并通过访谈报道人和对一些重要仪式的参与和观察获取第一手的资料。“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家获取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是民族志构架的源泉。”(庄孔韶,2003:247)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主要受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的影响。他的田野工作方法,强调用土著语言进行长期的、高密度的参与观察。马林诺夫斯基曾两次深入新几内亚的特洛布里恩群岛从事田野工作,1922 年,他的成名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问世。后来的人类学家几乎沿用他的田野民族志的方法,例如:米德(Margaret Mead)的成名作《萨摩亚人的青春期》(1928)基于对美国印第安部落萨摩亚的年轻姑娘所做的田野调查;杜蒙(Louis Domont)39 岁时到印度开始田野工作,其博士论文《南印度的一个次级种姓》(1952)成为有史以来有关印度最为详尽和清晰的民族志;格拉克曼(Max Gluckman)的《部落社会的政治、法律与仪式》(1965)基于对中非和南非的一些部落的田野调查等。尽管人类学家主动学习当地的语言,直接同当地居民进行交流,亲身体验当地的文化生活,并试图用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田野调查仍旧离不开翻译,只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译者为人类学家自己。有的时候仍须借助当地人的翻译,比如,人类学家在实地考察搜集到文物或文献时,需要依靠当地人对其图案及文字进行翻译;在访谈报道人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人类学家不了解的词汇和概念,这就需要报道人的翻译和解释等等。现在的人类学学生做调查仍然需要借助翻译。即使在当地生活三年五载,当地文化中的一些隐僻的方面也还是不能被完全洞悉,比如隐喻、默会知识等。

可见,无论是早期的游记、商业信函、殖民地政府公文、传教士传教工作报告,还

是后来的记实、田野调查报告等,无一能离得开翻译。可以说一部人类学民族志的历史就是一部翻译的历史。

2.2 翻译与民族志的可信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文化呈现多元化。这一时期,法国的哲学家、文学批评家以及他们在北美的追随者发展了一种后现代的世界观。他们批评欧美中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后现代主义对人类学的斗争首先指向了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不正当关系,紧接着矛头直指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手段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他们反对人类学家对田野民族志权威的假设,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翻译对民族志的影响。早期人类学的资料收集和当代科学民族志研究都受到了批判。

在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人类学田野调查传统以前,“人类学家如泰勒(Edward Tylor)、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以及巴霍芬(Johann Bachofen)等都是坐在办公室或家里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他们通过阅读和分析早期的游记、商业信函、殖民地政府公文以及传教士传教工作报告等来提出自己的理论”(Rubel & Rosman, 2003: 2)。早期的人类学家只关注材料的内容,对于材料来源不太关心,更不会去考虑材料的真实可信性,因此他们创立的理论备受争议。由于这些材料多为作者依赖说洋泾浜英语的译者与土著进行交流后完成,材料的可信度值得质疑。首先,译者语言能力如何,在翻译过程中能准确传达双方的意思吗?其次,译者有没有完整传达双方的意思,在翻译过程中有没有省略或忽略了一些信息?再次,译者的翻译是否忠实原文,在翻译过程中有没有想当然地把一些当地概念做了转译?除此之外,这些材料是基于真实的场景观察还是作者主观臆断出来的也无法考证。

当代科学民族志也没有逃脱后现代的批评。从后现代的角度看,尽管人类学家亲临现场研究文化对象,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的形式,采用了做笔记、录音、照相等方式获取资料后撰写文本,民族志仍然不可能客观地再现异民族的文化生活。首先,人类学家获取的资料主要基于对报道人的采访,报道人提供的信息是否客观可信,人类学家对采访内容的翻译是否准确到位值得怀疑。其次,尽管人类学家开始关注语言的重要性,但翻译对整个民族志工作中的影响却仍被忽视。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们对于翻译的质量要求不高,只求能基本表达原语及原文的意思即可。除此之外,人类学家的研究视角主要聚焦于当地的语言、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试图通过对这几类研究描述出当地社会的整体面貌,这种人类学的整体观视野,同样存在以偏概全的情况。而且,民族志是以人类学家自己的视野为基础做的研究,观察问题的角度很有可能不全面,而且写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主观意识。

3. 人类学家对翻译问题的反思

鉴于以上这些问题,人类学家开始对翻译在建构人类学话语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反思。人类学家的反思提升了翻译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并为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做出了贡献。从人类学、哲学、认知心理学和符号学等多学科视角解读翻译的不可译性,不但拓宽和加深了人类学对于翻译的认识,而且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3.1 区域研究中的翻译问题

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和卡普昌(Deborah Kapchan)是两位关注区域研究中的翻译问题的学者。赫兹菲尔德在《从不可言说到难以言喻:民族志话语中不可译性的表现》一文中讨论了民族志翻译中的不可译问题。他首先区分了民族志翻译与文学翻译,指出民族志翻译主要通过描述当地人的行为来解释他们的文化。然后他以希腊语的研究为例,从意图性和翻译策略两个方面对民族志翻译进行了分析,并由此认为民族志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图性影响。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不清楚原语行为者的意图,民族志翻译和所有的翻译一样都是不完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民族志常要提供轶事趣闻的原因。他最后总结道:“翻译的延异性和暂时性决定了它不可能面面俱到,民族志的描述总是不完全的……强调翻译的暂时性是人类学家对其研究群体以及同行的尊重和负责。”(Herzfeld, 2003: 130 - 131)卡普昌则以民间讲故事的人如何把古典的阿拉伯文本翻译为口语并表演出来为例,论述了民俗翻译的应用性问题。传统的文本虽然经典,但其固定的文风可能会让人觉得索然无味,而且与阅读晦涩的文本相比,观看讲故事的人表演会让人感觉轻松许多,讲故事的人常常凭借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吸引住观众。而且一些讲故事的人很注重与时俱进,适时对自己的翻译策略和选材进行调整,增加表演的趣味性以吸引观众,“有些讲故事的人甚至会到电影院观看电影,然后把电影的内容稍做修改(通常只是把电影中的人名地名改为当地人熟知的名称),便作为新的故事讲给观众听”(Kapchan, 2003: 142)。他认为民俗翻译的成功与否在于能否引起共鸣,讲故事的人通过表演使得翻译以一种活生生的图像出现在观众面前,观众能从视、听、嗅等多重感官上感受原文化从而引发共鸣。由此看来,研究翻译的应用性很有必要,人类学家通过关注翻译的应用性选择适合的翻译策略,尽量把原语文化表现出来,从而挑战不可译性的极限。

3.2 语言人类学研究中的翻译问题

基恩(Webb Keane)关注语言人类学中的翻译问题,其论文《第二语言,官方语言,现代语言和后现代的声音:谈印尼语》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①印尼人如何理解印尼语;②印尼人如何理解语言认同。他首先对印尼语的地位进行了讨论,认为对大多数印尼人来说,印尼语既是第二语言又是官方语言。与第一语言即日常用语相比,印尼语要显得更“成熟”、更“现代化”。他的观察发现,印尼人对印尼语与外来语的

区分不是固定不变的。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语言本身,语言所具有的能指和所指的符号特性不过是对形式和意义的区分。如果人们能够超越形式的差异,就能寻找到翻译中暗含的、深层的普遍规则。追求普遍性是现代性的思想,而确立官方语言、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理念也是现代性的思想。他相信,一种语言要成为官方语言,至少应具备两个前提条件:“虽然是人类的语言,但具有能够回溯神性语言的特质;能在纵向上把说话者从讲方言的社会语义限制中解放出来,且在横向上使说话者处在一个能与世界上说其他语言的人相交流的平台上来。”(Keane, 2003:158)他认为语言边界的存在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现象,边界在把事物区分开来的同时,也使它处在有差异的体系中。因此,语言认同不仅受由语言差异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受边界这个概念的不断变化的影响。他最后指出,语言地位的变化是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们对语言的认同是双向的。

3.3 宗教人类学研究中的翻译问题

一些人类学家研究信宗教人类学中的翻译问题,比如在《作为大祭司的人类学家》一文中,萨乐(Benson Saler)由一段历史故事引出信仰能否翻译的问题。在西班牙入侵印加帝国时两国领导人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译者费莉佩(Felipe)错把“三位一体”译为四位圣人。历史编撰者加西拉索(Garcilaso)认为这属于文化差异问题,因此可以原谅;而且纵观历史,即便是在信仰基督教的社会中人们对“三位一体”的理解也有出入。但萨乐不认同其观点,认为绝不能用算术来理解“三位一体”,否则只能把其世俗化。他提议:“宗教翻译需要特别注意反常识的认识,把常识和反常识的认识都纳入研究范畴中,从更广的维度上追求忠实。”(Saler, 2003:206)西格尔(Alan F. Segal)关注圣经翻译,他认为所有的圣经翻译都是对圣经的理解,虽然新时期的人们会用新观念去理解以前的思想,但应尊重(其他时代的)别人的理解。如何更好地翻译圣经?他提出了“再次体验”的翻译策略,即重温以前的文本并认真感受后再进行翻译。

3.4 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翻译问题

反思艺术人类学中翻译问题的学者主要为马格费依(Wyatt MacGaffey),他特别关注人类学博物馆文化的翻译问题。在他看来,在西方传统的认识论中,艺术与文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艺术是人表现自我的一种形式,而原始文化在过去只是被认为是一种迷信,其艺术价值不受重视,人类学家从田野带回的手制品过去只被当作是一些新奇的玩意陈列在博物馆中供大家观赏。甚至到了19世纪,人类学家仍然认为原始文化没有什么值得翻译的。现代美学则把手制品纳入艺术范畴,受美学思想的影响,博物馆中的这些奇异的手制品也开始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学者们也开始讨论是否该翻译这些手制品以及如何翻译等问题。在他看来,艺术品的展示本身即是翻译,虽然与传统意义上的文本翻译不同,但它们有着更多样化的观众。他同

时也指出,翻译博物馆收藏的展品主要考虑两方面因素:展品的艺术价值和观众的社会背景。他通过这个研究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艺术品的翻译受艺术概念自身发展的影响,艺术概念的发展则取决于意识形态。”(MacGaffey, 2003:263)由此可见,翻译对异文化展品艺术价值的表征主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4. 结语

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学研究中,不论是文献资料收集还是田野调查都时时离不开对异文化的理解与翻译。随着人类学家对翻译的重视和反思,他们在翻译问题上的许多观点对于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及翻译理论的建设都具有明显的启示作用。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暗示我们要根据翻译的应用性来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语言人类学的翻译研究表明语言地位的变化是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宗教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则提出了先重温以前的文本,尔后再进行翻译的“再次体验”的翻译策略;艺术人类学的翻译研究强调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指出翻译受意识形态的操控。此外,由于民族志与翻译研究都关注异文化,人类学对文化模式与文化差异的研究对于翻译研究而言尤有借鉴意义。以文化持有者的视角来理解并阐释他者的文化,并从他者的文化研究中反思自己的文化,会为从人类学出发的翻译研究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 [1]Barker, M. Contextualization in Translator-and Interpreter-Mediated Event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6(3):321-337.
- [2]Basu, P. & C. Simon. Migrant Worlds, Material Cultures Introduction [J]. *Mobilities*, 2008 (3):313-330.
- [3]Benjamin, W.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G]// Venuti, L.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4]Borgatti, S. P. & X. Li. 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a Supply Chain Context[J]. *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009(2):5-22.
- [5]Bradby, H. Translating Culture and Language: A Research Note on Multilingual Settings [J].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2002 (6):842-855.
- [6]Crapanzano, V. Hermes' Dilemma: The Masking of Subversion in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 [G]// Clifford, J. & G. E. Marcu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51-76.
- [7]Fetterman, D. M. *Ethnography: Step by Step*[M].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2010.
- [8]Herzfeld, M. The Unspeakable in Pursuit of the Ineffable: Representations of Untranslatability in Ethnographic Discourse [G]// Rubel, P. G. & A. Rosman (eds.). *Translating Cultures: Perspectives*

- on *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y*. Oxford & New York: Berg, 2003: 109 – 134.
- [9] Kapchan, D. Translating Folk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G]// Rubel. P. G. & A. Rosman (eds.). *Translating Cultures: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y*. Oxford & New York: Berg, 2003.
- [10] Keane, W. Second Language, National Language, Modern Language, and Post – Colonial Voice: On Indonesian [G]// Rubel. P. G. & A. Rosman (eds.). *Translating Cultures: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y*. Oxford & New York: Berg, 2003.
- [11] MacGaffey, W. Structural Impediments to Translation in Art [G]// Rubel. P. G. & A. Rosman (eds.). *Translating Cultures: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y*. Oxford & New York: Berg, 2003.
- [12] Mead, M. *Coming of Age in Samoa* [M].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30.
- [13] Saler, B. The Ethnographer as Pontifex [G]// Rubel. P. G. & A. Rosman (eds.). *Translating Cultures: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y*. Oxford & New York: Berg, 2003.
- [14] Huang, Y. T. *Transpacific Displacement: Ethnography, Translation, and Intertextual Travel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M].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15] 卡罗尔·恩伯, 梅尔文·恩伯. 文化的变异: 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 [M]. 杜彬彬, 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 [16] 段峰. 深度描写、新历史主义及深度翻译——文化人类学视阈中的翻译研究 [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2006(2): 90 – 93.
- [17] 孙宁宁. 翻译研究的文化人类学纬度: 深度翻译 [J]. 上海翻译, 2010(1): 14 – 17.
- [18] 王雪明, 扬子. 典籍英译中深度翻译的类型与功能——以《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 为例 [J]. 中国翻译, 2012(3): 103 – 108.
- [19] 庄孔韶. 人类学通论 [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冯 革

① 阅读理解的涉身性及其意义

亚瑟·M.格林伯格 著 姜孟¹ 丁玲² 潘雪瑶³ 译

(1. 四川外国语大学 教务处, 重庆 400031; 2. 3. 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 重庆 400031)

摘 要:与情境理解和口语理解类似,阅读理解也具有涉身性。理解在根本上是人基于身体、物质世界、个人目标和文化准则的物用性来采取有效行为的能力。在语境中,我们借助知觉、行为和情感的神经系统及身体系统对语言内容进行模拟,继而在行为基础上理解语言。立足这一理论框架,提出一种教授阅读理解的新方法:教授儿童如何在阅读中模拟。通过采用“阅读干预”的方法,分两个阶段教儿童如何模拟。第一阶段,身体操控:儿童通过操控玩具来模拟阅读内容;第二阶段,意象操控:成功地操控玩具之后,教儿童在想象中操控玩具。研究表明,身体操控和意象操控对记忆和理解都有很大作用。

关键词: 阅读理解; 涉身性; 阅读干预

How Reading Comprehension is Embodied and Why That Matters

JIANG Meng DING Ling PAN Xueyao

Abstract: Reading comprehension, much like comprehension of situations and comprehension of oral language, is embodied. In all cases, comprehension is the ability to take effective action on the basis of affordances related to the body, the physical world, and personal goals and cultural norms. In language contexts, action-based comprehension arises from simulating the linguistic content using neural and bodily systems of perception, action and emotion. Within this framework, a new approach to teach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is described: Teach children how to simulate while reading. The Moved by Reading intervention teaches simulation in two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physical manipulation,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涉身认知前沿理论文献编译”(SISUY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亚瑟·M. 格林柏格,男,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学习科学研究院资深科学家,威斯康星大学荣誉教授,主要从事记忆和语言理解相关的研究。

译者简介:姜 孟,男,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二语习得、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神经语言学研究。

丁玲,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心理语言学、二语习得和认知神经语言学研究。

潘雪瑶,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心理语言学、二语习得和认知神经语言学研究。

children manipulate toys to simulate the content of what they are reading. After success in physically manipulating the toys, the children are taught to manipulate the toys in imagination.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both physical and imagined manipulation leads to large gains in memory and comprehension.

Key words: reading comprehension; embodiment; moved by reading

理解是什么?对情境、口语或者书面文本的理解会有所不同吗?理解的本质是否对教学指导有启示?这是笔者试图在本篇论文中阐述的问题。简言之,笔者认为理解与行为有关:理解了情境或文本意味着,这种理解能够引导主体产生有效的行为;也意味着主体是否正在进行理解情境、对话或者文本这种行为。而且,因为理解能引发实际的行为,所以理解与身体能力直接相关。最后,了解阅读理解的身本质,意味着掌握一种以最有效方式对哪怕是最低龄的读者传授阅读理解技能的高招妙法。这种“阅读干预”法就是让儿童与文本进行身心互动,达到对文本涉身性及行为性的理解。

1. 理解情境和语言

首先,介绍理解的常识性方法。当在街上走,坐着工作,或在球场与朋友聊天时,理解意味着什么?它并不仅仅是一种认知状态。如果某人要停下脚步,什么都不做,只是思考当下的情况,路人必然会很吃惊地说,“嗨,朋友!你不能站在路中央!”但在任何特定情形下,很多行为也同样是不可接受的。比如,当你在学习或者工作时,你不能随心起舞、大声喊叫、佯装游泳、或者过度注重自己和他人的仪容。否则,他人就必然会说,“难道你不知道分场合吗?”因此,如果你了解自己的处境,至少会通过你相应的行为显现出来,就是说你的行为会受到物理情境、身体状况、社会文化准则和特定目标的限制。下面,我将进一步论证得体的举止不仅能透露出理解能力,同样也是理解能力的一部分。

类似的常识性分析同样适用于理解口语和对话。如果我说:“哎呦,前几天阿特在工作中行为反常,他想在走廊游泳。”然后你回答,“我真的不喜欢坐飞机去旅行。”我肯定就会问,“喂,你到底懂不懂我在说什么?”情境中得体的行为显示了理解能力,这里指交流中的理解能力。然而,肢体活动,如假装游泳,与发音器官的发声活动似乎有很大差别。

模仿概念能够解释肢体活动与发音活动之间的不同(Barsalou, 1999; Barsalou, 2008; Gallese & Lakoff, 2005; Glenberg & Gallese, 2011; Zwaan & Taylor, 2006)。根据语言理解的模仿理论,我们是通过模拟语言描述的情境来理解该语言,就是说,让我们的大脑进入类似于真实情境中出现的感知、行为和情感的状态。因此,理解这样一句话,“他打算在走廊游泳,”这句话利用了①看到真实的走廊和动作时,活跃的视觉感知系统;②用于游泳的运动系统;③看到一个成年人行为异常时,对这种奇怪、令

人心烦或者吓人的情境做出反应的情感系统。

支持模仿理论的文献很多,并有日益增多的潜势(Glenberg, 2007; Kiefer & Pulvermüller, 2011; Fischer & Zwaan, 2008)。在此,我给出的证据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模仿理论成立,那么当听到动词,如“舔、捡、踢”时,控制嘴、手和腿的特定运动系统就会分别被激活。这也正是 Hauk、Johnsrude 和 Pulvermüller(2004)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记录人听动词时的大脑活动所得出的结论。同样,根据模仿理论,控制手的神经系统和肌肉系统在阅读描述对象转移的句子时比阅读有同样对象和人物,但不涉及动作的句子时会引起更大的激活。这种特别的神经——肌肉活动经单脉冲经颅磁刺激得到了证实(Glenberg, et al., 2008)。

也有证据支持模仿理论中这一观点:知觉机制参与语言理解的过程。比如,V5/MT(视觉感知运动的特定区域)在人们理解动作句时比理解无运动的视觉场景句时被更大地激活了(Rueschemeyer, et al., 2010)。

最后,模仿理论预测情感语言的理解有情感的神经系统和身体系统的参与。Havas 等(2010)让被试分别阅读描述开心、伤心和生气事件的句子。正如模拟理论所预测,当阅读开心事件的句子时,被试的微笑肌更活跃;当阅读悲伤和生气事件的句子时,被试的皱眉肌更活跃。模仿理论还预测,如果参与模仿的能力受损或降低,理解能力就会受影响。Havas 等人(2010)用美容肉毒素试剂设计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实验程序,该实验结果为这一假设提供了证据。将美容肉毒素注射到皱眉肌上,会阻碍肌肉的活动,从而达到减少皱纹的目的。根据模仿理论,不能皱眉会增加模仿悲伤和生气情绪的难度。这一结果正是实验所发现的:在皱眉肌注射肉毒素后,阅读悲伤和生气句子的速度也会减缓,但是阅读开心句子的速度则不受影响。

反对模仿理论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知识大多是抽象的,因此不能仅仅通过躯体的感知、行动和情感系统来掌握人类知识。但是,至少从四个方面来说,这种异议是不正确的:首先,有数据显示,至少有部分抽象观点与身体系统关系密切。比如,Glenberg 等人(2008)证明了:理解描述抽象信息转移的句子(如,“安娜把责任交给你了”)和描述实物转移的句子时,运动系统被激活的程度相同(Santana & de Vega, 2011)。在另一个例子中,Kousta 等(2010)表示,很多抽象的观点都建立在情感系统的基础之上。

第二,Barsalou(1999)认为,一些抽象的观点可以理解为涉身关系或者涉身过程,比如,真理。理解“真理”这个概念通常需要对比情境和情境描述。因此,提出“外面真的在下雨吗?”这个问题时,需要对比对天气的感知和对句子的模拟。“外面正在下雨。”如果感知到的现实与句子的模拟相符,这个句子就是正确的。

第三,Lakoff(1987)引证了大量说明人类是通过一系列隐喻拓展来思考(或谈论)抽象概念的语言证据。比如,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理论的精确定义。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物理结构。因此,我们会说,如“理论有坚实的基础”或者“理论是凭空建立的”“理论在充分证据下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现在有些推测和数据证实了:从感知、行为和情感的神经系统分离性上来说,即使是句法规则也并不抽象。相反,Glenberg 和 Gallese (2011)提出,句法是从行为控制中产生的。

总之,我们可以强有力地解释语言理解的模拟理论,即:我们通过控制日常感知、行为和情感的神经系统和身体系统来模拟语言情境,从而达到理解语言的目的。因此,我们理解语言就像理解情境一样:要依据情境或者所描述的情境。

2. 阅读理解

阅读理解的模拟性解释与口语理解的解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它们的相似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文本理解需要对描述情境进行模拟,这种模拟建立在行为、感知和情感的神经系统基础上;第二,口语理解和文本理解的模拟都来自索引假设(Glenberg & Robertson, 2000; Glenberg & Gallese, 2011; Kaschak & Glenberg, 2000)所描述的三个步骤中。第一步是将语言符号,即单词和词组,索引到知觉对象或先前经历上。这些经历在记忆中被编码为知觉符号(Barsalou, 1999),即在与客体先前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觉、行为和情感神经活动的符号;第二步是从客体中提取物用性,即基于客体的物理特性、主体的身体及文化规范的制约,与客体发生互动的方式;第三步是根据句法筛选和整合物用性,即通过整合物用性来创造出句法上合理的句式“谁对谁做了什么”。

然而,书面语理解和口语理解是不同的。首先,书面语和口语的学习方式不同,学习后的表现也不同。学习口语时,对目标语符号(口语单词和短语)的索引既频繁又迅速。比如,母亲说:“这是你的瓶子。”然后把那个瓶子递给孩子;或者,父亲说“挥手再见”,然后就做出挥手的手势;或者某个兄弟姐妹说,“把球拿过来”,然后就会指向那个球。从这些互动中可以看出,语言符号到索引目标或知觉符号的迁移,自始至终都在进行,最后变成一种快速的自动加工过程。

与此相关,口语理解借助了阅读理解中不常用的情境线索。首先,对话内容通常与对话双方直接参与的当前环境有关。因此,单词索引的客体已经被启动,并且很容易在知觉中获悉。第二,口语借助手势(Beilock & Goldin-Meadow, 2010; Goldin-Meadow & Beilock, 2010; Hostetter & Alibali, 2008)消除语言歧义,并有助于建立索引。第三,口语能借助韵律来突出信息,同时正确地分析句法。最后,口语能充分利用声调、韵律、表情和身体动作来传达讯息。比如,当谈到伤心事时,说话人可能说话平缓、表情忧伤、身体软瘫。而在阅读时,这些线索都会消失。

关于阅读的学习。当学习阅读时,学习者不能快速且频繁地将语言符号索引到客体或经验上,索引过程缓慢、不可靠而且难以实现。初学者必须首先学会字母和字母的组合原则,然后才能通过语音组合或对单个词语的模糊记忆解码书面文字,并对其进行发音。但是,即使成功地完成了解码和发音,读者对书面文字发音的流利和韵律程度也不如口语。因此,根据不流利阅读中说出的单词,很难提取语义信息,就是

说,很难把不流利的发音索引到合适的知觉符号上来。而且,阅读时,文字和目标客体之间的关系很难被证实。比如,成功解码“dog”这个单词时,并不会当场出现一只字面意义上的“狗”。即使文本中可能有一只狗的图片,参考图片也只是随意的一张图。所以,符号和涉身体验之间的关系在阅读中比在口语学习中更薄弱。最后,口语中很多相应模拟的线索(如:情感韵律),都没有出现在阅读中。对于没有成功建立文字和涉身体验之间关系的儿童来说,阅读就变成了一项读单词的枯燥练习,并没有理解单词的意义。

3. “阅读干预”法 (The moved by reading intervention)

儿童是如何学会模拟文字的? 流畅性似乎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确,当儿童的阅读发音达到口语交流的流利和韵律程度时,他们的发音可能对提取涉身经验很有效。但如果阅读所发的音意义不大时,对其流利地进行阅读就会像一种折磨,而且很难想象:在不懂意思的情况下,儿童怎样才能用自然韵律把文本读出来。

另一个引导儿童理解意义的阅读策略是:谁对谁做了什么? 为什么? 这篇文章与上一篇文章有什么联系? 运用你的背景知识! 在脑海中勾勒出图片或者情境! 可是,所有这些引导都建立在儿童已经理解了意义,只是懒得运用而已的前提下。假如儿童很难从文本中提取意义,怎么办?

“阅读干预”设计了两个阶段的阅读理解去解决这些问题。让儿童阅读与特定场景有关的故事。比如,一个场景中讲述了发生在农场的故事,故事中有动物、物体,如拖拉机、农民(见图1);另一个场景讲述了发生在房子里的故事,故事中有母亲、父亲、孩子和各种道具,如床和婴儿手推车。当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儿童们能够接触到与场景中的物体和角色相对应的玩具模型,或者看到电脑显示屏上的玩具图像。“阅读干预”的第一个阶段叫作身体操控。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先大声朗读一个句子,然后移动玩具或者电脑上的图像来模拟句子内容。比如,如果这个句子是“农民开着拖拉机去谷仓”,然后儿童就将玩具农民放进拖拉机中,把拖拉机移向谷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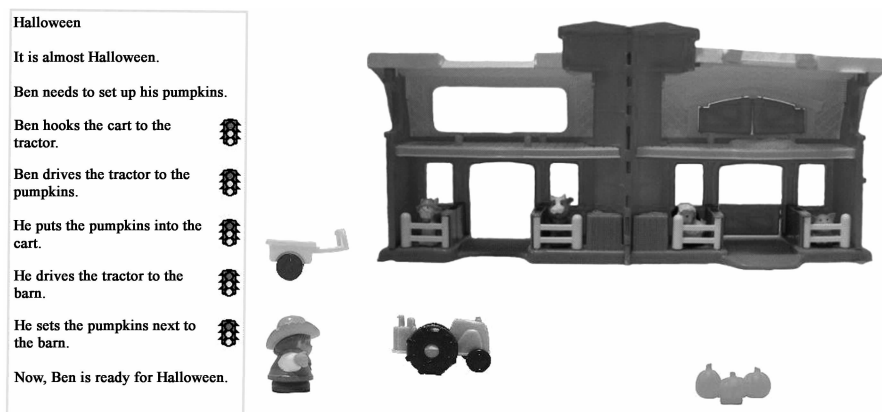




图 1. (a) 阅读前,“本把手推车挂到拖拉机上”的场景截图(b)“本把手推车挂到拖拉机上”场景的中途截图。(c)成功地完成“本把手推车挂到拖拉机上”之后的场景截图。绿色的交通灯是儿童按照句子提示,操控玩具的指示灯。来自 Glenberg 等人(2009)

进行身体操控是为了加强理解,理由如下:首先,儿童必须给物体(或者他们的图像)编入主要的实词索引。这个索引过程可以逐词进行,就是说不需要理解整个句子。因为物体是以物理方式呈现的,它们既启动了单词的发音,也有助于把物体限定在可以索引到的单词上。然后,儿童必须把句子表演出来,就是说,儿童必须用动作将句子的句法实例化,谁对谁做了什么。情境约束(如,拖拉机容易移动,但谷仓不能)会启动并限制儿童在模仿过程中所采取的行为。最后,身体操控会向儿童展示怎样使书面文本有意义以及怎样理解这种意义。

身体操控有助于理解(如下探讨),但是如果儿童总是需要借助身体操控来理解文本,这是不切实际的。幸运的是,践行身体操控后,儿童转向意象操控(imagery

manipulation)就相对容易。和身体操控一样,让儿童在想象中移动物体或镜像,只是现在物体或镜像不是以物理方式呈现,而是让儿童将书面文字索引到对应的知觉符号上。

前人已经对视觉或镜像的文本理解做了较好的研究(Bell, 1986; Paivio, 1986; Sadoski & Paivio, 2001)。早期研究和“阅读干预”之间有几个重要的不同之处。首先,意象操控时的指令(“在想象中移动你刚刚移动过的角色”)比很多调查想象实验(“在你头脑中刻画图片”)的指令意义更清楚。这并不是文本中单词的意义清楚,而是儿童有了身体操控的基础。因此,儿童能够把指令索引到身体操控的涉身经验上来,从而理解意象操控指令本身。第二,与意象指令不同,除了视觉意象(visual imagery)之外,意象操控更有可能产生一种重要的运动分向量(motor component)(同见 Varley, Levin, Severson & Wolff, 1974; Wolff & Levin, 1972)。运动分向量的加入会增加被编码信息的范围。除此之外,考虑到运动皮质在预测中所起的作用(Bubic, Von Cramon & Schubotz, 2010),要激活运动就应该在阅读时加强预测加工。因此,通过促进索引、编码多源信息、加强预测加工,意象操控阅读能够加强理解。当儿童熟练掌握意象操控时,他们就成为了一个熟练的读者。

4. “阅读干预”有利于增进阅读理解吗?

有利,而且通常非常显著。Glenberg 等人(2004)做过一个关于“阅读干预”的早期实验。研究人员与一二年级的儿童被试一对一进行实验,身体操控组的儿童通过模拟句子内容来操控玩具。研究者对比了他们和反复阅读同样文本内容的控制组儿童的表现,控制组儿童也能看到玩具,但却不能操控。让儿童们第一次回想动作句时,身体操控组的儿童能够回想起 62%,而控制组的儿童只能回想起 29%,效应值(即 Cohen 的 d 值,指两个均值之间的标准差)为 1.39。测试儿童们根据文本做出正确推断的能力时,身体操控组仍比意象操控组有优势, d 值为 0.81。无论是准确记忆($d = 1.87$),还是正确推断($d = 1.50$),运用过身体操控和意象操控的儿童都比控制组的儿童表现得更出色。实验第三天,没有给被试儿童任何具体的阅读指示。然而,练习过身体操控和意象操控的儿童在回忆($d = 1.23$)和推断($d = 0.95$,尽管因为样本较小,推断效应值差别并不大,仅为 0.05)仍比控制组的儿童表现地更出色,。

最近,我们把“阅读干预”当作一个网络系统来操作(Glenberg, et al., 2009; Glenberg, et al., 2011)。使用电脑时,让儿童操控电脑上的影像,而不是直接操控玩具。结果发现,操控影像比操控玩具相比产生了更大的再读效益($d = 1.16$)。

5. “阅读干预”实验一定要一对一操作吗?

绝对不是。Glenberg、Brown 和 Levin (2007a)的“阅读干预”实验中每组有三个儿童被试。身体操控过程中,一个儿童阅读并操作第一个句子,下一个儿童阅读并操

作下一个句子,以此类推。总的来说,在回答理解性问题时,身体操控组的儿童比反复阅读文本组的儿童回答地更准确, d 值为 1.72。有趣的是,这一效应值不仅在某个儿童回答的理解性问题中发现($d = 1.26$),而且在该小组中其他儿童回答的理解句中也发现了($d = 1.86$)。第一眼看上去,这一结果令人吃惊,但仔细思考就会给出几个可能的解释。首先,观看他人操作除了能够产生基于语言的记忆外,还能产生基于视觉的记忆。第二,观看他人的行为能够刺激观察者的镜像神经系统(Glenberg, 2011; 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使他们的运动系统产生与阅读文字时高度相似的神经活动。

最近,我们以整个班的学生为实验对象进行了“阅读干预”实验,实验中运用了网络版的身体操控和意象操控(Glenberg, et al., 2011)。在这个实验中,儿童通过阅读来解决数学类故事问题(稍后会详细介绍)。计算该问题时,物理操控组的儿童比阅读操控组的儿童表现的更好($d = 1.19$)。同样,如果在阅读故事性问题时,物理操控组的儿童接着使用意象操控,他们会比仅阅读文本的学生表现的更好($d = 0.90$)。

6. “阅读干预”会有长期效益吗?

这里的数据并不是非常可靠。Glenberg 等人(2004)的实验中,身体操控训练和意象操控训练之间隔了一个星期,而且测试前一个星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指导。最后的结果确实表明了驱动阅读的积极影响, d 值为 1.11。Glenberg 等(2007b)研究发现,对于稍年长的儿童(三四年级)来说,极少量的“阅读干预”经验也能提高三周之后的表现($d = 0.48$)。更全面的“阅读干预”训练很有可能带来更大更持久的效应。

7. “阅读干预”是对某些特定的群体有效吗?

是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可能来自 Marley、Levin 和 Glenberg(2007)的实验,他们调查了有学习障碍的美国本土儿童的听力理解。这些儿童被随机分配为三组。身体操控组的儿童们在听到实验员读出一句话后,自行操作;视觉条件组的儿童们听实验员读出一句话后,看他操作;自由学习组的儿童先听实验员读句子,然后在听到句子后的间隔时间(与上述组操作时间相等)里,根据实验员的指示思考每个句子。身体操控组和视觉条件组自由回忆(free recall)句子介词、宾语、动作(但没有地点)时的表现比自由学习组的表现要好($d_s > 1$)在线索回忆的过程中也是如此。身体操控条件组与视觉条件组的表现稍有差异($d = 0.32$),但大体相似。两个组表现结果的相似,可能反映了基于镜像神经元系统的操作,上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上述三人阅读小组的数据(Glenberget, et al., 2007)。

听力理解的数据与一般的“阅读干预”模式不同之处在于身体操控中观测到的结果没有转移到意象操控条件中。在这个实验中,意象操控无效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儿童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使用意象操控的支架式指导(scaffolded instruction)

(Glenberg 等人 2004 年的实验证实了这种支架的重要性);第二,让儿童“闭上眼睛,在头脑中勾勒画面。”这种身体操控指令不如“像之前一样用意象操控玩具”这种标准的意象操控指令有效。

Marley、Levin 和 Glenberg (2010)的实验被试是健全的美国本土儿童,到他们三年级时,预期的“阅读干预”效果出现了。也就是说,此时,儿童身体操控比多次阅读更有助于他们自由回忆故事($d = 1.45$);同样地,意象操控也比多次阅读更有助于其自由回忆故事(即便是用“想象画面”这样的指导语), d 值为 1.09。但对二年级儿童来说,身体操控是有效的, d 值为 0.84,但意象操控无效($d = 0.40$,但在 0.05 的差别标准下,差别不大)。这些数据表明,进行意象操控时,年幼的儿童可能比年长的儿童需要更多指导。(同见 Marley, et al., 2011)

8. “阅读干预”训练会传递吗?

有两种传递可供参考。一种是让被试从故事的某个场景中接受“阅读干预”训练(如农场场景),接着要求他在另一个场景中运用意象操控。事实上,Glenberg 等人在不同场景中训练并测试儿童后得到了上述数据。同样,在 Glenberg 等人(2004)实验的最后阶段,没有给儿童进一步的指导,所阅读的文本是一个新的场景。

另一种更有趣的传递实例可能来自 Glenberg 等人(2011)的报告。他们提出的主要问题是:“阅读干预”是否是一项广泛运用于任何阅读领域的基本阅读技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实验者让三四年级的儿童阅读记叙文和说明文,学习并练习“阅读干预”。接着,让他们利用记叙文和说明文中的角色和情境解决数学问题。在故事问题的情境中,儿童没有接受任何关于运用“阅读干预”的特别指导(与 Glenberg 等人不同,2007b)。那么,帮助儿童理解故事是否有助于他们解决数学问题呢?

表 1 Glenberg 等人(2011)实验中的一道数学故事题。

雷参加了学校的才艺大赛。他用心灵遥感表演了一个魔术。这是他喜欢的魔术:空中漂浮。当物体漂浮时,它们是悬在半空中的。

雷和七个选手坐在舞台前,等待表演。他是四号选手。被叫到号码时,他纵身跃入舞台。台上有两个物品:一台电脑和一个哑铃。他使重达 22 磅的电脑悬浮在空中,观众们都目瞪口呆。

他听到了观众们的惊叹声。然后,他又把重达 55 磅的哑铃悬浮在空中。

他总共举起了多少磅的物体呢?

请列出完整的解题过程。

注意:前三段都以一个绿色的点结尾,这些绿色的点被用作执行身体操控或意象

操控(“阅读干预”条件下)的信号或者控制条件下重要的信息的指示。

我们用两种指标来评判被试解决问题的表现。第一种只看答案的数值是否正确。第二种反映了 Verschaffel 等人(2010)提出的意义建构中止。就是说,儿童们在解答故事题时,似乎不会去理解故事的意思,而只是单纯地把数字组合起来去解答数学题。为了探寻儿童对意义建构的中止,实验中每个故事里都有与解决问题无关的数字信息。表1给出了一个例子。在文本中,数字7(参赛者的人数)和数字4(雷的号码)与故事有关,但与解决问题(雷举起了多少磅的物体)无关。如果“阅读干预”能够减少待解决问题的数量,从而帮助儿童理解故事的话,儿童对无关信息的误用就会减少。

儿童运用意象操纵解决问题的第三天,其实验数据显示,接受过“阅读干预”训练的儿童正确解决了44%的问题,而控制组儿童解决了33%的问题($d=0.59$)。“阅读干预”条件下,儿童误用了38%的非相关时间信息,而控制组误用了61%的非相关时间信息($d=0.78$)。

“阅读干预”可能训练了儿童的基本阅读理解技巧,上述数据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就是说,尽管“阅读干预”训练是在叙事文理解中进行的,这种技巧也同样适用于解决数学故事难题。当然,这并不能保证“阅读干预”适用于其他所有的文本类型和阅读目标。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理解的基本涉身解释是正确的,那么“阅读干预”很有可能是一项适用于多个领域和任务的基本策略。

9. “阅读干预”与抽象领域的阅读

在这一点上,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可能会认为:“阅读合适文本时,‘阅读干预’对儿童是有效的。”但成人读物中的抽象话题,如政治、物理等,并不会涉及身体操控或意象操控。那么,在抽象文本中运用“阅读干预”意味着什么呢?

事实上,我认为,很多(即便不是全部)抽象话题有可能是借助于“阅读干预”中的涉身过程来理解的。比如,阅读一篇关于向心力的物理学文章:当物体做圆周运动时,物体受到指向圆心的作用力叫做向心力,用公式 $F = mv^2/r$,其中 m 指物体的质量、 v 指物体的速度、 r 指物体运动圆周半径的长度、 F 指向心力。像这种信息是如何参与涉身的呢?

经验丰富的写作者往往会以如下的方式来帮助读者理解这个等式。“想象一下,你穿着旱冰鞋在停车场。为了停下来,你抓住一根标杆。当你飞驰而过时,你就会绕着标杆旋转。这种旋转就是圆周运动,你的胳膊所感受到的拉力就是向心力,即引起圆周运动的力。抓住标杆前的滑行速度(v)会影响胳膊感受到的向心力的大小。滑行速度越快,抓住标杆的那一刻,你受到的拉力会越大。等式中 v^2 这部分就是指:运动越快,你抓住标杆时受到的向心力就越大(胳膊也越容易受伤)。再假设你背着一个很重的背包(你的重量增加),但是你滑行的速度不变。那么,你的胳膊感受到的力

量大小与没有背包时感受到的会有不同吗?事实上,等式中的质量(m)越大,向心力也会更大:相比于不背背包,体重越重,抓住标杆时,越容易受伤。最后,假设你不是用手抓住标杆,而是用带环的绳子套住标杆,手抓住绳子的另一端。如果绳子很短,你会被绳子紧紧地缠在标杆上;反之,如果绳子很长,你绕着标杆转的路径就会是一个更大的圆。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否感觉到绳子和胳膊上受到的张力(向心力)更大了呢?根据这个等式,圆周半径(r)是除数,所以绳子越长,向心力越小。只要思考一下你绕着半径较长和较短的绳子转动时感受到的向心力的大小,你就会理解。”

这样,经验丰富的写作者就帮助读者把抽象符号(F 、 m 、 v 和 r)索引到涉身体验中去了。读者在阅读类似例子时所体验到的意象,正是运用了意象操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经验丰富。那样的话,就需要读者自己去发现将符号索引到恰当经历上的方式。当阅读新领域的内容时,如物理,建立索引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读者能够理解向心力和其他科学概念的原因。

阅读理解是如何参与涉身的?在理解文本时,读者给词汇和短语编入涉身(即感知、行为和情感)体验索引,然后模仿文本的内容。由于这种模仿形式与身体密切相关,所以它引导行为的产生。阅读理解中的涉身性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通过了解语言理解的涉身本质,我们可以探索出像“阅读干预”这样的有效教育干预法。

注释:

- ①原作:Arthur M. Glenberg. How Reading Comprehension is Embodied and Why that Matters [J].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2011, 4(1):5-18.

参考文献:

- [1]Barsalou, L. W. Perceptual Symbol Systems [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999, 22(4): 577-660.
- [2]Barsalou, L. W. Grounded Cognition [J]. *Annu. Rev. Psychol.*, 2008(59): 617-645.
- [3]Beilock, S. L. & S. Goldinmeadow. Gesture Changes Thought by Grounding It in Action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11): 1605-1610.
- [4]Bubic, A., Von Cramon, D. Y. & R. I. Schubotz. Prediction, Cognition and the Brain [J].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0, 4(1):25-25.
- [5]Fischer, M. H. & R. A. Zwaan. Embodied Language: A Review of the Role of the Motor System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2008, 61(6): 825-850.
- [6]Gallese, V. & G. Lakoff. The Brain's Concepts: The Role of the Sensory-Motor System in Conceptual Knowledge [J].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Sensory-Motor Representations*, 2005(3/4): 455.
- [7]Glenberg, A. M. Language and Action: Creating Sensible Combinations of Ideas[G]// G. Gaskell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sycholinguistic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61-370.

- [8]Glenberg, A. M. Introduction to the Mirror Neuron Forum [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 6(4): 363-368.
- [9]Glenberg, A. M., Brown, M. & J. R. Levin. Enhancing Comprehension in Small Reading Groups Using a Manipulation Strategy [J].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7, 32(3): 389-399.
- [10]Glenberg, A. M. & V. Gallese. Action-Based Language: A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J]. *Cortex*, 2012, 48(7):905-922.
- [11]Glenberg, A. M., Goldberg, A. B. & X. Zhu. Improving Early Reading Comprehension Using Embodied CAI [J]. *Instructional Science*, 2009,39(1): 27-39.
- [12]Glenberg, A. M., Gutierrez, T., Levin, J. R., Japuntich, S. & M. P. Kaschak. Activity and Imagined Activity can Enhance Young Children's Reading Comprehension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4, 96(3): 424-436.
- [13]Glenberg, A. M., Jaworski, B., Rischal, M. & J. R. Levin. What Brains are For: Action, Mea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J].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Theories, Interventions, and Technologies*, 2007:221-240.
- [14]Glenberg, A. M. & D. A. Robertson. Symbol Grounding and Meaning: A Comparison of High-Dimensional and Embodied Theories of Meaning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00, 43(3): 379-401.
- [15]Glenberg, A., Sato, M., Cattaneo, L., Riggio, L., Palumbo, D. & G. Buccino. Processing Abstract Language Modulates Motor System Activity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2008, 61(6): 905-919.
- [16]Glenberg, A. M., Willford, J., Gibson, B., Goldberg, A. & X. Zhu. Improving Reading To Improve Math [J].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2011: 1-25.
- [17]Goldinmeadow, S. & S. L. Beilock. Action's Influence on Thought: The Case of Gesture [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5(6): 664-674.
- [18]Hauk, O., Johnsrude, I. & F. Pulvermüller. Somatotopic Representation of Action Words in Human Motor and Premotor Cortex [J]. *Neuron*, 2004, 41(2): 301-307.
- [19]Havas, D. A., Glenberg, A. M., Gutowski, K. A., Lucarelli, M. J. & R. J. Davidson. Cosmetic Use of Botulinum Toxin-An Affects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Language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21(7): 895-900.
- [20]Hostetter, A. B. & M. W. Alibali. Visible Embodiment: Gestures as Simulated Action [J].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2008, 15(3): 495-514.
- [21]Kaschak, M. P. & A. M. Glenberg. Constructing Meaning: The Role Of Affordances and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in Sentence Comprehension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00, 43(3): 508-529.
- [22]Kiefer, M. & F. Pulvermüller.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s in Mind and Brai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Current Evid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 [J]. *Cortex*, 2011, 40(1):14-34.
- [23]Kousta, S.T., Vigliocco, G., Vinson, D. P., Andrews, M. & E. Del Campo. The Representation of abstract Words: Why Emotion Matters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2011, 140

- (1):14-34.
- [24] Marley, S. C. , Levin, J. R. & A. M. Glenberg. Improving Native American Children'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hrough Concrete Representations [J].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7, 32(3): 537-550.
- [25] Marley, S. C. , Szabo, Z. , Levin, J. R. & A. M. Glenberg. Investigation of an Activity: Based Text-Processing Strategy in Mixed-Age Child Dyads [J].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2011, 79(3): 340-360.
- [26] Marley, S. C. , Levin, J. R. & A. M. Glenberg. What Cognitive Benefits does an Activity: Based Reading Strategy Afford Young Native American Readers? [J]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2010, 78(3): 395-417.
- [27] Rizzolatti, G. & L. Craighero. The Mirror Neuron System [J].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2004, 27(1): 169-192.
- [28] Rueschemeyer, S.-A. , Glenberg, A. M. , Kaschak, M. P. , Mueller, K. & A. D. Friederici. Top-Down and Bottom-Up Contributions to Understanding Sentences Describing Objects in Motion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0, 1(6):183-183.
- [29] Santana, E. & M. De Vega. Metaphors are Embodied, and So are their Literal Counterparts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1, 2(4):90-90.
- [30] Zwaan, R. A. & L. J. Taylor. Seeing, Acting, Understanding: Motor Resonance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2006, 135(1):1-11.

责任编辑:蒋勇军

基于文本挖掘的不同层次大学生英语作文的词汇和主题特征分析

汪顺玉 赵 晴

(重庆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65)

摘 要:本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分析不同层次的大学生英语写作在词汇和主题构思方面的特征。分析的数据来至中国词网公司 2016 年举行的全国大学生百万同题写作项目收集的部分 (2000 篇) 作文文本。不同层次学生分别来自四川和重庆的三所 985 高校和 8 所普通二本院校。研究问题包括: 两类学生整体分数差异、词汇量、词频分布、词汇丰富度特征、主题词汇关联以及主题聚类特征。结果表明: 985 高校学生作文分数明显高于普通二本院校学生; 词汇量、词汇丰富度方面, 前者也明显高于后者, 而词频分布和使用频度高的实义词汇的分布特征相似; 与主题词共现程度高的组词, 两者相似度高; 985 高校学生文本提取出三个主题, 而普通二本院校学生文本呈现五个主题。

关键词:文本挖掘; 英语作文; 词汇特征; 主题聚类

Lexical and Thematic Features of ESL Writing by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Level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Text Mining Approach

WANG Shunyu ZHAO Qing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mining the lexical and thematic features of ESL writing by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level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2000 writing texts by students from 3 key universities and 8 ordinary universities in Chongqing and Sichuan Province are offered by China Wordnet Company who initiated English writing campaign in 2016. The research questions include whether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levels of universities are different in writing scores, vocabulary size, vocabulary frequency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5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于文本挖掘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水平评估研究”[教社科司函(2015)]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汪顺玉,男,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导,主要从事语言测试、文本量化方面的研究。

赵 晴,女,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研究。

distribution, lexical richness, recycling index of key content words, co-occurrence of key words and thematic clust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udents from key universities score much higher, have larger vocabulary size and higher index in lexical richness than those from ordinary universities; that both have similar patterns in vocabulary frequency distribution, recycling index of key content words and co-occurrence of key words; but that different thematic clusters are retrieved, with 3 clusters for key universities and 5 clusters for ordinary universities.

Key words: text mining; ESL writing; lexical features; thematic cluster

0. 引言

文本挖掘,又称智能文本分析、文本数据挖掘,是对具有丰富语义的文本进行分析从而理解其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的过程,已经成为数据挖掘领域日益流行而重要的研究领域。文本挖掘,最早由 Feldman and Dagan 等人于 1995 年提出,是典型的新兴交叉学科。它使用信息检索、信息提取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并结合使用算法和知识发现、数据挖掘以及统计的方法来分析挖掘非结构化数据。目前文本挖掘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文本代表性、文本分类、聚类、信息提取、探索隐藏的模型(Andreas Hotho & Andreas Nuurberger, 2005)。该技术研究广泛应用于商务、出版与传媒、电信数据、网络舆情等领域。在教育领域,特别是语言教育领域,文本挖掘才刚起步,仅有很少量的研究成果。以自然语言分析、数据挖掘、统计分析为基础的文本挖掘技术应用到外语作文分析目前仍然是空白。

长期以来,对写作能力的评价都停留在印象式主观评价层面上。虽然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大规模语言测试机构都制定了既符合测试规范又体现写作测试构念的评分标准,并对阅卷员进行严格培训。但是,面对每份作文文本时,关于语言词汇的丰富性、句法的复杂性和变异性、逻辑连贯性、内容的丰富性、语用的适切性等标准都会变得模糊起来。而文本挖掘技术可以在语言和意义层面对作文文本进行全面分析,提供一整套该文本的分析参数。这些参数能够为更加科学、准确地评价写作水平提供实证依据,促进传统的类似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断的作文评价转向类似现代西医治疗的基于生化检验和医学影像为诊断的作文评价范式变革。

目前与文本挖掘技术,特别是自然语言处理与写作相关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潜语义分析、自动作文评分和基于语料库的学习者写作特征分析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主要与自然语言处理相关。处理的方面也主要是在语言层面。语义内容层面还鲜有涉及。

过去十余年,潜语义分析方法已被语言学界用于分析文本的连贯性(桂诗春, 2003; 梁茂成, 2006)。由于该方法并不依赖文本的表层特征,而对文本中各部分之间的语义相关性进行分析,所以是最抽象的一种研究模式。其研究领域逐渐从计算语

言学中的关键词提取和自动文摘生成等领域扩展到作文自动评分、写作培训软件等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 ETS 开发的 E-rator、杜克大学开发的 PEG 系统、Hearst (2000) 的墨菲斯大学的 Coh-metrics。国内有梁茂成的自动作文评分系统、浙江大学冰果英语智能作文评阅系统、文秋芳的基于语料库的英语作文训练系统等。

基于语料库的学习者语言研究是二语/外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趋势。到目前为止,对大学生英语写作的研究大都是通过比较学习者的作文和专家或母语者的作文来发掘学生作文的特征。

在国外,学习者二语/外语作文中的连词使用历来是研究的重点(Crewe, 1990; Field and Yip, 1992; Milton and Tsang, 1993; Granger and Tyson, 1996; Bolton et al., 2002)。Bolton et al. Chen (2013) 自建了一个中国学生议论文语料库,并将其与 LOCNESS 美国子库(包含美国学生的作文)和通用研究语料库英国子库(包含英国学生的作文)以及英国学术英语论文语料库(BAWE)和密西根高级学习者二语/外语作文语料库(MICUSP)进行比较。Ädel (2012) 基于自建的斯德哥尔摩大学英语语料库,比较了瑞典语学生和英语本族语学生作文中四词词块的使用,结果发现本族语学生作文中的词块使用数量更多,种类更多。这一研究证实了词块研究发现的普遍模式,即非母语者掌握的词块比母语者少。

国内对于中国学习者英语作文语料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衔接词(赵蔚彬, 2003; 潘璠等, 2004; 莫俊华, 2005)、误用(李景泉等, 2001)、口语化(文秋芳等, 2003)、搭配(邓耀臣等, 2005)、词块(丁言仁等, 2005; 王立非等, 2006a)以及句型(何明珠, 2013; 王立非等, 2006b)这六个方面。同时,学者使用国外文本量化的方法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写作文本的词汇复杂性(汪顺玉, 2011; 鲍贵, 2008, 2010, 2011; 张艳、陈纪, 2012)和连贯性(杜慧颖、蔡金亭, 2013)。

研究从语言的诸多方面(动词短语、连词、词块、冠词、虚化动词、无灵主语句、搭配、词汇复杂性、连贯性)揭示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作文的特征,这些研究加深对学习中介语的认识。但这些已有的研究都是从表层的语言层面来分析学习者二语/外语作文的特征,并没有从深层的语义层面来揭示学习者二语/外语作文的特征。同时,研究的样本都是很有限的抽样文本,说服力和可推广性有限。

得益于网络技术、语料库和作文智能评估技术的发展,动态收集大规模学生作文文本、建立学生作文语料库、跟踪学生修改作文文本的痕迹,既方便又快捷。这些便利,为学界进行全域数据(而不是抽样数据)的作文文本挖掘提供方便。这有利于推动建立中国英语学习者各个层次的写作语料库以及在此基础上挖掘出丰富的关于语言和内容方面的信息,为外语教育的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依据和基础数据。北京词网公司研发的作文批改网就是目前国内有影响的在线智能写作文本收集和批改的平台之一。从 2014 年起,中国高校英语写作教学联盟对收集的中国学生英语作文数

据进行分析和发布。与文本直接关联的分析维度包括词汇(平均词长、词汇丰富度、学术词汇密度)、句子(平均句长、从句密度)、篇章(平均作文长度、平均段落数)以及典型错误。这些报告堪称基于大数据的分析报告,但报告局限在语言层面的频度指标,对于词汇的关联性和文本语义内容没有涉及。

本研究将以文本挖掘为框架,挖掘中国英语学习者作文在词汇和语义内容方面的特征。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问题

本研究的目的是使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对比分析重点大学学生与普通二本院校学生在英语写作的语言和内容层面的异同。具体回答的问题包括:

两类学校学生英语写作分数上有无明显差异?

两类学校学生英语写作在词汇量、词汇频率分布、词汇丰富度方面有什么特征?

两类学校学生英语写作中使用频度高的词汇在分布上有什么特征?

两类学校学生如何讨论主题的? 主题词汇关联有什么特征?

两类学校学生的写作用文本呈现了什么主题聚类?

1.2 研究数据

本次研究的数据来自 2016 中国词网公司在全国举行的中国百万同题英语写作项目。这次写作的题目是:How will AI affect our life? 题目有一段英文介绍了 Alphago (人工智能程序)打败了韩国围棋大师李世石的背景,要求学生写一篇 AI 对人类影响的议论文。字数 180-400 字。其中英语专业学生要求 400 字以上,非英语专业 300 字以上,高职高专学生 180 以上。写作任务在 2016 年 5 月底截止。

通过写作批改网收集的部分数据,985 高校数据 1000 篇,分别来自四川和重庆的 3 所高校,即四川大学、重庆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普通二本高校 1000 篇数据来自重庆市 8 所高校,包括长江师范学院、重庆工商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科技学院、重庆理工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文理学院。

1.3 研究工具

本次研究工具分为语言特征层面使用工具和内容分析层面使用工具。主要使用 SPSS 进行分数统计,使用 T-Lab 分析词汇丰富度,使用 Range 分析词汇频率分布,使用 www. lextutor. ca 中的 Tex Lex Compare 分析两个语料中词汇的复现率;使用 T-lab 分析词汇共现特征和提取文本主旨。

T-lab 通过产生分析单位(词汇单位和语境单位)的关系矩阵,识别并归类文本中的语义内容(semantic content)。分析所基于的逻辑是:文本的语义内容可以通过词之间的关联探索出来(Salvatore, 2010),语义内容对应于词汇之间的共现模式。这次

研究主要应用 T-lab 的两个分析功能:共现分析(co-occurrence analysis) 和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

1.4 数据分析

原始数据是两个呈放在 EXEL 中数据库。分析前对数据进行清理,去掉不需要的元信息变量,如学号、姓名、学校、修改次数、班级、作文号、相似度、系统分、最初提交作文。保留最终版作文,并以 TXT 文件形式保留供分析。在进行分析前,T-Lab 软件还要对文本进行四个步骤的预处理:文本分割(text segmentation)、词形还原(lemmatization)、词汇建立(vocabulary building)、关键词选择(key-term selection)。其他分析工具直接分析 TXT 文件。

2. 研究结果

2.1 分数差异分析

表1 两类大学学生参加 2016 年百万同题学生描述统计

	大学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最高分
985 大学	3	1000	80.53	11.96	94.56
普通大学	8	1000	63.16	29.73	90.58

从表 1 可以看出,985 高校学生英语作文分数平均高出近 17 分,标准差方面,985 高校数据明显低于普通二本院校数据。这可能是前者比后者具有更高的同质性。

2.2 词汇特征

本研究的词汇特征包括形符(token)、类符(type)、类符形符比(ttr)、只出现一次的词(hapax)、类符形符比开方(Rooted ttr)、修正类符形符比(Corrected ttr)。形符是指文本一共有多少个词,类符指文本一共用多少个不同的词形,类符形符比指文本类符数与形符数的比值,hapax 是指文本中只出现一次的单词,类符形符比开根(Rooted TTR)、修正类符形符比(Corrected TTR)都是类符形符比的变异指标,目的是削减因为文本长度对该指标的影响。表 2 所统计出来的数据不包括英语停用词汇。

表2 两类学校学生参赛作文词汇量和文本复杂度指标

	type	token	hapax	ttr	Rooted ttr	Corrected ttr
985 大学	8825	229197	3833	0.039	18.43	13.04
普通大学	6877	176693	3127	0.039	16.36	11.57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写作长度上,985 高校学生明显高于普通二本院校学生,前者平均作文长度为 229 个单词,后者为 176 个单词,平均长 29.5%。类符(type)和语料库中仅出现一次的单词(hapax),分别高出 29.7% 和 22.5%。两个层次的学生都没有达到写作任务所规定的字数要求。

词汇复杂度上,类符形符比相同(0.39),但是 985 高校学生文本平均比普通二本院校学生长近 30% 这个数据,说明相同长度时 985 高校学生作文的类符形符比,高于普通二本高校学生,因为这个指标受到文本长度因素影响(通常文本越长、该指标越低)。消除文本长度因素对类符形符比指标的影响,如表所示,类符形符比开根和修正类符形符比,985 高校都比普通二本高校高(12.7%)。这些数据说明,985 高校学生英语写作中文本写得更长,使用的词汇量更高,词汇复杂度指标也更高。

2.3 词频分布特征

分析学生写作文本的词汇频率分布可以评估学生产生性词汇的能力。该分析使用的是被语言测试界广泛接受的 Paul Nation 团队所开发的词频等级的 Range。分析的变量是学生写作文本的形符。表 3 显示了两类学生作文文本形符的词频分布。

表 3 两类学校学生写作文本的形符的词频分布表

	形符			
	985 高校		普通大学	
	频次/%	累计	频次/%	累计
一千	184852(77.2)	77.2	142472(77.28)	77.28
二千	22182(9.26)	86.46	16928 (9.18)	86.46
三千	12082(5.05)	91.51	9460 (5.13)	91.59
四千	5700 (2.38)	93.89	5240 (2.84)	94.43
五千	545 (0.23)	94.12	1013 (0.55)	94.98
特殊词	8726(3.65)	97.77	5581(3.19)	98.17
不在列表	3153(1.32)	99.09	2388(1.30)	99.47

注释:特殊词包括:符合词、专有名词、字母、缩写词。不在列表中词汇主要是拼写错误的词汇,如 datas、dangrous、develpent

从表 3 可以产出,虽然 985 高校学生在作文长度、使用词汇量、词汇丰富度等指

标上明显高于普通二本院校学生,但是,两类学生在使用词汇的频度分布方面相似。鉴于特殊词和不在列表中词汇并不是学生使用了诸多低频词汇或者专业领域词汇,而是属于高频词汇范围的拼写错误或者组合词汇所致,可以将这类词汇列入高频词汇(2000 词族)范围。这样,985 高校学生作文 89% 和普通二本高校学生的 91% 都使用高频 2000 词族以内的词汇。

2.4 关键词重复度

50 个高频度使用的名词中共同词汇有 48 个,复现率为 96%。48 个共同关键词名词为: advantage、able、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pect、benefit、champion、compute、control、convenience、day、develop、fear、field、future、google、help、human、humanbeing、intelligence、lee、life、live、machine、man、match、opinion、people、problem、product、progress、robot、science、side、society、technology、thing、time、topic、use、view、way、work、world。

985 高校学生独特使用的名词为 game、inform、job、year;普通二本院校学生独特使用的名词为 coin、person、role、shop。

30 个高频使用的动词中,两类院校学生共同词汇为 28 个,复现率为 93%。28 个共同关键词为: affect、be、become、believe、benefit、bring、can、control、create、develop、do、get、go、have、help、improve、know、make、may、need、replace、see、shall、take、think、use、will、worry。

985 高校学生独特使用的动词为 come 和 give;普通二本院校学生独特使用的动词为 expect 和 let。

50 个高频使用的形容词中,共同词汇有 42 个,复现率为 84%。42 个共同关键词为: able、all、another、artificial、best、big、convenience、danger、day、defeat、difference、difficult、easy、even、every、first、future、game、good、great、high、hot、human、important、intelligence、lazy、lee、like、many、much、new、online、other、out、own、rapid、same、smart、social、someother、suchas、very。

985 高校学生独特使用的形容词为 hard、just、most、only、positive、possible、strong;普通二本院校学生独特使用的形容词为 bad、both、champion、fast、few、popular、real、science。

3. 关键词共现分析

本次百万同题的题目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以及对影响的态度。学生作文文本讨论的中心内容与人工智能(AI)相关联。通过计算特定关键词和语境中其他关键词的共现的关联系数,可以看出该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共现的频度和紧密的程度。系数越高,两个关键词共现的程度越高。关键词与 20 个关联词示意图(图 1、图 2)显示与 AI 共现度高的词汇。该图中,与 AI 关联线越短,共现程度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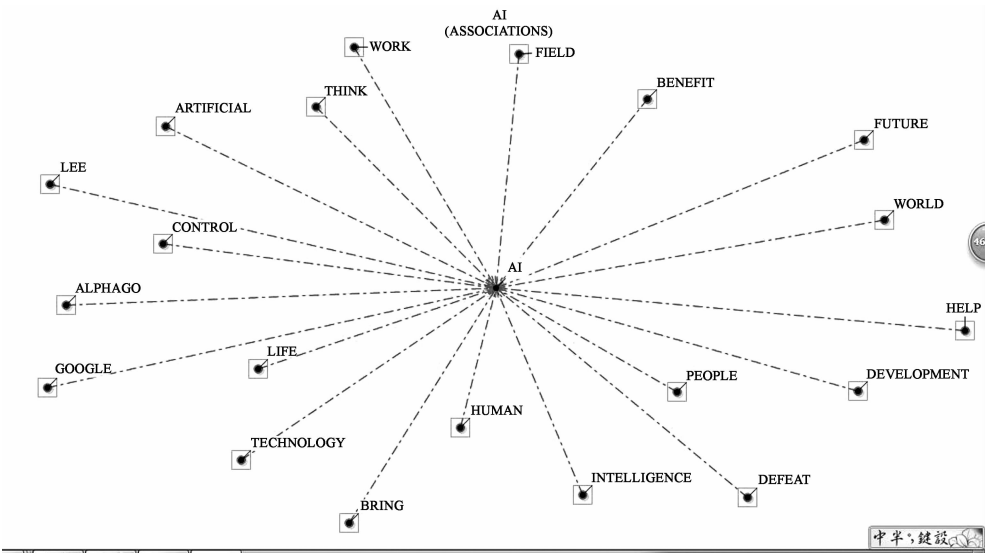


图 1 985 高校学生作文与关键词 AI 相关联的关键词汇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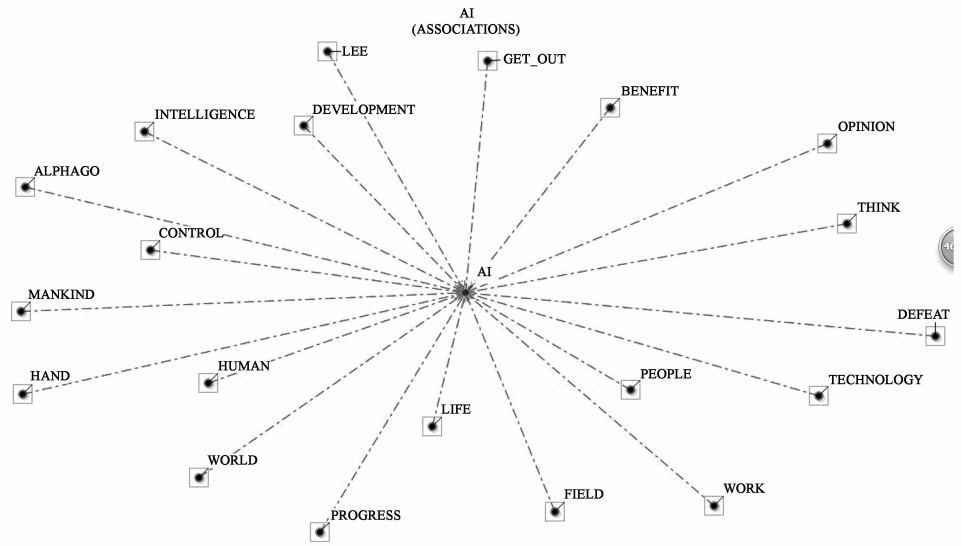


图 2 普通二本院校学生作文与关键词 AI 相关联的关键词汇示意图

表 4 两类学生作文与关键词 AI 关联度最紧密的词汇分布表

985 高校			普通二本高校		
关联词	频次	Cosine 系数	关联词	频次	Cosine 系数
people※	1305	0.558	people	953	0.556

(续表)

985 高校			普通二本高校		
关联词	频次	Cosine 系数	关联词	频次	Cosine 系数
human※	1286	0.547	life	850	0.535
life	1114	0.534	human	691	0.448
control※	745	0.444	control	499	0.427
think	609	0.380	development	479	0.385
benefit※	530	0.379	benefit	359	0.361
World	563	0.372	think	407	0.344
development	597	0.368	technology	393	0.342
intelligence※	798	0.364	field	257	0.322
technology	577	0.359	World	303	0.312
AlphaGo ※	503	0.354	mankind	261	0.311
artificial※	696	0.332	intelligence	523	0.311
field ※	393	0.330	get_out	213	0.310
future	431	0.325	opinion	238	0.301
help	417	0.321	defeat	234	0.291
defeat ※	388	0.315	work	263	0.290
bring	392	0.313	progress	248	0.287
Google※	366	0.312	hand	244	0.287
Lee ※	376	0.311	AlphaGo	244	0.286
work	408	0.307	Lee ※	221	0.286

图1与图2分别显示的是,在各自的1000篇作文中,与AI共现度最高的20个概念。表5显示的分别是各自与AI共现度最高的20个词、共现频次与Cosine系数。这些词在文本中都与概念AI关联紧密,Cosine系数越高,与中心概念共现程度越高。与AI共现度高的共40词,30个是重复的。复现率达75%。一个有趣的发现是,这些与AI共现频次高的20个词中,10个以上的词(表中打※的词)来自这次写作任务的英文指示语。过长的英文指示语可能给学生超过需要的提示。

4. 主题分析

对文本的主题分析主要是提取出最频繁出现的主题。T-lab对985高校学生文

本提取出三个主题因子。表 5 显示的这三个主题因子所包括的概念以及对应的卡方检验值。该值越高,说明该值所对应的词处于该主题的中心位置。

这三个主题的解释如下:“control”、“development”可以总领为“综合影响”,对技术、未来、生活、态度、思考等方面都产生影响;“work”、“robot”可以解释为机器人为未来生活带来的“好处、效益”,具体方面覆盖工作(work)、生活(housework)、娱乐(shop,online,phone)等方面;“alphago”、“Lee”可以解释为对人工智能具体事件的介绍,包括 Sedol、match、champion、victory、game、chess 等。

这三个主题在整个文本中的权重方面,依次为“好处和效益”(占 41.14%)、“综合影响”(占 33.27%)、“alphago 事件”(占 25.59%)。

表 5 985 高级学生作文主题聚类

主题 1	系数	主题 2	系数	主题 3	系数
control	349.473	work	637.793	AlphaGo	1679.603
development	214.145	robot	357.165	Lee	1339.311
technology	209.015	help	353.2	defeat	1256.158
science	202.614	shop	196.773	Sedol	1234.261
intelligence	176.73	save	165.001	Google	1058.006
get_out	146.351	time	159.087	champion	946.891
artificial	132.546	job	156.851	World	684.554
worry	125.009	phone	147.696	hot	669.766
benefit	108.899	on - line	132.886	match	667.287
progress	96.829	for_example	130.774	topic	658.191
eventually	86.529	solve	126.137	five - game	515.056
develop	86.106	efficiency	111.996	victory	419.614
bring	82.888	worker	100.288	once_again	284.111
view	78.475	problem	98.885	game	243.834
fear	75.952	replace	98.843	sweep	231.445
believe	72.332	housework	95.85	ches	208.491
mankind	61.387	reduce	93.389	heat	183.39
movie	57.402	car	89.531	discussion	153.96

T-lab 对普通二本高校学生文本提取出五个主题因子。如表 6 所示,这五个主题大致可以归纳如下:第一个主题可以归纳为“工作-效率”,由 work、efficiency、improve、reduce 等构成;第二个主题可以归纳为“科技-发展”,由 science、development、technology、intelligence 等构成;第三个主题可以归纳为“接受态度”,由 benefit、mankind、control、field、expect 等构成;第四个主题可以归纳“生活-教育”,由 shop、online、school、students、customer 等构成;第五个主题可以归纳为“alphago 事件”,由 alphago、Lee、defeat、google、champion 等构成。

这五个主题在整个文本中的权重方面,依次为“工作-效率”(占 25.3%)、“科技-发展”(占 25.2%)、“接受态度”(占 18.7%)、“生活-教育”(占 13.0%)、“alphago 事件”(占 17.7%)。

表 6 普通高校学生作文主题聚类

Cluster1	系数	Cluster2	系数 2	Cluster3	系数 3	Cluster4	系数 4	Cluster5	系数 5
work	879.8	science	617.1	benefit	573.9	shop	811.6	AlphaGo	1506.0
efficiency	300.9	development	399.6	mankind	520.8	on-line	664.5	Lee	1392.8
improve	300.2	technology	322.9	get_out	490.9	phone	514.7	defeat	1378.2
help	246.5	intelligence	180.8	control	490.8	school	488.9	Google	1294.5
reduce	243.2	artificial	174.7	field	297.3	student	301.7	Sedol	1266.4
dangerous	207.3	society	150.6	expect	289.3	customer	297.2	champion	1105.2
robot	187.2	rapid	118.6	eventually	288.2	subject	264.8	World	755.4
replace	158.8	human	106.4	Fear	242.6	Teachers	261.6	match	625.4
job	132.9	future	78.1	view	215.8	smart	243.7	five-game	488.7
quality	131.803	fiction	74.1	AI	206.9	traditional	202.4	topic	470.8
save	123.0	nowadays	71.8	progress	184.4	mobile	187.5	hot	462.8
lazy	121.9	connotation	68.8	people	160.3	buy	137.8	game	295.7
lose	110.0	promote	66.5	concern	146.3	store	127.2	ches	253.0
complete	104.9	commerce	64.614	survey	98.4	learn	125.3	victory	220.4
cost	102.2	step_by_step	62.8	opinion	95.6	attraction	122.5	once_again	216.6
finish	75.6	behavior	60.9	different	90.7	kid	120.3	Li	182.6
worker	73.1	unique	60.0	hold	90.2	Internet	110.4	Shishi	168.8
time	72.7	friendly	58.4	attitude	81.9	spend	110.2	Alpha	137.3

5. 讨论

本次研究关于两类高校学生写作分数方面,985 高校学生明显高于普通二本院校学生。前者的标准差也明显低于后者。一方面,前者总体上英语水平有较高的同质性,后者由 8 所大学构成,学校间学生生源差异大,学生英语水平差异也大。

本次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大数据分析的方式探索 985 高校学生与普通二本学生在语言使用层面的异同。分析结果表明,985 高校学生在词汇量、作文长度、词汇丰富度等方面明显优于普通二本院校学生,但是在所使用单词的词频分布,近 90% 左右都在最常用的 2000 词族范围内、使用频率最高。主要内容词汇(名词、动词、形容词)分布相似度也高,有 90% 左右的复现率。学生使用内容词汇方面,大部分使用的都是内容空泛的上位概念的词,用词上的具体性体现不够。另外,整体上,两类学校学生都没有达到字数的最低要求。可能的原因是: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字数要求偏低(120 - 180),学生平时的写作训练可能以此为参照,没有进行更长字数作文的写作。

关键概念共现分析方面,与 AI 共现度最高的 20 个单词中,有 15 个是一致的,people、human、life、control、benefit、development 是出现率最高的词汇,出现频次高且都与 AI 共现,说明两个群体在建构 AI 如何影响人类的这一话题,有类似的话语结构和内容维度。导致这种情况到底是针对这个题目两类学生有类似的思维框架,还是因为写作中受任务指示语的英文提示有关,还不能确定。事实是,这共现的高频 20 词中,有超过一半的实义词在英语指示语中出现过。

在主题分析方面,两个群体都体现了一定的主题交叉,但是主题聚类的结构还是不一致。985 高校学生文本提取出“综合影响”、“好处 - 效益”和“alphago 事件”三个主题,主题之间概念交叉少;普通二本院校学生文本提取出“工作 - 效率”、“科技 - 发展”、“接受态度”、“生活 - 教育”和“alphago 事件”五个主题,主题内容之间存在不少交叉概念,存在一个单词在一个以上主题中出现。主题提取数量的不同,可能的原因是:985 高校学生在写作中,更加集中在相对固定的观点,讨论更加深入,论证更充分。而普通二本院校学生整体上讨论这个话题比较散、论证不充分。

6. 结语

本次研究在两个方面对以后的研究有借鉴价值。一是分析的数据较大,处理了 2000 篇写作文本,且数据符合大数据的 4V 特征。分析的目的是找出数据后面的知识。可以视为外语教育大数据进行分析的尝试,属于数据密集造就的科学研究第四范式(徐盛桓,2016)。二是在写作文本分析中进行了语义内容层面的挖掘,探索学生如何针对某话题进行话语构建的方式,极大地丰富了英语写作文本的研究方法。当然,研究仍然还有几个明显的遗留问题:学生们写的作文是议论文吗?如果没有英语

指示语,学生的写作在语言和内容层面是否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情景呢?研究的结果和没有回答的问题相信都能为外语教师和研究者提供启迪。

参考文献:

- [1]ÄDel, A. Recurrent Word Combinations in Academic Writing by Native and Non-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 Lexical Bundles Approach[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12(31):81-92.
- [2]Bolton, K., Gerald Nelson & Joseph Hung. A Corpus-Based Study of Connectors in Student Writing Research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rpus of English[J]. Hong Kong (ICE-H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2002(2):165-182.
- [3]Chen Meilin. Overuse or Underuse A Corpus Study of English Phrasal Verb Use by Chinese, British and American University Stud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2013(3):418-442.
- [4]Chen, Y.-H. & P. Baker, Lexical Bundles in L1 and L2 Academic Writing[J].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2010,14(2):30-49.
- [5]Crewe, W. The Illogic of Logical Connectives[J]. *ELT Journal*, 1990,44(4):316-325.
- [6]Field, Y. & L. M. O. Yip. A Comparison of Internal Conjunctive Cohesion in The English Essay Writing of Cantonese Speakers and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J]. *RELJ Journal*, 1992,23(1), 15-28.
- [7]Granger, S. & S. Tyson. Connector Usage in the English Essay Writing of Native and Non-Native EFL Speakers of English[J]. *World Englishes*, 1996,15(1):17-27.
- [8]Graesser, A., Mcnamara, D. S., Louwerse, M. & Z. Cai. Coh-Metrix: Analysis of Text on Cohesion and Language[J]. *Behavioral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s, and Computers*, 2004,36(2):193-202.
- [9]Luo Xiaofei. Automatic Analysis of Syntactic Complexity i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2010(4):474-496.
- [10]Milton, J. & E. S. C. Tsang. A Corpus-Based Study of Logical Connectors in EFL Students' Writing: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G]// R. Pemberton & E. S. C. Tsang. *Studies in Lexis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nguage Centre*, 1993.
- [11]Salvatore S, Gelo O. & Gennaro A, et al. Looking at the Psychotherapy Process as an Intersubjective Dynamic of Meaning-Making: A Case Study with Discourse Flow Analysis[J]. *Journal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 2010,23(3):195-230.
- [12]鲍贵. 二语学习者作文词汇丰富性发展多纬度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08(5):123.
- [13]鲍贵. 英语学习者语言复杂性变化对比研究[J]. *现代外语*, 2010(33)2:166-175.
- [14]鲍贵. 不同课程水平英语学习者词汇复杂性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34(4):55-60.
- [15]邓耀臣,肖德法. 中国大学生英语虚化动词搭配型式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7):7-10.
- [16]丁言仁,戚焱. 词块运用于英语口语和写作水平的相关性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28)3:49-53.
- [17]杜慧颖,蔡金亭. 基于 Coh-Metrix 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议论文写作质量预测模型研究[J]. *现代外语*, 2013,36(3):293-300.

- [18] 桂诗春. 潜伏语义分析的理论及其应用[J]. 现代外语(1), 2003:76-84.
- [19] 何明珠. 中美大学生英语作文中无灵主语句使用情况对比分析[J]. 当代外语研究, 2013(4):32-37.
- [20] 李景泉, 蔡金亭. 中国学生英语写作中的冠词误用现象[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 24(6):58-62.
- [21] 梁茂成. 学习者书面语篇连贯性的研究[J]. 现代外语, 2006(3):284-292.
- [22] 马广惠. 中美大学生英语作文语言特征的对比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34(5):345-349.
- [23] 莫俊华. 中国学生在议论文写作中使用因果连接词的语料库研究[J]. 外语教学, 2005(5):52.
- [24] 潘璠, 冯跃进.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写作中连接词用法的语料库调查[J]. 现代外语, 2004(2):63.
- [25] 汪顺玉. 大学英语四级写作样卷的词汇复杂度分析[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23):6.
- [26] 王立非, 张岩. 基于语料库的大学生英语议论文中的语块使用模式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06(4):36-42.
- [27] 王立非, 张岩. 大学生英语议论文中疑问句式使用的特征[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29)1:43-47.
- [28] 文秋芳, 丁言仁, 王文宇. 中国大学生英语书面语中的口语化倾向——高水平英语学习者语料库对比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 35(4):268-274.
- [29] 徐盛桓. 第四范式:语言研究的新理念[J]. 英语研究, 2016(4):76-87.
- [30] 张艳, 陈记. 言语产出中词汇丰富性的定量测量方法外语测试与教学[J]. 外语测试与教学, 2012(3):34-40.
- [31] 赵蔚彬. 中国学生英语作文中逻辑连接词使用量化对比分析[J]. 外语教学, 2003(2):48.

责任编辑:朱晓云

美国少数民族青少年语言教育的新取向对语言测试的启示

彭康洲

(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 针对少数民族青少年的语言教育,美国开发了英语能力标准、测评及教师职业学习体系,推动了该国第二语言教育从学业语言到学业素养的转向,建构了完整的学业素养基本原理,形成了学业素养发展的语境、实践以及学习方法。这种新取向对于我国的语言测试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 多语青少年;学业语言;学业素养;语言测试

The Trend of Language Education for Ethnic Groups of American Adolescents and Its Implications

PENG Kangzhou

Abstract: WIDA in the United States developed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 Standards, together with assessment and professional learning for language education for ethnic groups, foster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language to academic literacies in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 constructed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academic literacies, and explored the contexts and practices for developing academic literacies. Such tendencies have clear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assessment in China.

Key words: multilingual adolescents; academic language; academic literacies; language assessment

目前国际语言教育研究特别关注儿童及青少年的学业语言发展和教育。“学业语言”(academic language)是儿童和青少年语言发展过程中所学习运用的一种特别

基金项目: 本文系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课题“认知语言学理论对制定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启示研究”(2012GX05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彭康洲,男,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后),硕导,重庆师范大学外语语言测评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英语教学和英语测试研究。

的语言能力(周兢等,2014:75-81),是在“学校教育中学生所用和教师教授学科内容知识所需的词汇、句法和语篇等语言知识”(Bailey & Huang, et al., 2011: 343-365)。早在2004年,美国威斯康星州公共教学部(Departm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联合美国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开发了针对美国英语学习者的学业语言能力标准及其相应的测评体系。负责该项目的机构WIDA联盟(WIDA Consortium)由最初的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特拉华州(Delaware)和阿肯色州(Arkansas)三个州发起,发展到目前的38个州。随着美国少数民族儿童和青少年(特别是西班牙语和亚洲人群)人数逐渐增加并在不久的将来取代美国白人成为社会劳力和学校生源的主力,这些英语学习者不仅需要学习语言,更需要用语言来学习学科知识,完成“双倍的任务”(Short & Fitzsimmons, 2007)。美国的英语学习者本身属于少数民族群体,因为1996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费尼(Jean S. Phinney)(1996: 918-927)将美国的少数民族界定为有色人种,即非欧洲血统的群体,主要包括非裔美国人、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国的美国人、拉美裔、土著美国人。因此,美国现今的少数民族青少年语言教育已经不是单纯的关注学业语言本身,而是拓展到了“学业素养”(Academic Literacy)。WIDA为此在2010年主办召开了“学业语言高层论坛”,专门讨论了当前美国多语青少年英语学习者面临的诸多问题。与会学者达成了学业语言构念及其对于学生特别是多语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学科知识重要性的认识,一致认为需要加强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青少年的素养发展研究。本文首先简要介绍WIDA开发的学业语言能力标准及其学业素养的转变,然后重点介绍WIDA项目在多元社会文化语境下的多语青少年学业素养发展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提出对我国语言测试实践的启示。

1. 学业语言和学业语言能力标准

学业语言最初来源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育研究学者卡明斯(Jim Cummins)教授(1980: 175-187)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能力的描述。他将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能力分成认知学业语言能力(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和基本的人际沟通技能(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ve Skills)。在他看来,基本的人际沟通技能容易获得,一般需要1-3年,而认知学业语言能力的具备需要漫长的时间,平均需要5-7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等教育研究专家安娜·查莫特教授(Ann Uhl Chamot)和学者迈克·奥马尼(J. Michael O'Malley)根据卡明斯教授的理论建构了适合美国少数民族儿童和青少年的认知学业语言学习方法(Anna & Michael, 1987: 227-249)。关于学业语言的界定,学界没有统一的术语,许多术语都有类似的含义,诸如教育的语言、学校的语言、学习的语言、科学的语言或者更加具体如学业英语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学业语言一定指“在学校、写作、公众场合等正式的环境中使用的语言”(Catherine, Paola, 2009: 112-133),和日常语言有所差异(Snow & Uccelli, 2009)。随着美国在2001年颁布并于2002年实施了《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美国少数民族儿童语言教育的关注点开始从日常语言转向学业语言,以保证这些学生在学业上取得和母语学生一样的成就(Bailey, 2007: 1-26)。为此,少数民族儿童的语言教育需要学业语言能力标准及测评体系来指导和监控。

随后,美国教育部于2002年在全国招标,开发高质量的学业成就测评体系,如前所述,美国威斯康星州公共教学部联合美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成功申报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发展项目。2004年WIDA英语能力标准颁布,2005年WIDA总部迁址到威斯康星大学下属的威斯康星教育研究中心。到目前为止,WIDA开发了英语发展标准的完整版(2012),英语能力分级测试(Measure of Developing English Language,简称MODEL)以及年度英语能力测试(Assessing Comprehens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State-to-State for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简称ACCESS)。英语能力标准和测评覆盖基础教育全学段,分为交际和教学语言、文科语言、数学语言、理科语言和社会科学语言等五个模块。整体而已,英语发展标准要求英语学习者在以上五个领域中能够交流信息、思想、概念(Boals, et al., 2015: 122-164)。除了语言能力标准和测评体系,WIDA还建立了教师职业学习和研究体系。职业学习体系包括定期举办职业发展工作坊、短期研讨会、职业发展培训师培训、区教委校领导培训、WIDA年度全国会议、教师资源库、在线职业学习、职前教师课程等等。研究体系包括学业语言、标准、职业学习、政策以及标准和测试匹配等研究。学业语言能力标准及全方位的服务体系推动了美国少数民族儿童语言教育的质量。

但是,在实践中,一些教育工作者仅仅关注这些儿童在学习内容知识中的语言问题,忽视了内容和语言结合生成的意义问题。教师们对学业语言和教学方法的认识不正确(Alvarez, 2013: 32-52),忽视了这些多语学生本身的语言资源、文化价值观、社会环境等对英语学习的促进作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多语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提升不甚理想,在某些州,许多少数民族儿童的学习成绩无法达到英语本族语学生的水平,甚至这些儿童的学业成绩有逐年下降的趋势(Kathy, 2015: 210-227)。为此,WIDA在2010年召集国内的诸多学者协商美国社会少数民族青少年的语言教育问题,经过五年的努力,提出了从学业语言教育向学业素养教育转向的研究和实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 学业素养:基本原理及其构成

学业素养中的“素养”不是指当前大多数教育实践中的读和写的学习及其相关领域的学习如听、说,也不是指特殊的含义,如学业素养是“文化实践”(Geisler, 1994: xii)。本文所说的素养指“情境化的意义生成实践,或许会涉及语言的四个技能领域,也会涉及其他模态,因此,素养学习包含了语言学习(Molle, 2015: 13-32)。丹妮拉·莫里博士(Daniella Molle)认为,经过五年的努力,参与2010年高层论坛的学者对于学业素养的基本构成达成了共识。学者们认为可以从六个角度来培养多元文化社会

中的多语青少年的学业素养(图1):①多语语言能力关注学生自身的语言和文化资源对于学业素养实践的重要性;②社会规范、角色、身份和关系强调学习的社会性特征;③学科概念和问题强调学生通过学业素养实践学习内容知识和技能;④智力挑战指青少年学生必须在从事学业素养实践中有机会发展高层次思维技能(包括推理或下结论、质疑、发现关系或者联系、知识迁移或运用);⑤多模态的相互作用指在知识产出的过程中语言和其他模态相互作用;⑥批判理解指学生在多大程度上有机会将自己的内容学习和语言学习与特定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可以是历史、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层面。丹妮拉·莫里博士认为学业语言在此框架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业语言发展是素养实践的一个视角,二是学业语言能够促进学生在其他学业素养的学习和参与。



图1 探究多文化、多语学生学业实践的视角

资料来源: Molle, Daniella. Academic language and academic literacies [G] // Daniella Molle, Edynn Sato, Timothy Boals & Carol A. Hedgspeth (eds.). *Multilingual Learners and Academic Literacies: Sociocultural Contexts of Literacy Development in Adolescents*.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3-32.

具有情境化、动态性和多层面特征的学业素养理念在实证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和支持。美国太平洋教育学习中心玛丽琳·娄博士(Marylin Low)(2015: 33-52)认为学生身边的学业素养是鲜活的语篇。她选取了一所太平洋小岛地区的英语课堂中的五个学生会话案例,来考察学业素养发展的情况。这个地方有比较浓厚的口语传统,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岛上居民外来者居多,语言混杂。英语不是大多数教师和青少年的母语,但是学生被要求学习两种或者更多的语言。她的研究表明,学业素养发展应该和学生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调动学生的母语所存储的语言资源,让学生有机会去发现新颖的、有意义的表达形式来表现自我。学校教育必须注重学生自身语言资源,尤其是学生的口头语言实践这种认识得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第二

语言能力测评专家阿里申·贝莉教授(Alison Bailey)和移民儿童教育研究学者玛叶莉·奥尔兰纳教授(Majorie F. Orellana)的回应。两位作者认为少数民族青少年在单一语言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可能会经历两种关键的语言转换实践——语码转换和语言经纪(language brokering)。这两种语言转换策略的学习应该在课堂中得到足够的重视,教学活动必须帮助学生识别学业素养技能和日常交际技能的相似点,如受众、语篇、环境、关于语言形式的取舍等。多语语境下青少年的日常语言体验应该得到重视,“把多语现象看做是正常的实践,认可并支持语言转换,并且使用学生的语言资源来促进素养的全面发展”(Alison, Bailey, 2015: 53-74)。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育系数学教育研究专家莫斯科维奇教授(Judit Moschkovich) (2015: 75-104)探讨了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数学学业素养(Academic Literacy in Mathematics, 简称 ALM)。笔者认为 ALM 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数学能力、数学实践和数学话语,并以一道应用题的解答方法及其活动记录分析为例阐明了数学学业素养的情境化特征。在这样的活动中,学生不仅相互协商,找寻单词和短语在具体情景(如学生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及话语分析视角)中的意义,而且利用了多种资源,如交际的模式、符号系统以及日常和学业语域的语言等等来完成学科任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院约瑟·里兹拉贾教授(José R. Lizárraga)、格林达·胡尔教授(Glynda A. Hull)、约翰·司各特教授(John Scott) (2015: 105-131)分析了社交媒体时代的跨语际素养(Translingual Literacies),认为“基本的素养应该包括跨语言、跨模态、跨呈现形式的实践,这些实践包括了多语码、多渠道、多表征系统对话篇进行的创造、协商、转换、分享等活动”。研究者以美国一所多语学校学生(这些学生讲西班牙语、英语和西式英语)和位于墨西哥的美国国际学校的学生通过在线交流的语料来解释参与者如何根据权威和亲密程度使用多样化的英语、西班牙语以及混合代码的情况。该研究表明了社交媒体时代学业素养的概念需要进行拓展,除了常见的复杂语言模式和混合策略以外,拓展还可以通过跨模态的作品(如微视频)来进行。以上这些实证研究表明学业素养的六个维度是相互联系的,在不同的教育语境下可以侧重培养和发展其中一种或者两种素养能力,这些能力反过来也会促进其他能力的发展。

3. 学业素养发展:语境和实践

那么,什么样的语境和实践能够促进少数民族青少年学业素养的发展?这些语境和实践具备何种特征?WIDA 项目的三位研究者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发现了能够促进多语青少年学业发展的语境和实践特征。

其一,素养实践要具有参与性、合作性、指导性和衔接性。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系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学者玛丽安娜·帕切科教授(Mariana Pacheco) (2015)跟踪研究了双语(多语)青少年在课后从事各种素养活动的情况,如课堂活动、青少年报刊编辑、家庭作业和脸谱(Facebook)活动等等,并记录了不同人

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情况下的学生获得的帮助、指导和支持等(Mariana, 2015: 135 - 165)。该研究表明了同伴、政策、文化社团、社会机构在素养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课后实践的参与性体现在界定明确的话语类型、参与结构、学习目标和语言。课后实践的指导性不仅体现在要有明确的帮助、指导和支持策略,而且需要通过研究学生在完成课后活动如家庭作业时采用的问题解决策略和方法,从而帮助学生拓展获取内容知识的资源。衔接性指教师需要帮助学生在不同场合、社会机构和语境下从事的各种实践、采取的各种策略、扮演的各种角色、承担的各种责任和采用的各种学习方法与学校的学习任务联系起来,从而加深学生的知识深度。

其二,素养实践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业话语(Academic Discourses),倾听学生的声音,认可学生的强项。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系凯瑟琳·康普顿博士(Cathy Compton-Lyly)(2015)跟踪十年调查了一位来自低收入家庭、母语为英语的非裔美国学生,试图分析长时期内意义和学习者自我的建构(Cathy, 2015: 166 - 182)。作者采用的研究手段包括访谈、实地考察、学生的成长记录袋、课堂测验、课堂讨论录像、写作、多模态的反思文本(如学生的照片、日记、绘画、录音等)。她的研究表明学业素养的习得不是简单地掌握词汇或者句法和体裁相关的学术规范,而是要求学生从事并接受和素养相关的学业话语,并且需要倾听学生的声音,认可学生的强项。学业素养的发展跟长期的学校教育以及评判标准密不可分。

其三,素养实践要具有探究性和多模态特征。美国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洛拉·莱特博士(Laura Wright)(2015)基于一所多样化的初中科学课堂的视频分析了八年级两名双语拉丁裔学生的学业素养实践,发现了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学不好的原因。她的研究表明这两名学生可能无法理解转换性质的多模态过程,导致他们在单元测验中无法有效地呈现自己的知识。莱特指出,把学业素养发展看做是多模态的社会实践有助于突显学生使用和掌握符号系统,也会对如何帮助双语学生,尤其是二语能力弱的双语学生(emergent bilingual students)学习好科学课程提供思路。莱特强调:“很难通过语言测试出二语能力弱的双语学生的科学内容知识,因为目前的测试形式更多地看重字母素养(alphabetic literacy)而非科学素养,这就使得本来就在阅读、写作和语言使用等方面存在困难的学生处于不利地位。”(Laura, 2015: 183 - 209)所以,仅仅通过语言形式来测量所有学生的概念性理解是很困难的。

4. 学业素养方法论视野下的学习

学业素养发展的动态化和情境化特征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在考试开发、教师职业发展、课程标准实施和政策制定等各个方面采用新的视野,促进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学业素养发展。

首先,小学和初中教育必须提供给少数民族学生足够的学习机会。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教育平等和多样化研究专家凯瑟·厄斯卡米拉教授(Cathy Escamilla)

(2015)审视了在现有的情况下英语学习者必须获得什么样的机会才能习得学业素养。学习的机会指“教师的质量、课程学习、最佳教学法的使用、先进的教学设施和物质资源”。作者选取了一名学生在校五年的基本情况和受教育的经历,呈现了美国公立学校英语学习者必须获得学业素养所面临的机会有限问题。她指出,目前的许多英语学习者学习机会受限,主要原因在于教育者对于学业语言和素养的错误认识,比如许多教师认为“为了发展学业素养,学生必须先获得基本素养技能(如使用正确的单词拼写、写作规范和标准的英语等)”(Kathy, 2015: 210 - 227)。为此,作者指出一个健全的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小学素养课程应该包括口头语言、阅读、写作和元语言,且这四个内容必须保持均衡。初中的英语学习者既需要发展语言,又需要发展素养,更需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其次,教学和考试实践必须与当前的学习理论和认知理论接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第二语言形成性评估研究专家玛格丽特·荷李特基(Margaret Heritage)教授(2015: 231 - 254)认为目前的美国教学和考试实践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教师采用过时的教学法,无法使得学生在当今社会中为取得成功而准备。目前的考试让学生过度地关注离散的知识点,而不是深度的相互联系的学习(deep learning),并且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无法测量学生对内容领域的表现。为了克服以上不足,她认为学业素养的测试需要这样的测试任务:①从与当前内容领域的语言学习和使用理论相吻合的学习理论中来开发;②充分地抽样充分地表征习得学业素养的内涵;③多渠道收集证据,提升推论的有效性;④提倡有效教学(effective pedagogy)。

建构跨学科职业学业框架,整合内容知识和语言知识。2015年迈阿密大学教育学院玛丽·艾娃罗斯教授(Mary A. Avalos)、洛约拉大学马里兰教育学院玛贾丽塔·哲思伯贾教授(Margarita Zisselsberger)、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数学教育研究专家詹尼·朗贾-奥申教授(Jennifer Langer-Osun)、迈阿密大学瓦特·瑟卡达教授(Walter Secada)设计并实施了一个跨学科的职业学习课程,用于教授市区学校的 ELLs 教师(Avalos, 2015: 255 - 276)。在这四名研究者中,语言教师和数学教师各两名。研究者吸收了多种学业语言和素养的定义,同时采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方法来实施显性语言教学,对 ELLs 提供帮助。他们指出,设计跨学科的 ELLs 教师职业学业课程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如学科的理论视角、教师中意的教学内容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和教学语言知识(pedagogical language knowledge),以及教师个人对于 ELLs 的信念/愿景、动机、反思、知识和实践。

开发促进学业素养学习的内容标准。培生集团厄丁·萨陀博士(Edynn Sato)(2015)从方法论视角探讨内容标准的开发如何促进学业素养的学习。萨陀博士认为现有的素养概念需要跳出传统的读写能力范畴,更好地反映出当前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学业素养和学业内容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如果需要融合的话,我们需要重新界定什么是能力,“保持两个领域的能力概念的协调性,这样,学生在学业素养方面展现

出来的能力表现就会和学业内容标准方面展现出来的能力表现有正相关关系”(Sato, 2015: 277-290)。

最后,正确的政策和不断的科学研究。WIDA 总裁提姆·鲍瓦斯博士(Timothy Boals)、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研究专家肯吉·哈库塔教授(Kenji Hakuta)和威斯康星教育研究中心艾丽莎·布莱尔博士(Alicia Blair)(2015)讨论了美国政策和课程的实施历史和现状,呼吁各方重视英语学习者教育中的各种错误做法(Timothy, 2015: 291-308)。他提出了以下四个研究思路: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母语和文化在测试实践中的地位有利于考试和双语教育中更加突显学生的内容知识;重视语言发展的持续性、多样化、差异性本质;重视教学和测评中语言和内容间联系的紧密性;重视教师的职前训练和职后发展。

5. 对美国少数民族青少年语言教育的评价及其对我国语言教育的启示

综上所述,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各州需要采用年度评估衡量学生进步,这让美国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教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这些学生通常都是双语或者多语学生,其语言教育的教学方法和测评实践和母语学生肯定是不一样的。如何提升和监控这些学生的语言教育就成为 WIDA15 年来的研究和发展历程。回顾美国少数民族青少年语言教育从学业语言转向学业素养的历程,不难发现正确认识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及其发展阶段对于推动第二语言学生的学业语言发展和学业素养发展非常重要。其中,卡明斯教授关于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能力的认识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WIDA 开发的基础教育英语学习者英语能力标准成为指导少数民族儿童和青少年语言教育的纲领,美国对外英语教学协会(TESOL)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行业标准(TESOL, 2015-12-14),影响着世界各地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另外,美国少数民族青少年语言教育的发展是跨学科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 WIDA 项目的学者们看来,学业素养的培养和发展不能仅仅看做是语言教师的任务,每一位教师都是语言教师,都有责任培养学生的素养。我们实地考察了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森内特初中(Ray F. Sennett Middle School)的数学课堂,教授数学课的教师不仅有明确的数学内容目标,而且还有明确的语言目标。最后,美国少数民族青少年的语言教育非常重视多语学生自身的财富、贡献和潜力。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学业语言到学业素养的转向可以看出,同时,也是 WIDA 的理念。在我们考察的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范海斯小学(Van Hise Elementary School),白人学生比例为 58%,其余的学生由非裔美国人(7%)、多种族人群(10%)、西班牙裔(5%)、亚洲人(20%)组成。从幼儿园到小学,在少数民族较多的班级都配有两名语言教师,母语教师和 ESL 教师。其中,母语教师基本是全科教师,主要负责学生的语言课程、数学课程以及文、理科知识的传授。每一堂课 2/3 的时间由母语教师授课,剩下的时间由 ESL 教师针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答疑,交流的语言为学生的母

语。在每天的固定时段,ESL 教师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专门辅导,解决阅读和数学课中遇到的问题。此外,学校的各种宣传和活动等信息都体现了多语社会文化特征。与此同时,学校要求学生家长在指导孩子阅读活动时,鼓励小孩用自己的母语从事复述、答疑等活动。总之,学生自身的母语文化等财富、贡献和潜力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语言教育的学业素养转向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对于我国的语言测试(无论是母语测试还是外语测试)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启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的考试而言,多语能力是新时期少数民族人才资源的优势所在,在教育中需要重视少数民族自身语言文化和社会特征,充分调动少数民族儿童和青少年的民族语言、汉语和外语三种语言之间的学习潜力,考试内容应该从日常语言能力的目标转向认知学术语言能力上来。在强调国家认同和共同价值观的背景下,不仅要强化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育,更应该跳出现有的语言能力培养目标框架,关注学生的整体学业成就。我们建议民族语文教育的测评不仅需要重点考核民族学生口头语的表达,更应该发挥其口头语文化的优势,多角度地推动学业素养的发展。

(2)对于整个语言教育而言,无论是语文教育、外语教育还是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我们认为目前需要改进评价方法。因为考试本身是学习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促进或者限制学习及学习的机会。其一,植根于学业素养视角的测试应该认可学习的情境化特征,允许学生合作或者独立解决问题,鼓励多种语言的使用,并且把语言能力看做是依附于语境的。其二,改变现有语言和内容学习各地为阵的做法,因为语言和内容只是多层面学业素养的两个方面而已。其三,从语言的多模态视角改变测试所依赖的语言能力理论,因为当前的许多语言测试没有反映先进的语言观——语言不仅指字词,而且也包括符号和图形表征,这限制了我们对于语言能力的认识,无法让学生发展字母素养以外的素养发展。

最后,加强外语考试本土化研究。由于美国少数民族教育主要针对外来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一需求,因此教育和考试本身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即成为美国公民。那么,我国的民族教育考试内容同样需要在重视国家团结和统一的战略下,保持民族语言和文化遗产的同时,加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容,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不仅如此,我们目前正在开发的国家外语能力等级量表和外语能力等级考试都需要注重外语考试内容的本土化。目前,香港和台湾地区本土化外语考试的开发值得我们借鉴。总而言之,我国未来的各种外语考试应该努力保持本国语言和文化与外国语言和文化内容的平衡,在传播本国文化和学习外国文化的博弈之间保持平衡。

参考文献:

- [1] Alvarez, L. Reconsidering Academic Language in Practice: The Demands of Spanish Expository

- Reading and Students' Bilingual Resources [J]. *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2013 (1): 32-52.
- [2] Avalos, et al.. *Building Teacher Knowledge of Academic Literacy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Framework for Teachers' Cross-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 Learning* [G] // D. Molle, E. Sato, T. Boals & C. A. Hedgspeth.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3] Bailey, A. L. Introduction: Teaching and Assessing Students Learning English in School [M] // A. L. Bailey. *The Language Demands of School: Putting Academic English to the Tes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26.
- [4] Bailey, A. L. & B. H. Huang. Do Current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Proficiency Standards Reflect Needed for Success in School? [J]. *Language Testing*, 2011, (3): 343-365.
- [5] Bailey, A. & M. F. Orellana.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nd Everyday Language Practices: Implications for the Academic Literacy of Multilingual Learners* [M] // D. Molle, E. Sato, T. Boals & C. A. Hedgspeth.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6] Boals, T., D. M. Kenyon, A. Blair, M. E. Cranley, C. Wilmes & L. J. Wright. Transformation in K-12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Assessment: Changing Contexts, Changing constructs [J].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2015, 39(1): 122-164.
- [7] Boals, T., K. Hakuta & A. Blair. *Literacy Development in Academic Contexts for Adolescent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Policy Consider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G] // D. Molle, E. Sato, T. Boals & C. A. Hedgspeth.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8] Chamot, A. U. & J. M. O'Malley. The 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Learning Approach: A Bridge to the Mainstream [J]. *TESOL Quarterly*, 1987(2): 227-249.
- [9] Compton-Lyly, C. *Academic Literacy Development: A Ten-Year Case Study of an Aspiring Writer* [M] // D. Molle, E. Sato, T. Boals & C. A. Hedgspeth.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0] Cummins, J. The Cross-lingual Dimensions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Implications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the Optimal Age Issue [J]. *TESOL Quarterly*, 1980(2): 175-187.
- [11] Escamilla, K. *Schooling Begins before Adolescent: The Case of Manuel and Limited Opportunity to Learn* [G] // D. Molle, E. Sato, T. Boals & C. A. Hedgspeth.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2] Geisler, C. *Academic Literacy and the Nature of Expertise: Reading, Writing and Knowing in Academic Philosophy* [M]. Hillsdal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4.
- [13] Heritage, M. *The Use of Assessment in Suppo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Academic Literacies* [G] // D. Molle, E. Sato, T. Boals & C. A. Hedgspeth.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4] Lizarraga, J. R., G. A. Hull, & J. M. Scott. *Translingual Literacies in Asoial Media Age: Lessons Learned from Youth's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Online* [G] // D. Molle, E. Sato, T. Boals & C. A. Hedgspeth.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5] Low, M. *In More Than One Tongue: Academic Literacies at Work as Living Texts* [M] // D. Molle, E. Sato, T. Boals & C. A. Hedgspeth.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6] Molle, D. Academic Language and Academic Literacies [G] // D. Molle, E. Sato, T. Boals & C. A. Hedgspeth. *Multilingual Learners and Academic Literacies: Sociocultural Contexts of Literacy Development in Adolescents*.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7] Moschkovich, J. A.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 to Academic Literacy in Mathematics for Adolescent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Integrating Mathematical Proficiency, Practices, and Discourse* [G] // D. Molle, E. Sato, T. Boals & C. A. Hedgspeth.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8] Pacheco, M. *Bilingualism-As-Participation: Examining Adolescents' Bi (multi) lingual Literacies Across Out-of-School and Online Context* [G] // D. Molle, E. Sato, T. Boals & C. A. Hedgspeth.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9] Phinney, J. S. When We Talk about American Ethnic Groups, What Do We Mean?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6(9): 918-927.
- [20] Sato, E. *Establishing a Foundation for Academic Literacy: The Role of Standards* [G] // D. Molle, E. Sato, T. Boals & C. A. Hedgspeth.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21] Short, D. J. & S. Fitzsimmons. Double the Work: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to Acquiring Language and Academic Literacy for Adolescent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A Report to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R]. Washington, DC: Alliance for Excellent Education, 2007.
- [22] Snow, C. & P. Uccelli. The Challenge of Academic Language [G] // D. R. Olson & N. Torrance.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ite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23] TESOL. TESOL Pre-K-12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Standards Framework [EB/OL]. http://www.tesol.org/docs/books/bk_prek-12elpstandards_framework_318.pdf. 2015-12-14.
- [24] Wright, L. *Inquire to Acquire: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Bilingual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Literacy* [G] // D. Molle, E. Sato, T. Boals & C. A. Hedgspeth.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责任编辑:路小明

“效度”理论对翻译测试的呼唤

席仲恩

(重庆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65)

摘要:作为教育和心理测试的一种应用形式,翻译测试应该对现行“效度”理论的呼唤作出必要的回应,即翻译测试的主办方最少应该就内容、反应过程、内部结构、与其他变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实施后果,采集并举出有关的证据,从而使测试分数的意义透明化,使测试结果可用。

关键词:效度;效验;翻译测试;语言测试

Validity's Call to Action for Translation Testing

Xi Zhong'en

Abstract: As an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 translation testing should answer the calls of current validity theory. That is to validate or provide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e proposed uses of a translation testing program within the validation framework of current test theory. To make the meaning of test scores transparent and hence the result of a testing program usable, translation test makers should at least provide evidence with respect to content, response process, internal structure, relations to other variables and consequences.

Key words: validity; validation; translation testing; language testing

0. 引子

作为一种语际转换技能,翻译虽被排在听、说、读、写之后,但它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却毋庸置疑。近年来,一方面应国内翻译专业地位确立的要求,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各种口译证书考试的展开,翻译测试在备受国际语言测试^①界冷遇的背景下,悄悄地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课题“美国《教育和心理测试标准》视角下的中国英语高考研究”(SKZ09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席仲恩,男,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导,主要从事语言测试、学术翻译和学术技术写作研究。

进入了国内翻译教学研究者的视野。其主要标志是海芳女士(2004)和穆雷女士关于翻译测试的两篇博士论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指导出的一系列关于口译评估硕士论文,特别是蔡小红博士等关于口译评估的系列论文(蔡小红,2003,2005;蔡小红、方凡泉,2003;蔡小红、曾洁仪,2004)和穆雷博士关于翻译测试的系列论文(穆雷,2000,2006 a,2006 b,2006c,2007)。这些关于翻译测试的讨论以及其他关于口译证书测试的讨论(蔡啸,2009;黄晓佳、王建国,2009),基本上都是从翻译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的角度进行的。尽管这些讨论对于我们认识翻译测试的本质和过程都非常重要,但是,翻译测试毕竟是翻译和测试两个专业的有机结合,而且即使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属于测试,至少也是在同等程度上属于测试。因此,对于翻译测试问题的研究既需要从翻译教学研究和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展开,也需要沿教育和心理测试学的角度透视。任何测试学缺位的翻译测试研究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健全的翻译测试研究。

为了使翻译测试研究不至于长期处于测试学缺位的状态,本文拟从一个测试理论工作者的角度谈一下教育测量理论中的“效度”理论对翻译测试工作的具体要求或者呼唤,期望对我国的翻译测试建设有一定借鉴作用,也期望所提问题能得到国内关心翻译测试的同仁的关注,所发出的呼唤得到国内翻译测试实践界的响应,更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1. 翻译测试与教育和心理测试

在讨论“效度”理论对翻译测试的要求或呼唤之前,我们应该先理清翻译测试与教育和心理测试之间的关系^②。

一切关于人的能力以及能力表现的测试都是心理测试,心理测试的目标是获取心理量(与物理量互补)的值,然后再根据这个值的获取情况对接受测试者进行统计决策。心理测试在教育情景中的应用特称教育测试,在大多数情况下,业内人士把教育测试叫教育测量(Brennan,2006)。显然,翻译能力(包括语际翻译能力和语内翻译能力)是人类的一种特有能力和行为表现,也是人类的行为表现,这两个量都是心理量,所以,翻译测试应该是心理测试的一个应用部门,教学过程中的翻译测试应该是教育测试的一个应用部门。换句话说,翻译测试是教育和心理测试基本原理在翻译学中的应用。更具体地说,翻译测试从教育和心理测试中获得测试原理和方法,从翻译教学、翻译教学研究以及社会对翻译人才的具体能力要求中获得测试内容。

在翻译测试中应用教育和心理测试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在翻译测试实践中接受这些基本原理的约束,按照这些基本原理的要求开展测试工作,此外,还要根据这些基本原理的要求评价具体翻译测试工作的成败。要在翻译测试实践中应用教育和心理测试学的基本原理,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些原理的外延和具体内涵。效度理论既是教育和心理测试学中的统领理论和原则(其他基本理论还有信度理论、等值理论、项目分析理论等),也是最为成熟的理论和原则之一,它贯穿测试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

因此,我们应该首先了解效度理论以及它对我们翻译测试工作的要求。

2. 现行效度理论的外延和内涵

纵观教育和心理测试一百多年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效度理论在本学科中的地位已经由起初的不起眼位置上升为统帅位置^③。就取得的成就和获得学界的共识程度而言,效度方面的成果也是最为成熟的。

起初,效度被当作测量结果所能代表或者预测待测量的程度,自1980年代之后,效度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后,效度的实质稳定了下来。现在,效度指的是关于从哪些方面对一项测试进行效验的框架理论,主要是关于测试的发起方对测试应该负什么具体责任,测试的实施方应该对测试结果的解释提供哪些方面的支撑材料等。效度理论和原则是在效验的过程中落实的,是以效验的方式落实的。

效验是一个论证过程(Kane,2006),是从各个方面根据效度理论的一般要求和具体测试项目的实际,采集有关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以支撑测试结果的解释和使用,一方面使测试结果可用,另一方面防止或减少测试的误用和滥用。支撑材料不仅应该归档,而且应该适当公开,材料的收集过程也应该足够透明,从而使有资质的测试使用者能够进行知情决策。考虑到篇幅的限制,本文根据现行美国行业标准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1999),即《教育和心理测试标准》(第5版)(下称《标准》)的第一章,介绍证据收集通常考虑的五个方面,即内容、反应过程、内部结构、与其他变素之间的关系以及项目实施的后果。对其他方面证据和证据归档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 Downing 及 Haladyna(2006)。

2.1 基于内容的证据

基于内容的证据主要关于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所测试的内容是否充分代表了欲测量目标的全部,另一个是测试内容相对于所提议测试结果的使用或分数解释是否合适。测试的内容包括试卷的主题、题目的形式和措辞、要求受测所完成的测试任务和评分程序等(《标准》,1999:11;席仲恩,2005:195),其中的评分程序主要包括评分标准的制定。对于翻译测试而言,评分标准的制定过程以及具体落实情况都需要效验和归档,因为,对于这类测试情景,测试任务和评分标准都是测量工具的核心内容。

采集基于内容的证据时,可采用逻辑分析法、实证研究法或者专家判断法(席仲恩,2005:196),其中的专家判断法分试卷开发过程中的事中判断和试卷开发完以后的事后判断(Popham,1990:98)。这里的专家是广义上的相关学科内容专家。对于翻译测试而言,应该是有一定翻译经验或翻译教学和研究经验的翻译理论、翻译教学或翻译实践工作者。

基于内容的证据对于选择测试和分数解释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教学过程中的诊断性测试。因为,对于这一种测试,测试内容往往就是课程目标,测试的目的是

为教学提供反馈信息。试想,如果一项测试的内容和教学目标不匹配,这项测试的结果怎能为教学提供准确的反馈信息,好让教学人员弥补教学中的具体不足呢?

2.2 基于反应过程的证据

反应过程是一个心理过程,通常包括受测答题时的心理反应过程和评分员评分时的心理反应过程。前者可以提供关于测试所关注的心理构建和测试过程中受测的实际心理过程之间的吻合程度的信息,后者可以提供关于评分标准落实情况的信息(《标准》,1999:12;席仲恩,2005:198)。对于根据受测在测试条件下完成特定翻译任务的情况来推断受测在非测试条件下完成同类翻译任务的情况的翻译测试而言,后者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缺乏测量工具核心部分在测量过程中工作情况的证据,测量结果或考试分数将失去意义,测量结果的有效使用就无从谈起。

显然,访谈法和过程跟踪法或示踪法是可行的采集基于反应过程证据的方法,其中的跟踪或示踪法可以通过现代跟踪或示踪仪器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出声思维法来完成。

基于反应过程证据的用途主要有四种:①发现研究问题,圈定问题范围,确定进一步研究的对象;②帮助试卷研发人员确切定义测量目标或及时修订测试任务,从而使试卷所声称的测量目标和实际测量目标更好地啮合;③用来制定或修订评分标准,确定或修订评分员培训方案和培训内容;④帮助分数解释和基于分数的推断或决策。(席仲恩,2005:199)

2.3 基于内部结构的证据

内部结构方面的证据是关于测量目标维度的证据。一份试卷可以测量一个维度,也可以同时测量多个维度。在设计试卷或测试项目时,通常把测量同一个维度的测试任务编入同一份试卷或者子卷(subtest),这样,一方面便于分数的得出和分数得出过程的透明化,另一方面便于提高测试的效率。内部结构方面证据的内容通常涉及为什么要测试特定维度的理据,以及具体试卷实际所测量的维度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和期望测量的维度一致。对于一份多维度的试卷,通常希望构成同一维度的子卷的题目尽量同质,同时也希望构成不同子卷的题目尽量异质。

就翻译测试而言,基于内部结构的证据和采集证据的方法取决于测量结果的具体使用。例如,对于翻译证书考试,科技英语翻译证书考试试卷的结构就不应该等同于一般日常生活翻译证书考试的结构。

和其他证据一样,基于内部结构的证据也是分数有效解释或使用的必要条件。此外,这方面的证据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项目的差异功能现象(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即一个项目对于几组不同背景的同水平的受测表现出不同的困难程度。采集内部结构证据的统计方法比较复杂,经常要涉及因素分析(其中包括探索性因素分析和确证性因素分析)或者更复杂的统计技术——结构方程建模。

2.4 基于与其他变素关系的证据

根据《标准》,其他变素指的是外部变素,它可以是效验测试所欲预测的准则,也

可以是另外一些测量程序的测量结果。这些测量程序有些与欲测目标一致,有些则是关于其他测量目标的。基于与其他变素关系的证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一个方面是关于收敛性和区别性的证据,另一个方面是关于与准则之间关系的证据。

2.4.1 收敛性和区别性证据

对于同一组受考,他们在关于同一个测量目标上的不同测量程序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关于待效验程序的收敛性证据,而他们在关于不同测量目标上的测量结果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关于待效验程序的区别性证据。显然,在“不同测量程序”或者不同测量结果之中,必须包括待效验程序或待效验程序的测量结果。例如,如果大量的研究表明,英语听力理解表现与英译汉交传表现密切正向相关,我们就有理由期望,对于任何一组受考,他们的听力理解成绩越高,交传表现成绩也越高。假如我们的这个期望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关于待效验交传测试的收敛性证据。

可见,这里的收敛关系是指两个变量之间此高彼也高或者此低彼也低的关系。相比之下,区别关系则是两个变量之间此高彼不高或者此低彼也不低的关系,关于变量间这种期望关系的经验证据就是区别性证据。例如,翻译能力不是朝夕之间就可以显著提高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期望,一组好的翻译能力测试题目,其考前辅导效应(coaching effect)应该不显著。如果经验证据支持我们的期望,我们就获得了关于由这组翻译题目组成的翻译测试的区别性证据;如果经验数据显示,测试题目有显著的考前辅导效应,那么,我们就未能获得必要的有关区别性证据。

不难看出,收敛性证据和区别性证据是从两个相反的方向保障测量目标的不被偏离的。换个说法,收敛性证据所保障的是:该测试测量的是这个目标;区别性证据保障的是:该测试测量的不是那个或那些目标。

2.4.2 与准则关系的证据

这指的是受考的测试分数与准则分数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受考在所研发的测试上的分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预测他们在准则上的分数。这个准则既可能是我们所关心的最终测量目标,也可能是其他已经确立的测试。这里的程度取决于我们要根据测试结果做什么决策(《标准》,1999:14)。

传统上,测试分数与准则分数之间的关系有历时和共时两种。所谓历时关系是指,受考当下的测试成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或者以一定的概率预测他们在未来翻译实践中的翻译绩效。所谓共时关系是指,受考当下的测试成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或者以一定的概率预测他们当下在翻译实践中的翻译绩效。显见,对于招生考试,历时关系是我们所关心的,但对于证书考试,共时关系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前与准则关系的证据是通过相关法采集的,证据也是用相关系数表示的。但是,根据现行《标准》,回归方程比相关系数更为有用。这一点是显

而易见的,因为回归方程原本就是用来进行预测的,即表示预测关系的,而相关系数则是用来表示协变关系的(席仲恩,2005:204)。

2.4.3 与准则关系证据的可推广性

为了便于操作且保障测试结果的可比性,测试通常是在高度标准化的条件下进行的。可是,测试的真正目标却存在于复杂多变的非标准化环境之中,因此,与准则关系证据的可推广性就非常重要(《标准》,1999:15)。

通常,关于可推广性的研究是关于相关研究的研究,这种研究所用的统计方法是综分析法(meta-analysis)。值得指出的是,可推广性的研究性质,决定了它的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往研究的质量和累积效应。诚然,可推广性研究可以为把此情景下的测试结果推广到彼情景之中提供证据,但是,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是很难得到的,这就限制了测试结果推广的程度(《标准》,1999:16)。

翻译,特别是笔译,通常需要使用大量的工具书,但翻译测试中一般不允许受测使用任何的工具书。如何根据不使用工具书条件下的翻译表现预测使用工具书条件下的翻译表现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可推广性问题,这同时也是一个经验性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因此,需要用实在的证据来回答。

2.5 基于测试实施后果的证据

测试后果就是一个测试项目实施之后对测试有关方面产生的影响。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有我们期望发生的,也有我们不希望发生的;有些是我们意料中要发生的,有些是在我们意料之外发生的。严格地说,测试的实施后果指的是由于测试结果的使用而产生的社会效果。实施一项测试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叫测试的“反波效应”(backwash)^④。

对于为科学研究采集数据为目的的翻译测试,基于测试实施后果的证据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对于以人才选拔和资格认证为目的的翻译测试,其实施后果的证据就非常重要了。因为,我们实施一项这样的翻译测试,除了提供一项新的社会服务之外,通常还希望通过提供这项社会服务而产生一定的良性社会效果,甚至消除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从而使一定的社会或社团受益。鉴于证书考试的直接社会效用性,效验一项翻译证书测试时,可先从实施后果的证据开始。Bachman 及 Palmer (Forthcoming)甚至提议,对于一般语言测试,效验的程序应该掉过头来,从测试的使用效果开始。

基于测试实施后果的证据,就是通过实施这项翻译测试,我们期望产生的影响产生了,我们不期望产生的影响没有产生的经验证据。为了收集后果的证据,测试主办方或者开发方必须首先毫不含糊、毫无掩饰地向测试其他方说明,哪些使用是经过效验的,因而是合适的,是主办方或开发方所推荐的;哪些使用是没有经过主办方效验的,是没有理论依据的,因而不合适的,是主办方或开发方所不推荐的,甚至是反对的。例如,对于一项口译翻译证书测试结果,一般是不宜用来衡量老师的口译课教学

效果的,更不宜用来衡量学生的一般翻译能力的。例如,美国的教育测试服务中心ETS在GRE分数解释指南中就明确指出,根据GRE成绩决定是否雇佣某个应聘人员是不当的(ETS,2003)。

由于测试的后果在测试项目实施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显现出来,有些甚至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关于后果的证据在测试实施之前是不可能提供的,而且即使在测试项目实施之后,也需要渐渐地提供。由于社会环境的动态性,翻译测试的使用和期望产生的后果也是动态的,因此,基于测试实施后果的证据是动态的,是需要不断更新的,整个效验过程都是不可间断的。

3. 结语

以上笔者仅仅在现行美国《教育和心理测试标准》的大框架下讨论了现代教育和心理测试学理论中的效度理论对翻译测试发出的一般性专业呼唤。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这些呼唤的响应,即对于一个翻译测试项目的效验自身就足以构成一个复杂的工程。作为工程,几乎它的每一个步骤都离不开操作。作为一项特殊的工程,要完成它通常需要足够的相关测试学知识和熟练的现代统计技术,不然,对呼唤中所提出的基本请求也难以确切领会,对呼唤中所建议的操作很可能无力付诸实施。

翻译测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要做好这项工程,需要多方面专业人员的参与,除了翻译教学研究工作者和翻译实践工作者之外,最少还需要有一定教育和心理测试学素养的测试工作者的参与或介入。不然,所谓的翻译测试很可能只是名义上的翻译测试。

人们常说,测试应该客观、公正、公平,当然,翻译测试也不应该例外。可是,一项不知效验结果的测试,无论如何,它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公平性都是无从谈起的。希望我国的翻译测试主办方或开发方能够对效度理论的呼唤早日做出必要的响应,以便翻译测试的研究方能够交叉效验贵方的效验结果,从而使研究方能够为我国的翻译测试实践做出必要的贡献。

注释:

- ①“语言测试”是英语 language testing 的翻译,是“外语测试”或“二语测试”的不精确说法。
- ②国内心理学界通常把“心理测试”称作“心理测验”。“教育测试”也称作“教育测量”。
- ③例如,在俗称教育测量“圣经”的《教育测量综览》的第一版中(1951年出版)，“效度”被放在全书(共18章)的第16章;在第二版中(1971年出版)，“效度”被放在的第14章(全书共20章);在第三版(1989年出版)和第四版(2006年出版)中，“效度”均被放在第2章。考虑到第三版和第四版的第一章都是本版编辑对全书内容的鸟瞰式介绍,“效度”一章实际上等于是全书的第一章。在1999年出版的由美国三家学(协)会联合颁布的《教育和心理测试标准》(*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中,效度也是第一章。

④ backwash 也称 washback。国内有些学者把这种效应翻译成“反拨效应”。

参考文献:

- [1]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 National Council on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 [NCME].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 [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1999.
- [2] Bachman, L. F. & A. S. Palmer. *Language Assessment in the Real World*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 [3] Brennan, R. L.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4th ed.) [G]. Westport, CT: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nd Praeger, 2006.
- [4] Downing, S. M. & Haladyna, T. M (eds.). *Handbook of Test Development* [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2006.
- [5] ETS. *Guide to the Use of Scores—GRE 2003 – 2004* [Z]. Princeton, NJ: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2003.
- [6] Kane, M. T. Validation [G] // R. L. Brennan.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4th ed.).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6:.
- [7] Popham, W. J. *Modern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A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 [M]. Englewood Cliff, NJ: Prentice Hall, 1990.
- [8] 蔡啸.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分析及其对翻译队伍建设的启示[J]. 中国翻译, 2009(1):60-62.
- [9] 蔡小红. 论口译质量评估的信息单位[J]. 外国语, 2003(5): 75-80.
- [10] 蔡小红. 论口译教学训练评估[J]. 中国翻译, 2005(6):58-61.
- [11] 蔡小红, 方凡泉. 论口译的质量与效果评估[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3):41-45, 48.
- [12] 蔡小红, 曾洁仪. 口译质量评估的历史回顾[J]. 中国翻译, 2004(3):49-54.
- [13] 海芳. 英语专业本科生的笔译测试——理论与实践[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 2004.
- [14] 黄晓佳, 王建国. 全国英语专业八级口译考试评判标准评议[J]. 中国翻译, 2009(1):54-59.
- [15] 黄晓佳, 王建国. 全国英语专业八级口译考试评判标准评议[J]. 中国翻译, 2009(1):54-59.
- [16] 穆雷. 翻译测试现状分析[J]. 国外外语教学, 2000(1):15-17.
- [17] 穆雷. 翻译测试及其评分问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a(6):466-471.
- [18] 穆雷. 翻译能力与翻译测试[J]. 上海科技翻译, 2006b(2):466-471.
- [19] 穆雷. 翻译批评与翻译标准[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c(6):466-471.
- [20] 穆雷. 翻译测试的定义与定位[J]. 外语教学, 2007(6):466-471.
- [21] 席仲恩. 效度[G] // 邹申(主编). 语言测试.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冯 革

投稿须知

《英语研究》是国内以英语为专门研究对象、由四川外国语大学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CSSCI 连续出版物,创办十五年来已经在学术界有了较大影响,受到广泛好评。本书的主要栏目有“语言研究”、“文学与文化研究”、“翻译研究”、“教学研究”、“学术访谈”、“叙事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国别文学研究”、“测试学研究”、“海外译稿”、“教材研究”、“语料库研究”、“习得研究”、“双语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书评”等。

一、来稿要求

1.《英语研究》面向外语界、人文社科学者,强调论文的学术性、前沿性和创新性。正文 8000 字左右。稿件的电子版发至邮箱:yyyjb@163.com,打印稿寄至:400031 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壮志路 33 号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研究》编辑部。

2. 稿件构成:中英文标题、中英文摘要(200 字以内)、中英文关键词 3-5 个均用分号隔开、正文、参考文献、基金项目具体名称及编号、附页(附上作者姓名、一级单位和二级单位、职称、单位、学历、学位、研究方向、通讯地址及邮编、手机号码和电子信箱)。

二、注引格式

1. 正文格式

小标题单独占一行,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从 1 开始)表示为:1.1、1.2、……
2.1、2.2、……

2. 文内引用文献和文末参考文献格式要求

1) 文内夹注

对论文和述评中的引文所依据的文献,以夹注的形式随文在括号内注明作者姓名、出版年和引文页码,例如:(王佐良,1982:36)。如引用多项,则按照出版年顺序排列。同一作者的参引文献之间用逗号分开。文献作者如果是两个人,参引时引两个人的名字。中文的格式如“刘润清、吴一安(2000)”。英文格式在两个作者之间加“&”号。

2) 文后参考文献格式

中外文参考文献格式: 中外文参考文献分别排列, 外文在前, 中文在后。参考文献类型以字母标识, 格式如下:

(1) 期刊类: [序号] 作者名 (中文作者名姓前名后, 列前 2 名, 后加等; 英文作者名姓后名前). 文献名 [J]. 刊名, 出版年, 卷(期): 页码.

(2) 普通图书类: [序号] 作者名. 书名 [M]. 版本 (第一版不写).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份.

(3) 会议论文集: [序号] 引文作者名. 引文题目. 论文集编者名. 论文集名 [G]. 出版地 (会址): 出版者, 出版年份.

(4) 学位论文类: [序号] 作者名. 题目 [D]. 保存地点: 保存单位, 年份.

(5) 报纸文章: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N]. 报纸名, 出版日期 (版次).

(6) 电子文献类: [序号] 作者名. 电子文献名 [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志].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7) 引用网上公开发表的文章时, 顺序为: [序号] 作者名 (姓氏在前, 名在后)、作品名、编者名、电子版权信息 (日期、版权人或组织)、引用日期及网址.

(8) 所列文献必须与正文中的夹注一致。如果正文中没有夹注, 参考文献中不得列出。

三、稿件处理

本书审稿周期为三个月, 三个月内未收到答复, 作者可自行处理, 请勿一稿多投。不拟采用的稿件作者可自行处理, 来稿恕不退还, 请自留底稿。本书所发表的文章版权归本编辑部所有。

《英语研究》编辑部